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政治之研究



指導教授：吳玉山博士

研究生：賴怡君撰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賴怡君 君所撰之碩士學位論文

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政治之研究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口試委員

許博群

王定士

吳玉山

指導教授

吳玉山

研究所所長

王定士代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

摘要

本文以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為分析中心，認為派系是延續了過去的政治菁英文化傳統，不但在新的俄羅斯民主制度下繼續存活下來，還進一步成為主導整個俄羅斯發展的重要行動者。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項發現是派系政治是分析葉爾欽時期政治的一個具有解釋力的模式。第二項發現是建構一個分析葉爾欽派系互動規則與架構，在此架構中建立一個評估派系政治穩定程度的指標，運用這個指標來分析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發展與演進。第三項發現是派系政治的穩定程度與俄羅斯的政經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存在，亦即俄羅斯的派系互動愈不穩定，俄羅斯的政治也隨之愈不穩定、人事互動愈頻繁，政策產出更加不確定，尤其是經濟政策隨著派系勢力的上上下下而來回擺盪變動。

關鍵詞：俄羅斯政治、派系政治、葉爾欽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文獻分析	8
第三節 研究範圍	32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33
第二章 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形成	37
第一節 制度因素層面	39
第二節 政治文化層面	50
第三節 葉爾欽的領導風格	60
第三章 俄羅斯派系政治的運作架構與模式	66
第一節 俄羅斯派系分類	66
第二節 派系的互動	78
第四章 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實際運作與影響	92
第一節 派系建立期	92
第二節 派系穩固期	102
第三節 派系混戰期	107
第四節 派系對俄羅斯政經影響	125

第五章 結論	13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32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134
參考文獻	139

表目錄

表一：俄羅斯總統與總理合作關係	44
表二：學者與媒體曾經提出的俄羅斯派系種類	72
表三：俄羅斯派系穩定程度表	90
表四：派系互動的人事變動與政策變動	127

圖目錄

圖一：制度研究的上、中、下游	7
圖二：派系基本結構圖	11
圖三：葉爾欽時期總統、國會與政府的權力競爭關係	45
圖四：俄羅斯總統行政機構	62
圖五：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結構圖	77
圖六：俄羅斯兩種派系模式互動循環	87
圖七：政治勢力的轉變與經濟政策的擺盪、經濟運行波動關係圖	88
圖八：俄羅斯派系發展演進圖	91
圖九：俄羅斯派系演進圖	130

第一章 緒論

蘇聯解體至今，俄羅斯歷經了十年的轉型過程，許多政治學者開始評估俄羅斯這十年發展的成果究竟如何。在好的方面，學者肯定俄羅斯走向民主政治；但在另一方面，學者認為俄羅斯民主的實質運作並不符合實際民主的標準，尤其是在政治穩定與民主鞏固上，俄羅斯存在許多問題尚未解決。例如，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走向威權的方向，引發學者質疑俄羅斯的民主是否會走回頭路？俄羅斯當權箝制控制媒體與貪污等問題均令人感到擔憂。英國的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稱俄羅斯的民主政治是「假的民主政治」（phony democracy）。亞伏林斯基（Grigoriy Yavlinskii）在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中將俄羅斯的經濟稱為「假的資本主義」（Phony Capitalism）。¹某些西方學者的著作，只披露俄羅斯內部的政治黑暗面，將俄羅斯描述為一個由腐敗政府掌權與地下經濟充斥的國家，尤其是黑道橫行與貪污的問題。此外，近幾年來，俄羅斯在西方媒體報導中盡是一些負面的形象與資訊，西方媒體不諱言的指出，在政治方面，俄羅斯沒有民主，只有貪污的政客；在經濟方面，俄羅斯沒有企業家，只有黑道與地下經濟；在社會方面，俄羅斯沒有公民社會與中產階級，只有貧窮且具民族主義傾向的大眾。但是對於這樣的描述，有些學者認為是過分誇大其辭，且不當醜化俄羅斯。²

不論學者或媒體是否過分誇大俄羅斯的黑暗面，俄羅斯的政治確實是弊病叢生。俄羅斯的政治不穩定、充滿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個不爭的事實。俄羅斯是屬於新一波民主轉型的國家，在這一群後社會主義國家中，有某些國家的民

¹ Grigory Yablinsky, "Russia's Phony Capitalism,"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1998), vol.77, no.3, pp.67-79.

² Daniel Treisman, "Blaming Russia Firs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0), vol.79, no.6, pp.146-155. 西方學者對俄羅斯的評論持雙重標準。我們可以說，西方對俄羅斯 1992 年改革初期的態度過分樂觀，而在改革後期，西方的態度尤其是 1998 年經歷巨大改變，對俄羅斯的

主化走的比較順暢，有某些國家卻十分波折；東歐三國波蘭、捷克、匈牙利是民主制度運作最好的模範生，俄羅斯則是界於民主與威權的代表，而白俄羅斯與哈薩克等中亞國家卻仍舊停留在威權主義的原地。而究竟什麼原因造成俄羅斯政治紊亂是我們要探討的重點，是俄羅斯政治的制度設計不良使然？還是俄羅斯本身政治文化因素在背後作祟？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這幾年來，俄羅斯各方面的發展呈現著一個混亂無序的景象。俄羅斯是個橫跨歐亞的大國，俄羅斯的未來發展攸關世界情勢的演變，因此俄羅斯政治穩定與否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俄羅斯的政治在葉爾欽（Boris Yeltsin）時期並不穩定，而這不穩定的變數為何？是葉爾欽本人？是超級總統制？還是整個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作祟？而繼葉爾欽之後，俄羅斯第二位民選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自2000年5月就任執政至今，俄羅斯的政治局勢與經濟發展卻成呈現著相對穩定的局面，而其中促成俄羅斯政治穩定的因素又是什麼？葉爾欽時期所確立的俄羅斯政治體制並未改變，因此，究竟是國會中支持總統普亭超過半數？還是普亭本人的領導風格能夠掌握俄羅斯的政治局勢？還是俄羅斯的政治派系都聽命於普亭總統？以上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探討。

在研究與分析俄羅斯政治領域，主要有兩大學派，分別是制度學派與非制度學派。其中，制度學派以制度的角度來分析，認為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亦即一個強勢的總統加上一個反對勢力為主、制衡機制不足的國會，是造成俄羅斯政局混亂的原因；如學者胡思凱（Eugene Huskey）。而俄羅斯的府會之爭便是此派學者研究的重點。³另外一派屬於歷史文化傳統學派，此派強調俄羅斯的歷史與政

觀感與認知又轉而趨向太過負面與悲觀。

³許瑜玟，「俄羅斯府會政爭之研析：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政大俄羅斯研究所論文，民國

治文化對俄羅斯政治的影響作用，例如俄羅斯的派系政治、蘇聯的政治遺緒等，都是造成俄羅斯政治紊亂的根深蒂固的因素；如學者王躍生即強調俄羅斯傳統文化對俄羅斯改革所造成的阻礙。⁴事實上，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這兩項大因素都是導致俄羅斯政治紊亂的來源，只不過是比較強調其中某一個因素罷了。

究竟制度或文化何者是關鍵性因素，是個很難斷然回答的問題。就制度與文化的關係看來，制度是人所建立的，制度的形成與建立離不開文化，文化是影響人選擇制度的背後推動因素；此外，政治制度是否能運作良好，也需要政治文化配合，就像中南美洲國家都和美國一樣實行總統制，但兩者實行總統制的結果卻不相同。某些探討俄羅斯政治文化與公民社會的學者指出俄羅斯目前的政治文化尚未成熟，公民社會尚未健全，因此，俄羅斯許多民主制度的運作的確不民主；例如，俄羅斯目前雖有選舉制度，但俄羅斯的選舉儀式只能視為表面的民主，選舉並未表現出實質的民主本質。民主制度究竟是否適合目前的俄羅斯仍是個問題。俄羅斯政治精英的諸多政治作為並不依照憲政制度的設計，實際的憲政運作根本不符合民主的標準，而葉爾欽就是一個經常破壞俄羅斯憲法的總統。

制度是由若干具體規則、法律、條文和習慣所構成。諾斯(Douglass C. North)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更嚴謹的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更具體說來，制度對於行為的限制包括正式規則(正式約束、有形制度)、非正式限制(非正式約束、無形制度)和執行等三部份。諾斯對制度的定義包容性大，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制的部分，而諾斯對於制度變遷的解釋就是透過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的區分。正式制度是由人自覺地、有意識地制定的各項法律、法規、規則，這些制度多以成文的方式出現，一個社會的正式

八十七年四月。政府與國會兩大權力中心在國家體制、權力分配和經濟改革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兩方均希望能取得制憲與決策的主導權。葉爾欽主張實行總統制，即總統擁有決定國家事務的最高權力，但議會要求擁有立法權和至高無上的監督權，雙方反反復復較量。

⁴ 王躍生，《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出版社，民國 86 年)，頁 156-169。

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制度。憲法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制度，是其他制度的基礎。除憲法之外，其他各種成文法、不成文法、各種法規的施行細則、各種組織及個人之間簽訂的正式交易契約，都是該社會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常常被稱為非正式約束（informal constraints），它是制度構成中與正式制度相對應的另一類制度。非正式制度通常被理解為在社會發展和人際交往的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不依賴於人類主觀意志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範，主要包括社會的價值觀念、倫理規範、道德標準、風俗習慣和意識型態。非正式約束與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有著很大的共同性。非正式制度的產生遠遠早於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產生前，社會主要靠非正式約束來規範和協調人們之間的關係和交往。正式制度產生後，即使在正式制度已經大大複雜化和完善化的今天，非正式制度仍然是整個制度結構中的大多數，仍然發揮著重要的規範和調節人際關係的功能。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大多以對正式制度的補充、完善和細化的形式出現，也就是說，正式制度不論如何完備，也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通通至於正式制度的管轄之下，那些無法由正式制度來規範和調節的領域，就是非正式制度發揮作用的場所。根據以上關於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兩者關係來看俄羅斯，我們發現，在憲法所構成的正式政治制度超級總統制的運作下，俄羅斯的派系政治仍然存在，並且發揮著重要的補充作用；更甚者，由於俄羅斯的法治程度不高，正式制度無法限制非正式制度的運作，俄羅斯的派系政治甚至產生破壞正式憲法制度的作用。⁵

關於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與政治文化的關係，則必須更進一步說明三者間的關聯與差異。正式政治制度指的是憲法的規定，是一套非常明確的規則；非正

⁵正式政治制度在法治程度不高的國家愈容易遭受非正式政治的破壞。Haruhiro Fukui 及 Shigeko N. Fukai 認為非正式政治主要相對於正式政治。正式政治是由於權力在位者為增進群體的公眾利益，將現存的政治規則制定成一套以資遵循的政治秩序；非正式制度則是補充正式制度功能不足所發展而來的，其所追求的是少數人的利益。Peter Nan-shong Lee 採取韋伯的途徑來定義，認為正式政治是依據一套客觀規則運作的政治活動，相對而言，非正式政治是指以個人關係、傳統權威或個人魅力來運作的政治活動。

式政治制度則是政治菁英實際的憲政運作與政治行為的表現，而這套非正式的規則包含受限於憲法以及憲法所未規範的部分，甚至包括政治菁英間默認採取違憲的政治規則或行為，基本上這套非正式規則並不付諸於文字，純粹是政治菁英間所習慣且傾向採取的行為規則，是一套不明確且十分彈性的規則。而政治菁英的非正式制度運作規則通常來自於過去政治文化的影響，政治菁英的非正式政治制度恰好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因此，我們有必要再進一步區別非正式制度與政治文化的關係和差別。一般說來，政治文化是一種無形且較為抽象的概念，而非正式政治制度則是政治菁英實際政治行為的表現。政治文化與非正式政治制度兩者可說是一體兩面，非正式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具體表現，政治文化是非正式政治制度的內在本質與精神。俄羅斯雖然已經實行民主政治，但在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下，俄羅斯仍存在非正式政治制度的運作習慣，也就是政治菁英仍然脫離不了過去派系政治的運作習慣。因此，持政治文化論者都認為政治文化與非正式制度如派系政治、強人政治是影響俄羅斯政治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

俄羅斯的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存在極大的落差。我們觀察發現，俄羅斯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具有強烈的二元色彩；亦即俄羅斯在政治與經濟運作上，都發生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同時存在的現象，並且非正式制度有凌駕正式制度之勢。在政治方面，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與派系政治並行；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地下經濟並行。⁶依據新制度主義，一項制度之所以可以形成且運行，乃是因為此制度的交易成本較低。如果以新制度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俄羅斯這種特殊現象，便可以得到如下的推論：對於俄羅斯的政治精英而言，超級總統制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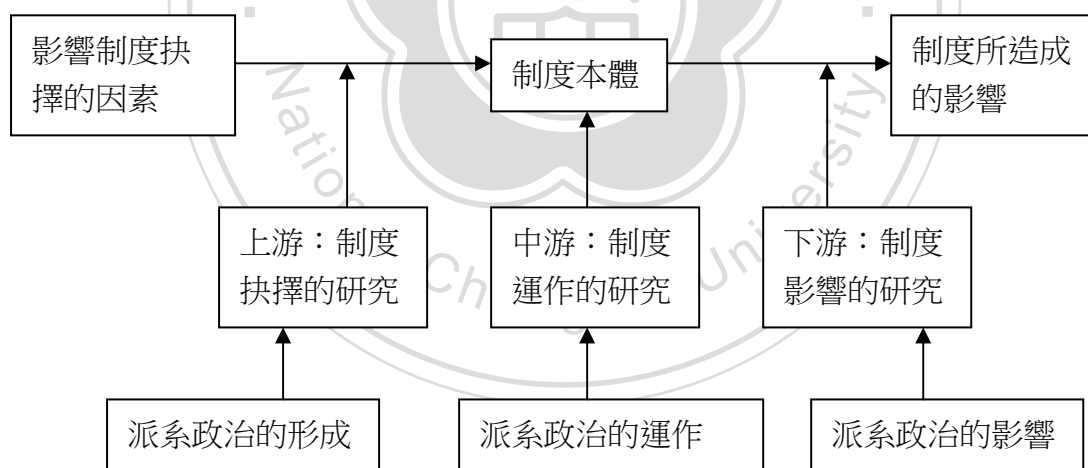
⁶美國布魯京斯研究所的嘉迪（Clifford Gaddy）和艾克斯（Barry Ickes）指出，整個俄國經濟已成了一種很典型的「虛擬經濟」（virtual economy）。所謂「虛擬經濟」，指的是俄國官方雖然仍有各種有關物價、工資、歲入、歲出等數字，但這些換算而來的數字卻無任何意義，真正的俄羅斯經濟早已退化到接近原始狀態的以貨易貨的程度。政府的稅收有四成為實物收入，而後又以實物發放；由於工廠沒有薪水，甲工廠和乙工廠的契約得彼此用以貨易貨的方式交易。而當以貨易貨成為主要經濟往來，諸如設備更新等需要貨幣中介的活動當然也不可能發生，阻礙俄羅斯的經濟發展。Gaddy Clifford and Barry W. Ickes, "Russia's Virtu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vol.77, no.5.

形成總統、政府與國會的對立與決策僵局，造成兩敗俱傷；而派系傾向運用檯面下的協議、磋商或憲法體制未規定的圓桌會議來運作，再加上派系政治原先就是政治菁英所熟悉的運作方式，因此比起超級總統制更容易達成共識與妥協，且讓雙方得利。而在經濟方面，由於俄羅斯國內資金短缺，以貨幣或融資貸款來進行交易是成本極高的方式，因此企業改由以貨易貨或地下經濟的方式來進行交易，不僅避免通貨膨脹與盧布下跌的風險，更可以逃避政府的課稅。在正式市場運作不良下，非正式經濟的部分補充了正式經濟制度的不足，滿足了企業和人民的需求。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都以私人關係為主軸，政治人物以私人關係作為爭取權力的工具，企業也以私人關係作為爭取經濟利益的方式，政治與經濟兩者結合，便是一種權錢交易。簡而言之，以私人關係為主軸的非正式制度是一個觀察與研究俄羅斯的重要途徑。

制度學者在比較政治的領域，選取不同制度的國家作比較，藉以比較出較穩定的政治制度。但是，如果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國家運作，卻產生不同的結果，這可能表示制度因素不是關鍵的，而是制度之外因素。制度雖然扮演著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俄羅斯選擇了總統制或內閣制，難道就一定比起實行超級總統制相對穩定嗎？這個答案令人質疑。採取與俄羅斯同樣是超級總統制的國家是否與俄羅斯一樣都具有政治不穩定的特色？另外，一項新制度在實行之初，都必須經歷一段適應與學習摸索的過程。在正式制度未成為普遍接受的規範時，非正式制度的運作會在這個初期階段扮演重要的調節功能。由於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的派系政治仍然相當強烈，因此俄羅斯雖已進入民主制度，但政治派系的運作方式在正式制度框架下仍然會繼續存在。在一個不以制度為框架來運作的情況下，政治的不確定較大。再者，以府會衝突或制度設計的角度來分析，並無法解釋葉爾欽為何突然開除齊諾梅爾金與普里馬柯夫兩位總理，因為，這兩位總理是葉爾欽任內中獲得國會支持度極高的總理；反之，如果以權力的角度來分析，葉爾欽因為兩位總理的勢力凌駕總統，威脅到總統地位，因而將其開除，才是最合理的解釋。

因此，完全從正式制度層面來分析，雖可以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俄羅斯政治，得出一個最為廣泛的解釋，但無可否認地，正式制度途徑無法解釋所有的事件，甚至某些重大的事件。

制度研究可以分為上游（制度抉擇）、中游（制度運作）和下游（制度影響）三個大的領域。⁷制度包含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吳玉山以這三大領域來分析俄羅斯的正式制度－超級總統制⁸，而派系政治是相對於超級總統制的非正式制度，因此，本文也欲以這三大部分為主軸，依序分析俄羅斯的非正式制度－派系政治的產生、派系政治運作的方式與派系政治運作對俄羅斯的影響。第一部份解釋俄羅斯為何發展出派系政治的原因，是制度淵源；第二部分闡述俄羅斯派系政治運作的情況，是制度的實際運作；第三部分是派系政治運作對俄羅斯政治的影響。



圖一：制度研究的上、中、下游

資料來源：吳玉山，制度、非正式制度與結構對政治穩定的影響與作者的新增。

⁷ 吳玉山，「制度、非正式制度與結構對政治穩定的影響」，中國政治學會九十年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民國九十年一月。

⁸ 吳玉山，「合作還是對立？半總統制府會分立下的憲政運作」，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的新走向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本文嘗試採取派系政治的方式來分析俄羅斯的政治不穩定的原因，期望能以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提供另一個觀察、解釋或預測俄羅斯政治的方式。派系政治是俄羅斯政治制度下的隱形結構與非正式運作機制，受到正式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約，因此，本文的派系政治分析架構也會包含非正式制度的部分，希望運用此派系政治來分析俄羅斯政治，可以達到兼顧制度分析與非制度因素分析的目標。

第二節 文獻分析

關於派系政治的研究方面，可分為兩類，一是派系政治的理論，一是關於各國派系政治的案例研究。對於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專論性論文相對稀少，但是在俄羅斯國內的政治分析性評論中，則相當豐富。許多俄羅斯的政治觀察家都以派系政治的角度來分析俄羅斯政治局勢的變化。這表示，以私人利害關係為主軸的派系的確是俄羅斯政治的中心。俄羅斯人在分析政治事件時，一定清清楚楚地說明所有政治人物間的關係，確立彼此的立場，以作為分析的基礎。關於蘇聯的權力政治與繼承，學者趙春山也以派系政治的鬥爭來分析。⁹學者吳玉山則對中國大陸的派系鬥爭與經濟政策辯論有精詳的論述。¹⁰關於中國大陸方面、台灣、日本與韓國等國家，學者都曾經作過派系政治的研究。¹¹

以下的文獻分析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份首先整理學者們所提出的派系政治基本架構分析理論；第二部份則舉出學者們對蘇聯派系與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分析。由於目前學者對俄羅斯政治派系並未建立完整的理論架構，因此第三章將嘗試運用基本的派系理論與學者目前對俄羅斯派系的分析，建構一個較完整的模

⁹ 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移轉—從列寧到戈巴契夫》（台北：桂冠，民國 79 年）。

¹⁰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中正，民國 85 年）。吳玉山，「中國大陸派系鬥爭與經濟循環互動之研究」（台北市：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民 85），NSC84-2414-H002-037。

¹¹ Lowell Dittermer, Haruhoro Fukui and Peter N. S. Lee,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型。

一、 派系政治理論

關於研究派系的理論主要以研究中國大陸的派系政治最有系統。本論文在派系政治的理論上引用幾位重要學者對派系的定義、關係與結構。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是研究派系理論的始祖。白魯恂（Lucian W. Pye）以政治文化觀點分析中共派系政治，為派系政治奠定穩固基礎；鄒讜（Tang Tsou）則對黎安友的派系觀點作出修正與批判，提出非正式團體來取代派系的概念。羅德明（Lowell Dittmer）與吳玉山則是結合派系政治與制度研究。此外，陳明通對台灣派系的研究也是值得參考的資料。

1. 派系的定義

傳統上中西方均對派系持負面的看法，認為派系是破壞團結、搞小組織、結黨營私的集團。事實上，派系是人類很普遍的小團體現象。關於派系的定義，西蒙（Herbert A. Simon）：「派系為組織內的『非法』團體，目的是為改變現存的組織，以恢復、保持或增進派系成員的權益。派系使用未經允許的方法，企圖改變組織目標或基本思想，或者使妨礙他們的人離開或調至其他單位。」史塔（John Bryan Starr）則定義為：「派系是基於相同意識型態和先入為主觀念而組成的團體。」不過，拜萊（F.G. Bailey）並不認同史塔的定義，他認為：「派系是一個團體，缺乏意識型態作為共同合作的基礎，成員的甄選，是經由領導者，依據與成員之間的互助交易關係。」黃德北則認為：「派系是一個基於共同利益而緊密結合的非正式團體，它的目的在贏得壓倒性的優勢權利。」蘇嘉宏則提出一個較具綜合性的定義：「由具有思想上共同基礎的成員所組成非正式政治團體，其間存在著某種特定關係網絡以維繫其凝聚力，而以權力與利益的取得、維持和擴大為

期主要的目的。」¹²上述定義不一，相當程度說明了學者對派系思維的差異。

2. 派系結構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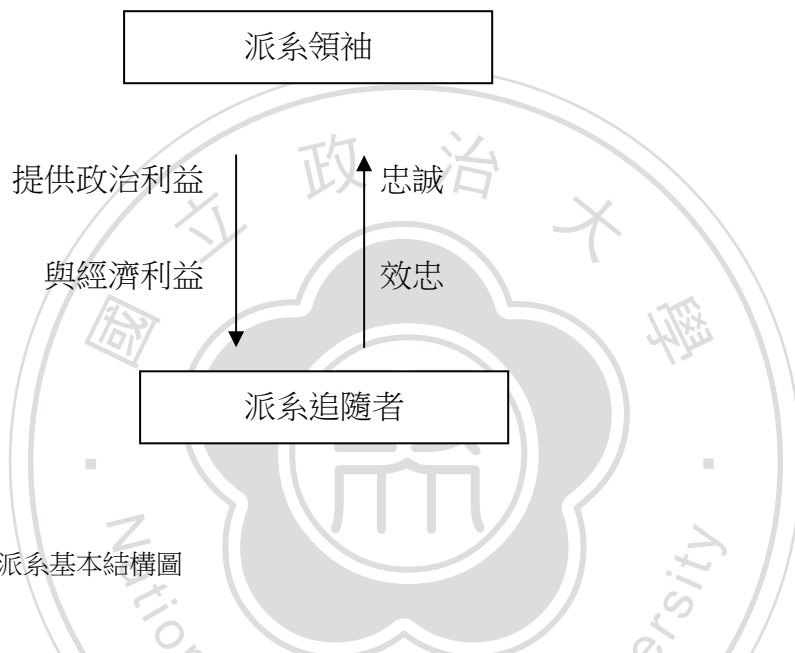
派系是一種由隨附依從（clientelist ties）關係所形成的動員結構，這樣的關係有幾項特點，黎安友指出派系結構的特性是（1）它是兩人間一對一的關係（2）派系成員間以交換好處培養關係，並瞭解彼此的權利和義務（3）派系成員的財富、社會地位並非完全平等（4）上述關係成員彼此間相當了解，但彼此權利義務關係卻隱晦不明（5）派系成員擁有自由意志可隨時參加或退出（6）派系關係並非單一，其成員可同時建立多種關係。¹³更確切的說，派系的基本構成單元是二方聯盟，所謂的二方聯盟，進一步根據藍得（Carl H. Lande）的定義，派系指的是一種存在於兩個個人之間，以交換恩惠（favors）及提供及時所需（needs）為目的的自願性協議。二方聯盟所彰顯出來的一項重要行為是交換，交換可以說是因結盟所產生的一項義務，雙方都必須履行，不管結盟的雙方地位平等或有上下之分，否則結盟關係將不存在。為此，交換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當交換是目的時，提供的是對方恩惠或及時所需的東西；當交換最為一種手段時，其目的主要適用來表示持續結盟的意願，或證明盟誼的持續存在。¹⁴依據威列頓的分析，俄羅斯派系也是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tie）所構成的二方結構，具有私人化

¹² 賴榮偉，「中共政治研究之派系模式探討」，《東亞季刊》，第 29 卷，第 4 期（民國 87 年秋），頁 112。

¹³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Mar. 1973), 轉引自李英明，《中國大陸學》（台北：楊智，民國 84 年），頁 58。

¹⁴ 「恩庇－依隨」關係（patron-client）是一種附著於既存政治社會體制中，不平等權利地位行動者間的非正式、特殊互惠關係。它的存在反映出統治菁英或恩庇對體系中非個人化的威權領導方式極端不信任，必須依賴廣泛而活絡的初級團體關係，去完成各種政治、社會、及經濟目標。侍從主義通常存在於不對等的權力與地位的行動者間，其中「恩庇者」具有較高的權力地位，「依隨者」透過對恩庇者的效忠和服從來換與生活所需的資源；但依隨者通常亦擁有恩庇者所缺乏或急需的資源，如此兩者的交換關係才有可能建立，亦即雙方皆持有對方所需，而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中相互依存，雖然依隨者通常是較弱勢的一方。Carl H. Lande, "Introduction: The Dyadic Basis of Clientelism," in Steffen W. Schmidt, James C. Scott, Carl H. Lande and Laura Guasti eds.,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轉引自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民國 84 年），頁 13-14。

(personal)、互惠性 (reciprocal)、權力不對稱性 (asymmetrical) 以及相互依賴性 (interdependent) 的關係及性質。基於權力不對稱的上下從屬關係，派系結構中，領導人在上，追隨者在下。派系的互惠性是領導人提供政治與經濟利益，追隨者以效忠領袖來回報，而兩者對交換的資源具有需要性，因此，領導人與追隨者兼具相互依賴性。茲將派系結構簡單以下圖表示：



圖二：派系基本結構圖

二方聯盟有如一「附加物」(addenda)，既附加在既有體制上，也需要藉助其他的體制來加強。就前者而言，派系反映出被附加體制功能的不足，例如在某些官僚體系內，上級長官與某些特定部屬發展出二方聯盟關係，造就一批所謂的「班底」，顯示在既有的官僚體系內，無論是指揮系統、行政效能、或是人才引用、功績制度上都出現了問題。就後者而言，它反映出二方聯盟在本質上存在著「可靠性」(reliability) 與「可信任性」(trustworthy) 的問題，也就是聯盟的本身在確保交換義務的履行上，缺乏穩固的保障。特別是這些義務的履行往往不是法律管轄的範圍，或者法律的救濟與不履行的損失不相當，甚或者交換本身是違法的。因此，二方聯盟必須假藉外來力量來強化交換義務的履行。

派系是二方聯盟所構成一套人際網絡的總稱，是一種「準團體」(quasi-group)。這個準團體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卻缺乏共同標準的「成員身份與權利義務」。派系也是一種非正式的團體，其「非正式」的特質，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1) 派系的結盟關係基於戰略的考慮，可能對外公開為人所知，或可能不對外公開或極力保密。(2) 派系成員的引進，多由派系領袖或核心幹部私下為之，而非經由公開的甄選，特別是對背後擁有一定勢力的新進成員更是如此。(3) 派系成員的引進，並無一定的標準，來源也很廣泛，只要符合彼此的需要，即可結盟成為派系成員。(4) 新進成員的加盟，並無一定的正式成員登記手續，而是靠成員彼此間的一種認定。¹⁵

羅德明和吳玉山指出，黎安友所主張的隨從依附關係具有三種面向：共有的屬性、階層性與互惠性。互惠性是這種關係的目標；階層性則是這種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形式，是一種上下垂直的面對面關係；而共有的屬性則是人建立此關係的主要基礎。簡言之，這是一種特別型式的領導者與跟隨者的關係，是一種上下位者具有共同利益的結合關係。¹⁶

再者，黎安友又提出派系的組成可分為「簡單派系」與「複合派系」。簡單派系就是以單一領袖為核心，與他人建立起隨從依附的關係，從而使其成為派系的成員。而複合派系則包含一些次級的簡單派系，以次級派系領袖間的隨從依附關係形構而成。黎安友認為派系結構具有下列幾點特徵(1) 派系成員的組成是透過個別徵召方式而組成，所受的規範是屬於個別規範(2) 派系領袖一但死亡，整個派系就會出現樹倒猢猻散的情況，因此派系不能移轉，領袖的人脈無法繼承；(3) 派系的互動非零合性的；(4) 由於派系領袖掌握資源相當有限，所以派

¹⁵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 16-18。

¹⁶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 1995), pp.467-494.

系不可能無限擴大；(5) 派系無法組織化、制度化、全面性的動員。¹⁷

鄒讜的學說基礎立足在對黎安友的批判上，黎安友認為派系是沒有任何正式組織可限制其活動，正式組織可以擴展派系，但派系卻擁有相對於正式組織的自主性與影響力。但鄒讜認為正式組織或建制對派系具有相當鮮明的影響力。鄒讜以非正式團體來取代派系的概念，非正式組織是由於人員互相行為下所產生的認同關係所形成的結果，此認同關係含有許多共通點，其共通點愈多，則非正式關係就愈密切。¹⁸

白魯恂分析關係在派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著重於關係的功能「效忠－保護」的探討。這種關係是上下垂直的網絡，但不是主顧關係，並沒有法律或其他強制的拘束，而「效忠－保護」所衍生的利益關係才是派系維繫的主因。此關係所構成的權力網絡，進而形成派系，具有隱性、跨制度、跨組織與跨地域與跨世代的特性。白魯恂進一步釐清派系與政策間的關聯，他認為不能過分強調政策在派系政治中的角色，政策可能是派系的商標，但絕非派系形成的決定性基礎。派系的形成是基於權力的考量，而派系的互動，權力位置的考量往往優先於政策的好惡，所以只要不涉及派系權力考量，派系有可能妥協。白魯恂認為，中共政治運作經由派系鬥爭後，新政策才會提出，派系鬥爭的過程起於政策辯論，中間經過路線爭論，甚至理論分歧，最終權力鬥爭浮出檯面，所有的政策、路線及理論的爭辯都必須回歸權力因素。¹⁹

另外，白魯恂認為政治領導人只要有職位和威望，就會有權力下層者去追隨

¹⁷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Mar. 1973), 轉引自李英明,《中國大陸學》(台北:楊智,民國84年),頁61-63。

¹⁸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y Perspecti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¹⁹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legeschlager, 1981)。

他，發展出一個潛在支持者的網絡，不過領袖必須要能滿足這些支持者的需求，否則這些支持者會另覓其他支持對象。

羅德明與吳玉山將派系研究引進制度主義的概念，方法論上採取整體主義的分析，亦即著重組織、制度對行動者的制約，以及透過制約所形成的種種社會分析。派系不能脫離組織、制度結構性的考量，派系與制度兩者的關聯是相互滲透的。羅德明將關係分為兩種，一是價值理性關係（value-relationship）與目的理性關係（purpose-rational relationship）。價值理性關係是將關係建立當成一種價值目標，羅德明認為價值理性關係的經營必須優先目的理性關係，如此政治人物才能擁有真正的政治權力基礎，但這是一種不具形式的政治基礎，不建立在擁有政治職位上，所以這種價值理性關係是一種非正式（informal）的關係。價值理性關係的形成有幾種情況：以人的屬性為基礎、彼此具有共同的經驗、上位者透過個人徵召的方式形成，也可通過親戚、幕僚關係形成，還也以過去在官僚體系中的位置，而被納入這種網絡。目的理性關係則是指把關係的建立當成一種手段，主要是透過官僚組織形成，以維護關係中每個人的職業利益。人透過官僚作為中介，建立目的理性關係，就會擁有官方的權力，因此這一種正式（formal）關係。

20

羅德明認為非正式政治與正式政治之間的關聯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不能過度高估非正式政治對正式政治的自主性與制約性。而中共政治的發展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匯合的過程，並非完全由傳統派系主義所強調的非正式政治所主導。對於正式與非正式政治間的關係，羅德明的看法是：（1）非正式政治在整個中共政治系統中任何層次都有影響力，不過隨著層級越高，受非正式政治影響愈大；（2）對政治人物而言，若正式政治的遊戲規則與成員對派系效忠認

²⁰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pp.467-494.

同相符時，更會產生廣泛影響效應，因此正式政治對於非正式有其不可忽略的影響，中共政治人物所擁有的政治職位往往可以成為經營派系政治的主要槓桿。不過相反地，若正式政治的遊戲規則與派系的效忠認同相衝突時，影響力將會大大地減少，而有可能引發派系衝突。(3) 中共的政治人物會利用非正式政治關係去匯集或增加他在正式位置的力量與地位，也會使用正式關係去擴大非正式關係的資源。²¹

3. 派系互動的特性

黎安友以侍從關係為基礎，提出派系的基本假設：沒有派系能夠完全地消滅敵對派系，獲得絕對性的勝利。在這樣的前提下，進一步論述派系政治的十五項特徵：(1) 派系與其他派系競爭時，一方面受到自身權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內部規則的限制；(2) 由於無法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因此派系首要便是鞏固自身權力，而後再求擴張權力；(3) 當派系間均衡不再，或某派系得到先發制人的機會時，它往往先暗中秘密準備，爾後再發動攻擊；(4) 面對上述攻勢，其他派系常會採取聯合方式來防禦，而此時，派系政治亦會阻止強人統治出現；(5) 由於派系常出現攻擊者，因此派系聯合缺乏穩固性，聯合成員亦隨時變更；(6) 派系聯合初期不可能建立在意識型態一致的基礎上；(7) 整個派系體系決定某一重大決策，亦即意味著派系間以取得共識；(8) 上述共識常因新的政治危機而瓦解，產生分裂，造成新的派系產生。(9) 為削弱對方實力，各派系總是擇不手段採取造謠、賄賂或欺騙方式打擊對手；(10) 派系常會為抽象意識型態、名譽或面子而產生衝突，各派系透過語言文字等象徵符號來誇大微不足道的問題，以顯示自身的純正純潔；(11) 派系的數量有限，因太小的派系是無法在激烈的派系鬥爭中生存。中間派系往往是各派系拉攏的對手，以免其倒向對手；(12) 政權受到

²¹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pp.467-494.

威脅時，內部派系往往會維持暫時均衡來共同抵抗外侮；(13) 派系鬥爭中，任何派系均不會對各派系賴以生存的原社會制度的合法性提出質疑；(14) 派系成員必須、也要維持共識，不過這卻是相當困難。因此，要完全動員派系成員將會是緩慢而不容易；(15) 在可預見的未來，派系政治將會永遠存在。²²

陳明通在臺灣派系的研究認為派系政治運作有七項特質：

- (1) 無毀滅性：派系僅網羅部分社會力，佔有部分社會資源，因此派系中的任何一方通常無力殲滅對方，派系間的鬥爭多半是一種長期的纏鬥，大家在纏鬥中共存，敵我雙方共同維持派系整個體系的存在。
- (2) 陰狠性：由於派系均無力一次殲滅對方，因此除非有萬全的準備，派系都避免正面攻擊對方，通常是以造謠、中傷、賄賂，甚至暗殺的方式來攻擊對方。
- (3) 預防性：由於一時無力消滅對方，必須長期共存，因此對派系來講，如何保持既有資源或暗中累積資源，勝於主動出擊、消耗不必要的資源，是故防禦性策略是派系鬥爭的優先策略。
- (4) 平衡性：派系體系中雖無力消滅對方，但也不會讓某一派系獨大。因此如果有派系要強出頭，威脅大家安全，必遭其他派系聯合起來圍攻。
- (5) 無意識型態性：派系基本上是個準利益團體，而非意識型態團體，沒有意識型態上的敵人，因此，派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派系間的關係是既聯合又鬥爭的。
- (6) 唯利是圖性：利益是維繫派系網絡存在最重要的養分，派系領導人因為擁有足夠的資源才能網羅追隨者，派系的追隨者也因為能獲致更高利益而獻出他的忠誠與服務，因此極大化個人的利益是派系間的行事法則，為此派系鬥爭常常是「有派系無是非」。

²²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Mar. 1973)。

- (7) 零和賽局：因為公部門的資源有其稀少性，例如人事、預算，對方的增加就是自己的損失，因此每當自己爭取不到時，通常就不讓敵對派系去擁有，因而造成僵局。²³

4. 派系互動的影響

陳明通認為，派系是一種準政治團體，以追求公權力為手段，派系的目標在爭取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資源，²⁴以極大化派系本身的利益，再以所獲得的資源從事政治鬥爭，進而滋養壯大派系勢力，如此反覆循環不已。派系人物為此不斷進行政治鬥爭。因此在派系主導下的一國政治常有如下的面貌：²⁵

- (1) 政治腐化²⁶：派系的本質是依靠利益交換來維繫，因此一旦派系中的領導人佔據公職，不免運用裙帶主義與濫權來照顧派系的追隨者，而造成政治腐化。其中又以不正當轉移公共資源供派系私人使用最為嚴重，小則造成分贓政治，大則形成「官僚資本主義」(bureaucratic capitalism)²⁷。
- (2) 政府決策僵局：派系追逐公部門利益時，多半陷入一種零合賽局，如此常使整個政治體系的決策無從產生，造成決策僵局。欲解脫此一僵局，通常是諸多派系共同協商，或由眾多派系之上的至高領袖決定，保證各派系在時間上輪流獲取該利益，或空間上提供對等替代利益。
- (3) 應付政治危機能力遲緩：派系常使政府決策陷入僵局，而當整個政治

²³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 22-23。

²⁴ 公部門指的是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準公部門指的是中央，及地方各種統合組織，這些機構組織所具有的資源，主要是人是、預算以及決策權。

²⁵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 24-25。

²⁶ 政治腐化是指公職人員悖離正常職責，違反既有法規以攫取金錢或地位，例如貪污、行賄；或濫用政府威權以照顧私人，即裙帶主義 (nepotism) 與濫權，前者如升遷僚屬不以功績制而以效忠或奉承的表現，後者如不正當地轉移公共資源供私人使用，或私自排除不利於私人勢力運作的法規。

²⁷ 官僚資本主義指的是政治職位與社會上資源的相互滲透，具有傳統上以公共職位獲取私人利益的意含，但卻比傳統上貪污更嚴重，因為傳統上貪污只肥了個人，但官僚資本主義卻把個人的貪污與官僚體系內的派系連在一起並形成制度化，是一種結構性的貪污。

體系面臨危機時，各派系會暗藉危機壯大自己的派系，或在危機的聯合行動中，盡量消耗他人，避免消耗自己力量，派系間難以達到休戰，而造成整個政治體系危機處理能力的遲緩。

綜合以上的文獻分析，我們發現派系政治基本上是一個充滿衝突的政治。尤其是派系在追求資源分配的過程，自然就會有衝突產生。俄羅斯受到派系政治運作的影響，因此，政治局勢一直處於高度變動（highly dynamic）的狀態。俄羅斯中央政府的菁英經過派系政治的運作已經經過多次的更換及重組。在政策產出方面，俄羅斯的穩定化政策一直在緊縮與擴張中擺盪，私有化拍賣經常被迫喊停，而這些都是派系政治造成決策僵局的最佳例證。

從以上的定義與關係特色看來，學者只有在派系究竟是否具有固定的意識型態上有差異。中國大陸的派系政治在文化革命前，意識型態的確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經濟改革與社會變革中，意識型態已經變得比較不重要。基本上，目前各國的派系政治強調的是利益而不是意識型態。另外，派系間雖然存在政策對立，但是派系的劃分無法完全以政策取向來區分，應該要以派系間的利害關係來區分，以人作為劃分的標準。由於利害衝突會產生變化，因此派系的分類也會隨之產生變化。一個派系可能分裂成兩個敵對的派系，派系中的人可能在不同的派系間轉換，畢竟，派系政治是以利益為主軸，利益產生變動，人和派系也隨之變動。

對於派系政治中的政治精英而言，正式制度是限制派系的一個大環境，同時也是派系可以加以利用強化自己力量的機制。例如，楚拜斯（Anatoly Chubais）利用私有化部長的職務，結合財閥，提供賤價拍賣國營企業給財閥的私相授受方式，也就是利用正式職位所擁有的權力，採取非正式的手段來強化自己的關係與權力。這說明了例子正式制度如何為非正式制度所利用，也說明了俄羅斯何以會形成官僚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貪污現象。另一方面，葉爾欽在俄羅斯政壇中雖然是

權力最高者，但是還是必須受到國會的制衡與政府部門的某些不合作態度所制約，葉爾欽的權力並非完全不受限制。葉爾欽的派系政治的仲裁者角色是受到正式制度的約束，葉爾欽必須不斷地撤換舊人馬、網羅新人馬進入其底下的派系。

綜合以上的派系政治理論，在分析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將觀察俄羅斯的派系關係如何建立，派系的結構為何？派系的互動是否符合學者所描述的特徵？以及正式制度對俄羅斯派系政治運作的制約。

二、蘇聯與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分析

學者中以政治派系來分析蘇聯和俄羅斯政治的，有美國學者布瑞斯勞（George W. Breslauer）、瑞格畢（T. H. Rigby）、威列頓（John P. Willerton）等。俄羅斯方面，則只俄國學者茅（Vladimir Mau），²⁸以俄羅斯的派系政策集團來分析對經濟改革政策的變動。台灣方面，則以學者王定士的派系研究最為豐富，其所分析的對象包括車臣戰事的決策、經濟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辯論，王定士實際是採用布瑞斯勞的理論與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來作為分析架構。大陸方面，陸南泉等學者在《世界知識》雜誌分析俄羅斯的政治事件亦常根據葉爾欽的策略與人事糾葛的角度出發。鄭異凡更以葉爾欽現象或葉爾欽為中心來分析俄羅斯的政治。²⁹以下分別簡述各學者的觀點，末了再作一個小結。

1. 布瑞斯勞

（1）蘇聯的派系政治

²⁸ 茅是俄羅斯第一任總理蓋達的助理。Vladimir Mau, “The Ascent of the Inflationist,”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4), pp.32-35.

俄羅斯的政治經常被視為是政治精英間的政治遊戲。布瑞斯勞認為蘇聯政治、克里姆林宮學可分為兩大學派，³⁰一是權力動機學派，另一個是政策偏好學派。權力動機學派是克里姆林宮政治遊戲唯一全然機會主義的、拜占庭式的（Byzantine）政治鬥爭。政策的堅持或揚棄只是用來勝過或醜化其對手而已。觀察家的任務是透過研究文獻的發表和人事的變動，來掌握政治鬥爭誰輸誰贏的蛛絲馬跡。此一學派的發展主要是用來分析史達林統治下的拜占庭式政治鬥爭。政策偏好學派認為，儘管政治鬥爭是克里姆林宮政治的重要一環，然而究竟並非克里姆林宮政治的全貌。他們認為領導階層的政治鬥爭，也包含了他們個人對於如何解決經濟、社會以及更廣泛的政治問題的政策辯論及政策堅持。此一學派除了注意研究某一特定政治人物有關文獻發表以及人事變動之外，並將其與其他政治局成員之言論及政策偏好作一比較，以便區別該一政治人物的政策偏好。

布瑞勞斯認為：（1）追求權力乃是大部分政治體系必然的現象，幾乎沒有政治領袖故意毀損自己的權力，而且政治人物視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為得以實現其政策偏好的不二法門。（2）在沒有回憶錄、訪談或參與者的觀察佐證下，一般是不可能洞察政治領袖的真實政策偏好的。我們可以觀察其公眾行為，並仔細研究其言論，以解讀其政策承諾。然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確認這些政策承諾是出於個人偏好，還是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

（2）葉爾欽的領導風格

布瑞勞斯將葉爾欽作為一個領導人分為六項角色，這六項角色分別是：可怕的敵手（awesome antagonist）、英雄式動員人民的政治家（heroic mobilizer of the

²⁹鄭異凡，「葉爾欽現象析」，《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一期，頁5-12。

³⁰ George W. Breslauer,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p.8-9.轉引自王定士，「車臣戰爭研究：車臣戰爭決策中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第二期，民國88年，頁233-2256。

people)、家長(patriarch)、強硬而且彈性的仲裁者(hard but flexible bargainer, stern arbitrator)、可敬且慎重的對話者(respectful, businesslike interlocuter)、友好的夥伴(chummy pal)。³¹其中，前三項角色是屬於自我中心且強硬，後三項角色則是屬於願意調和且具彈性的。³²面對不同的環境與對手，葉爾欽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其中，葉爾欽對政治精英所採取的角色就是作為一大家長式的仲裁者。所謂家長式統治(patriarchalism)的模式就是：在政治體系中，葉爾欽自視為家長(paterfamilias)，擁有最大的權力；就像一家之長，擁有最高的權威，決定一切事務。對所有政治精英而言，葉爾欽就是所有事務的最高仲裁者。家長式的統治方式是個人主義統治方式的其中一種次類型，葉爾欽一直是位個人主義式的領導人(personalistic leader)，個人主義式的領導人是指領導人不會對制度負責任、決策超越制度的限制；例如，葉爾欽在其自傳中說自己個是主管(boss)、而非官員；侍衛長科札柯夫(Alexander Korzhakov)在其回憶錄中描述葉爾欽是個集權主義的主管(totalitarian boss)、真正的黨暴君(true party despot)。布瑞斯勞認為葉爾欽個人領導風格與父親式作風破壞了俄羅斯政治的政治權力分配的秩序，強化了個人化、非程序性與反制度化的運作，促成了政治的派系。³³在整個政治，葉爾欽(patriarch)要求其人馬對他與他的命令忠誠，對其人馬的公共與私人生活掌控裁量權；在個人生活上給予其人馬特權，在政治生涯上給予其人馬職位。總統辦公廳與行政部門的人員如同葉爾欽的家臣(retainer)，而不像是閣

³¹ (1) 可怕的敵手是指葉爾欽在面對對抗戈巴契夫與八月政變保守派、發動車臣戰爭時所扮演的角色。(2) 英雄式動員人民家是指葉爾欽在1989年選舉獲得90%選票、1991年8月政變時站在坦克車上(3) 家長師是指葉爾欽對待自己的政治人馬如同家族、要求順從、在犯錯時給予赦免，是個賞罰分明的家長(4) 強硬且彈性的仲裁者是指葉爾欽為了讓國會通過基里延科的任命案或每年的預算審查，交換地運用懇求、引誘、威脅和妥協的方式來達成交易。(5) 可敬且商業性的對話者是指葉爾欽在與中國、東歐等中小型國家元首交涉所扮演的角色。(6) 友好的夥伴是指葉爾欽在與西方國家元首交涉時扮演的角色。

³² George W. Breslauer, "Boris Yeltsin as Patriarch," *Post-Soviet Affairs* (1999), vol.15, no. 2, pp.186-200.除了布瑞勞斯研究葉爾欽的個性與統治風格外，其他還有(Leon Aron)、赫夫(Jerry Hough)、胡克斯(Eugene Huskey)、瑞德威(Peter Reddaway)、謝夫慈娃(Liliya Shevtsova)等學者。

³³ George W. Breslauer, "Personalism Versus Proceduralism,"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George W. Breslauer ed. *Russia in the New Century Stability or Disorder?* (Westview, 2001), pp.35-53. G. Breslauer,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Elite Stability," (November 1997),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1427.html>

員或幕僚，整個派系人馬以葉爾欽中心構成一個政治家庭。葉爾欽將自己視為家長，而非行政領袖。前發言人秘書科斯塔柯夫（Vyacheslav Kostikov）在其回憶錄「與總統的情愛」（Love-Affair with a President）中提到，葉爾欽自視為一個延伸擴大家庭的父親，享受父親式的權威，並且有權力製造機會讓其下的家族成員向父親請求原諒。而葉爾欽人馬的回憶錄中描述了許多葉爾欽與其人馬間就像父親與子女間的密切關係。葉爾欽經常稱蓋達是另一個自我，而楚拜斯和涅姆佐夫就如同是他的兒子。葉爾欽在幕僚長兼葉爾欽自傳撰寫人尤馬雪夫（Valentin Yumashev）與他的照片中寫著：對葉爾欽來說，尤馬雪夫就像是他的兒子。葉爾欽是一個愛憎非常分明的人，對部下的要求十分嚴厲，部下對他的指示稍有違背就立即解任。葉爾欽喜歡在公開場合與媒體上斥責其人馬如蓋達、楚拜斯、齊諾梅爾金，就像是父親責罵兒子一般；而這些人馬不會反抗，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來效忠葉爾欽。

在俄國人民的印象中，葉爾欽是一位家長式的國家指導者。俄國的領導人均習慣以全人民的家長自居。葉爾欽自稱是全俄羅斯的總統、全民的總統，由於葉爾欽獨斷的作風，因此有人稱葉爾欽為「沙皇葉爾欽」。由於葉爾欽本人非常崇尚俄國歷史上積極對西歐開放的彼得大帝，也有人稱葉爾欽是 20 世紀的彼得大帝。葉爾欽在打破共產黨一黨獨裁，建立對外開放的民主體制方面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葉爾欽在俄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方面卻缺乏建樹，葉爾欽在辭職講話中，也表示他因沒有能夠兌現他對國民的很多承諾，而感到十分內疚。因此有人形象地評價葉爾欽為「偉大的破壞者、無能的建設者」。

葉爾欽的領導風格是蘇聯政治文化與結構的產物，反映過去俄羅斯與蘇聯領導人的風格。為何俄羅斯無法建立一個鞏固的制度，而是個破碎的制度，乃是由於制度的基礎不夠穩固。個人主義的權力運作方式對葉爾欽有利，可以依個人意志獲取權力，但卻不利於俄羅斯國家與民眾的福祉。葉爾欽的領導方式削弱了行

政效力，藉由操縱總統辦公廳和行政部門來強化自己的權力，遂行自己的政治目標，與此同時，這種領導方式也強化行政官僚貪污的能力，避免正當程序的空間。布瑞勞斯著重分析葉爾欽的領導風格，強調葉爾欽的政治運作技巧，他認為，葉爾欽的統治方式與蘇聯時期的領導人大同小異，可說是延續了蘇聯的政治文化傳統。

2. 瑞格畢 (T. H. Rigby)³⁴

瑞格畢在《蘇聯的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 一書³⁵中，以職官名錄 (nomenklatura) 為中心來分析蘇聯時期的「侍從主義」(patron-client)。蘇聯共黨以職官名錄作為政治精英徵選的系統，透過這套制度，蘇聯的高層領導人建立起自己的人馬和派系，蘇聯領導共黨總書記藉由人事任命權建立起全國性的管理機制。領導者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與權力關係的考量來選擇人馬，其中，互惠的關係是隨附依從的核心，派系領導人必須保護追隨者，追隨者必須對領導人展現忠誠度。蘇聯領導人藉由在黨機構中安排自己的人馬來鞏固權力，史達林 (Joseph Stalin) 是個最佳的例子。侍從關係是蘇聯政治的重要結構。政治侍從主義在蘇聯的發展，起源自蘇聯革命後。侍從主義在地方黨部與中央機構是十分盛行的規則與運作方式，領導人運用在黨中央委員會與黨機關人事任命，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效忠領袖的控制機制，在以此系統來貫徹其政策。史達林成功地部署人馬打敗爭取繼承領導權位的敵手，並使自己成為最高權位的命令者。史達林的跟隨者依賴史達林的個人恩惠，同時史達林的人馬也試圖建立自己的跟隨者，而反過來，史達林也必須依賴其人馬所擁有的跟隨者獲得支持，來管理、貫徹其政

³⁴ T. H. Rigby,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pp.73-112. T. H. Rigby and Bohdan Harasymiw,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USSR and Yugoslavia*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

³⁵ 所謂的職官名錄，是蘇聯各級機構的主要職位表，為一記載各重要職務人員的名冊，藉此共黨可以進行控制人事的變動升遷。這份名冊包括社會各層面，諸如黨、政、軍、工會、報紙、工業、科學、教育、藝術等部門的任命。

策。互惠性的依賴是侍從關係的核心，權力資源是不對等的。這些現象雖然是蘇聯時期的，但是在俄羅斯時代仍然存在。

除了從職官名錄與共黨的組織來分析蘇聯領導人的統治方式外，伊施特（Gerald M. Easter）從蘇聯國家體制建立的角度來分析，提出蘇聯在 1917 年 10 月革命後所建立的極權國家體制是經由私人關係網絡所形成的，而不是過去一般理論所認為的是經由組織與制度所建築而成的。整個蘇聯國家的體制是在經歷的將近 20 年的時間過程中逐漸形成而趨於完備的。實證研究顯示，蘇聯在革命後蘇共的黨組織只控制了莫斯科中央，國家正式組織的命令在地方無法發揮作用，政策遭受到地方的忽略與漠視。相對於正式組織的結構，伊施特強調非正式的私人關係在建構蘇聯政治與經濟體系的作用，列寧利用這批革命同志的私人關係網絡來確保組織與制度建立過程的控制力和統治力。³⁶這個觀點解釋了在正式制度建立的過程中，非正式的私人關係有助於正式制度的建立，並且附屬在正式制度之中。

3. 威列頓（John P. Willerton）

威列頓認為俄羅斯雖然民主化，但是並未降低非正式聯繫與法治外安排的重要性，加上制度的混亂與運作不良，更進一步增加菁英運用非正式的運作途徑。威列頓對蘇聯派系政治的侍從主義有深入的分析³⁷，威列頓從派系政治的途徑來分析葉爾欽的幕僚與用人，將葉爾欽身旁的人馬區分為兩類：一類是長期的同僚（long-term proteges、如葉爾欽在斯維得諾夫斯科 Sverdlovsk 及莫斯科的同僚）、

³⁶ Gerald M. Easter, "Personal Networks and Postrevolutionary State Building Soviet Russia Reexamined," *World Politics*, vol.48 (July 1996), pp.551-578.

³⁷ John P. Willerton, *Patronag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威列頓分析蘇聯的派系政治附著在整個共黨官僚的層層體制（bureaucratic hierarchies）之內的，具有中央化（centralised）、分層化（stratified）的特性。蘇聯時期高層領導在沒有監督與制衡機制的政治環境下，極易透過賦予政治權力給部屬，建立起效忠自己的派系人馬。

另一類是短期的庇護者(short-term client，以學界出身的顧問及七大財閥為主)；如果以其組成份子層面來分析，葉爾欽用人包括各種派系，早期雖然以蓋達等激進改革派人士為主，但也在總統辦公廳方面任用彼得洛夫 (Yurii Petrov)、斯科柯夫 (Yurii Skokov) 等保守派份子；³⁸ 威列頓對兩類人馬的劃分主要以關係來區分。1993 年及 1995 年葉爾欽面對國會兩次大選反對派勢力增強，開始增加其他中派人士的入閣，甚至包含少數保守派。雖然葉爾欽一直被稱為改革派，但葉爾欽的政策偏好並不固定。許多改革派人士在 1995 年車臣戰事後正式與葉爾欽分道揚鑣，但是，葉爾欽對此並不感到憂心，他隨時聯合不同勢力的人馬來穩固自己的地位，葉爾欽一直維持一個有效的政治聯合來對抗其他新舊政治聯合的對抗。

另外，除了人馬之外，葉爾欽尤其在面臨政治與經濟危機時，一定會尋求政治同盟 (political allies)。葉爾欽的政治盟友主要有經濟領域的部會首長、利益團體領袖與地方領導人。魯須柯夫 (Yurii Luzhkov) 與葉爾欽在過去就是好友，1996 年總統大選時，魯須柯夫為防止共產黨復權力挺葉爾欽，對葉氏連任貢獻不小，但魯須柯夫在第二度當選莫斯科市長後，開始展現問鼎克里姆林宮之心，犯了葉爾欽的大忌，甚至與普里馬柯夫結成政治盟友，兩人由是反目。普利馬可夫的情況相似，葉爾欽為化解共產黨和反葉勢力杯葛，拔擢普利馬可夫為總理，希望藉由普里馬柯夫鎮住國會的反對壓力，但普里馬柯夫卻不僅與國會合作良好，且成為俄羅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政治人物、流露出角逐總統寶座之意，葉爾欽就出奇不異地將普里馬柯夫解職。威列頓將葉爾欽底下的兩類人馬與政治盟友稱為葉爾欽網或葉爾欽集團 (Yeltsin network, Yeltsin team)，這些人主導著俄羅斯的政治決策。

4. 傑森 (Donald N. Jensen)

³⁸ John P. Willerton, "Post-Soviet Clientelist Norms at the Russian Federal Level," in Graeme Gill ed., *Elite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52-76.

傑森認為俄羅斯目前同時並存四種決策模式，而主要是侍從政治的決策模式為主。傑森認為每一項政策均會對不同的個人或團體造成不同程度的利益與損害(benefits and costs)，根據政策對不同對象所造成的損益來區分，提出四種決策型式，亦即多數政治(Majoritarian politics)³⁹、利益團體政治(Interest group politics)⁴⁰、侍從政治(Client politics)、企業家政治(Entrepreneurial politics)。⁴¹

侍從政治是指某一特定團體受惠，而廣大社會利益卻受損的政策。由於只有特定個人或團體受惠，因此受惠者會有強烈的動機進行組織行動與遊說；而廣大的社會民眾的總和損失雖大，但平均之後，個別的利害損失微小，可能會漠視或忽視這些政策；如果想要取得權益，則必須大量動員民眾，不僅成本龐大、效果也不佳。委託銀行(authorized bank)的設立即是一例。侍從政治通常是私底下秘密進行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侍從團體會在政府或國會中尋求保護者，因此，侍從政治中貪汙受賄的現象高於多數政治。⁴²

傑森認為如果俄羅斯是民主政治，則政府政策必須達到能代表大多數人利益

³⁹多數政治是指能使多數人獲益，但也相對使多數人遭受損失的政策；例如，退休金的福利制度，亦即幾乎所有俄羅斯人能獲得退休金，但他們同時也必須支付社會福利制度的負擔。由於這類政策議題廣泛，牽涉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使得俄羅斯的公眾輿論十分薄弱，而這類政策是屬於經常性的重要議題。利益團體在這類政策上的活動力與影響力較低，人民亦無較大意願去加入利益團體；另外，這類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經由政治制度規則決定。

⁴⁰利益團體政治相對於多數政治，是指使相當少數且特定團體受惠，並使另外一群特定團體利益受損的政策；例如，私有化，亦即如果政府決議將國營企業以低於市價水準的價格出售給某一金融工業集團，同時將使其他金融工業集團利益相對受損，其中，最佳的例子是 1995 年金融工業集團合作向政府提出的抵押拍賣(loans for shares)。1997 年因抵押到期，國營企業開始進行私有化拍賣，葉爾欽原先默許金融工業集團私下協調分配國營企業股份，但突然宣佈競標拍賣應由最高標者獲得，引發金融寡頭間的戰爭。公眾輿論在利益團體政治中幾乎無影響力，而是幾乎只有利益團體在政策議題中相互激烈競爭，以防自己的利益受損。

⁴¹ Donald N. Jensen, How Russia Is Ruled --1998,取自自由歐洲電台網站
<http://www.rferl.org/nca/special/ruwhorules/policy-6.html>.

⁴²企業家政治是使整個社會大部分受惠，而小部份社會利益嚴重損害的政策；例如，軍事改革、縮減煤礦產業、土地改革。由於這類政策的受惠者眾多，可以惠及整個社會，則反而使得眾群團體企圖推動此一政策的動機較弱，無法團結起來；相反的，此一政策的利益損害雖是少數，但這群少數反對者卻經常能組織起來，成功地迫使政策無法推行，反而在這項政策議題中獲勝，因而，此類政策並未能順利制定與執行，經常處於延宕無法推行的局面。

的標準，屬於多數政治或企業家政治；但事實上，俄羅斯的政策是由少數人所決定，少數人利用其優勢地位與資源把持政策制定權，經常形成少數人獲益的局面，因而利益團體政治與侍從政治較符合俄羅斯的決策模式。而傑森所指的侍從政治正是派系政治。

5. 茅 (Vladimir Mau)

俄羅斯國內學者雖然傾向以派系來分析俄羅斯的政治，但較有系統的分析只有茅。不過，茅強調的是政策的分析，並提及派系的某些互惠、從屬的侍從主義等觀念，亦即茅雖然用派系這個名詞來界定政治人物的政策立場，但實際上，茅的分析方式不是用傳統的派系理論，而是用政策集團途徑。⁴³茅認為不同的政治勢力掌握政權，其實行的經濟政策就不同，因而造成經濟的不穩定與波動。茅將俄羅斯的政治人物分為兩大派系，一派是俄羅斯的改革派，屬於右派，傾向控制通貨膨脹，稱為反對通貨膨脹派 (anti-inflation faction)；而中間派與共產黨、農民黨等左派則傾向以通貨膨脹為代價換取高就業率，提倡補助企業來提振生產，稱為贊成通貨膨脹派 (pro-inflation faction)。俄羅斯政府的組成份子，在經改初期改革派是主力，但後來改革派的政策對企業與人民的衝擊過大，政策力道轉弱，中間派人士紛紛進入政府，政府內部逐漸以中間派為主，並且受到共產黨佔多數的國會影響下，政策方面，穩定化從壓制通貨膨脹轉為以追求經濟成長為目標。分析俄羅斯派系的主要學者是威列頓與茅，威列頓的觀點屬於權力動機學派，茅則是屬於政策偏好學派。

俄羅斯國內對經濟政策立場的劃分有許多不同的劃分方式，茅將俄羅斯的經濟中分為兩大派，分別是贊成通貨膨脹與反對通貨膨脹兩派；另外許多研究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學者則再細分為貨幣學派或改革、中間派與保守派，或四分法如左

派、中間偏左、中間偏右、右派，來作為派系分類和政策辯論分析的基礎。西方學者則傾向以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改革派與反改革派來作為區分。俄羅斯學者與西方學者對賦予政策立場名詞最大的不同在於，俄羅斯認為國內沒有改革派與反改革派之分，所有的派別都支持改革，堅持要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改革，政策立場的差別來自於對改革方式的差異。

政策分析是個十分不錯的分析途徑，但是，我們會發現某些政治精英無法用經濟政策的立場來區分他是屬於哪個派系。另外，如果用經濟政策來分，某一個政治人物偏左，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卻可能是偏右。因此，這樣的分類會產生某些問題。另外，就單純以改革派來說，改革派中的蓋達、雅伏林斯基和楚拜斯三個人為例，三人是處於相互對立的狀態，不同陣營。蓋達是個清廉的改革派，雖然在政府中三上三下，最後選擇離開與葉爾欽反目成仇。雅伏林斯基則始終是個堅毅的改革反對派，對政府的所有政策加以批評，可以說是個為了批評而批評的政客。楚拜斯雖然是改革派，但卻將財閥引進政府，結合財閥共同貪污，是俄羅斯人民最痛恨的改革派人物。

政策辯論的本質常常是政治權力鬥爭。經濟政策的辯論並不如一般人所認為的只是一種純學術、學理上的思辨。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均有其背後的權力鬥爭在驅使、推動著，而這些力量才是真正主導經濟政策走向的來源。各國的經濟政策常是政治上考量多於經濟層面，成為執政者的權力工具。觀察蘇聯時期歷次的經濟政策辯論，克里姆林宮的權力鬥爭與派系政治是主導政策辯論的動力。

6. 王定士

⁴³ Vladimir Mau, "The Ascent of the Inflationist," *Journal of Democracy*, pp.32-35.

王定士借用布瑞勞斯的觀點、運用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 探討俄羅斯的軍事、外交政策與經濟決策的過程。前蘇聯與當前俄羅斯領導階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意見溝通、政策辯論與及利益交換等活動。在此過程中所運用的派系聯盟、政策辯論、說服技巧、鬥爭策略以及妥協藝術等，統稱為克里姆林宮政治(Kremlin politics)。而研究此一活動及現象的學術領域，則稱為克里姆林宮學(Kremlinology)。克里姆林宮學的分析型態有兩種：其一為純權力動機學派(pure power motives)，其二為政策偏好學派(policy preference)。這兩個學派的辯論集中在領導階層的動機，相互之間進行無止無休的辯論。布瑞勞斯對於上述兩種分析型態提出批判並自創「樹立權威」(authority-building) 研究途徑，力圖調和並綜合上述兩種分析途徑。王定士認為這兩種學派同等重要。王定士進一步提出，蘇聯瓦解後，雖然俄羅斯致力於推動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改革，但蘇維埃的政治文化仍揮之不去，威權主義深深烙印在俄羅斯領導精英的心中，因此，克里姆林宮的政治遊戲規則並沒有實質改變，葉爾欽作為一個成功的權力平衡者，必須隨時掌握派系政治的動向，以合縱連橫的政治藝術，來鞏固其政權。⁴⁴

7. 鄭異凡

鄭異凡在「葉爾欽現象」這篇文章提出所謂的「葉爾欽現象」是指葉爾欽民意支持度低，卻能統治俄羅斯。葉爾欽打著民主派的旗號起家，後來卻不諱言自己是「新沙皇鮑里斯」(Czar Boris)；葉爾欽是個集民主派、獨裁者、冒險佳、賭徒、病夫於一身的人物，在他的統治下，俄羅斯政局不穩，經濟一團糟，葉爾欽沒有能力使國家擺脫困境，走出危機，1999年議會列舉五項罪名彈劾葉爾欽，

⁴⁴王定士，「車臣戰爭研究：車臣戰爭決策中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第二期，民國88年，頁233-2256。王定士，「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外政策路線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羅斯學報》，創刊號，民國90年，頁61-97。王定士，「俄羅斯金融寡頭在民主化與經濟改革的角色」，《俄羅斯學報》，創刊號，民國90年，頁11-60。

儘管沒有通過，沒能超過議會的一半票數。葉爾欽執政八年，連任總統，多次病危仍牢牢掌握國家大權，擊敗一個又一個的敵手，這個俄國歷史罕見的現象稱之為葉爾欽現象。鄭異凡從葉爾欽的性格與政治行為來分析。葉爾欽個性堅強、敢於冒險，敢於出險招怪招，建立一個有利於自己的體制，依靠盟友，用吸引民眾的口號和措施。鄭異凡雖未提及俄羅斯的派系政治，但是，在關於葉爾欽的統治方式方面，十分強調葉爾欽的用人方式，而這一部份就是符合了其他學者所提出所謂的派系政治。

8. 葉爾欽家族

在研究俄羅斯政治中，「葉爾欽家族」已經是個相當重要的研究對象，尤其是在 1997 至 1999 年葉爾欽四度撤換總理的觀察與分析上，許多學者都將其背後的因素歸諸於葉爾欽家族的影響力。葉爾欽家族的組成，實際上就是藉由私人關係、共同利益所組成的一個集團，葉爾欽家族的成員藉由與葉爾欽緊密接觸、利害關係等方式，不斷地影響葉爾欽的決策，達成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因此，葉爾欽家族與派系具有相同的特質，均是以私人互惠關係所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準利益團體。葉爾欽家族這個名詞，不是指與葉爾欽有血緣關係的親人，而是與葉爾欽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士所組成的生命共同體。葉爾欽就是這個個家族的大家長。葉爾欽家族的組成人物究竟包含哪些，具有爭議。嚴格說來，「葉爾欽家族」的成員有葉爾欽、葉爾欽的女兒塔吉雅娜⁴⁵（Tatyana Dyachenko，曾任總統顧問、葉爾欽的形象設計人）、楚拜斯、貝瑞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i）、佛洛辛（Aleksandr Voloshin）、尤馬雪夫、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而

⁴⁵葉爾欽連任成功後，塔吉雅娜雖然沒有擔任任何官職，但卻對國家事務發揮了若干的影響力，外界與葉爾欽打交道變得越來越詭異和難以捉摸。有政客在報上抱怨說：「總統不僅在交談時學會了爭辯，而且，一些原來談定的事兒，也會因塔吉雅娜的干涉而被改變得面目全非！」被革職的原葉爾欽鷹派侍衛長科札科夫說：「塔吉雅娜不僅幫葉爾欽出謀劃策，而且常常令人吃驚地幫葉爾欽把許多大事乾淨利落地辦完！」孔寒冰、關貴海，《葉爾欽執政年代》（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2000年）。

廣義地說來，葉爾欽的人馬都可算是葉爾欽家族的成員。這群人的利益有時亦會發生衝突，尤其是，楚拜斯與貝瑞佐夫斯基經常發生歧誤。但葉爾欽家族的成員還是願意維持和諧以共同保有權力、影響力和所能帶來的財富。在葉爾欽健康惡化情況下，這群葉爾欽家族利用機會大大地擴張自己的影響力。一些專家說，葉爾欽家族控制了國家機器與國家財富，對俄羅斯經濟那些可大量製造財富的行業握有壟斷性控制，包括公共事業、媒體、石油、工廠，而控制這一切的人，不超過四十人。葉爾欽家族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家屬親信利益共同體，有人稱之「克里姆林公司」。他們以「私有化」之名，將大量國公營企業如石油、電力、媒體等不費任何本錢地移轉到家屬親信手中。這些家屬親信及新特權，在赤貧化的俄國過著富逾王公的豪華生活。他們的特權公司可以不必繳稅，而前葉爾欽貼身衛士領班費奧多諾夫所掌控的「全國體育基金會」，則特許免稅進口高級洋菸洋酒，進口額高達六兆盧布，供特權新貴們享用。葉爾欽家族的勢力在葉爾欽下台後，勢力不斷地減弱。普亭就任後對總統廳進行改革，其中就解除了葉爾欽女兒在總統辦公廳顧問的職務，另外，普亭為了擺脫財閥的控制，也對貝瑞佐夫斯基與古辛斯基進行調查，兩人均被提起貪污訴訟、甚至被迫流亡國外，兩人的影響力已不如從前。

事實上，政治家族的概念來自蘇聯時期。蘇聯時期，由於對組織控制力弱、要建立動機，中央強化個人統治，採取家族集團這樣的運作方式，結合地方領導人、黨與蘇維埃代表、安全單位、媒體以及生產單位國營企業和國營農場。家族集團的本質是相互提供保護，相互協調地方事務。⁴⁶

從上述學者對俄羅斯派系的研究，我們可以確定俄羅斯目前仍存在以侍從主義為中心的派系政治，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延續了蘇聯時期的克里姆林宮派系政治及政治遺緒。葉爾欽父權式的領導方式與權力政治也是構成俄羅斯派系政治的重

要成分。運用過去的克里姆林宮學的派系鬥爭來分析民主化後的俄羅斯政治具有適用性的問題，而不適用的原因主要是派系鬥爭是指共產黨一黨之內的權力鬥爭，俄羅斯目前是多黨制，無法以一黨之內的派系政治來作分析。但是，俄羅斯雖然是多黨林立，但總統不加入任何黨派，而且權力高於各黨派與政治人物，具有在各黨派間運籌帷幄的實力；再加上俄羅斯政治精英對政黨政治的態度並不成熟，寧願為政治利益而犧牲其政黨的認同，因此，葉爾欽可以說是俄羅斯所有政治勢力的至高領袖、平衡者。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研究範圍以葉爾欽時期，亦即 1992 年 1 月 1 日葉爾欽展開改革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葉爾欽辭去總統職務下臺止，研究時間必須從俄羅斯獨立以後算起，不包括葉爾欽在擔任俄羅斯總統前的時期。葉爾欽在擔任俄羅斯總統前，雖然已經有自己的人馬，但是葉爾欽尚未具有立於各派系之上的地位，葉爾欽只是派系政治中的一個派系領袖。另外，葉爾欽雖然在 1991 年 6 月當選為俄羅斯的總統，但在蘇聯解體前，葉爾欽仍舊尚未具有全國性領導人的地位，在這個階段，葉爾欽專注於從戈巴契夫手中搶奪權力。到了俄羅斯獨立後，俄羅斯取代蘇聯的國際地位，葉爾欽亦取代戈巴契夫成為全國性的領導人。而葉爾欽在進入這一個新的階段後，才開始鞏固自己的勢力，真正的建立起自己的派系人馬與派系政治，並在 1993 年底通過新憲法後確立自己派系至高領袖的地位。派系政治研究的對象是俄羅斯的派系，是葉爾欽底下的人馬，包含保守派的長期追隨者、改革派的短期庇護者和採取策略合作而作為葉爾欽人馬的短暫政治盟友。而由於葉爾欽所能掌控的是總統辦公廳與政府，因此主要以俄羅斯的中央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為主軸，包含葉爾欽身邊的重要幕

⁴⁶ T. H. Rigby,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僚，總統辦公廳與政府這兩大行政部門。此外，由於葉爾欽的派系政治也受到俄羅斯當時政治與經濟環境因素影響，因此屬於立法部門監督機關的國會、政黨、利益團體也是重要的分析對象。而派系政治運作中所伴隨的政策辯論與人事變動都是研究的範圍。在政策辯論上，將以俄羅斯經濟改革的私有化和穩定化為分析主軸。而關於人事變動方面，將依時間順序分六任總理來闡述葉爾欽如何藉由不斷撤換人馬或尋找政治盟友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基礎。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方法與限制

對於派系的研究，人類學者、政治評論家著力較多，多採取田野訪問觀察的方式，企圖瞭解派系內部的種種活動，包括這類小團體的權力結構、運作與傳承，這種研究途徑基本上是屬於社會學的觀點。基本上，派系政治的研究屬於政治菁英研究途徑，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為了更有系統地分析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將不侷限於採取傳統的研究途徑，而是嘗試以制度研究的途徑來分析俄羅斯非正式制度派系政治的運作。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論文利用派系政治的理論來分析，而目前研究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理論不完整，因此，本論文嘗試將學者現有的派系分析加上其他較完整的派系理論，參酌俄羅斯的政治現況，設計出自己的分析架構，提出影響俄羅斯派系穩定程度的指標與俄羅斯派系演進的階段。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採取傳統的派系理論、結合學者對俄羅斯派系的分析途徑，並注重制度與結構對派系政治的影響因素。

另外，派系是個十分複雜的分析對象，派系的組成與成員是不對外公開的。俄羅斯派系的侍從關係與互動，都是學者與政治觀察家不間斷觀察俄羅斯政治事

件，所歸納整理出來的一個大致脈絡的成果。對於俄羅斯派系的界定方面，由於許多時候派系間的人馬會出現轉換，或者派系間的關係過於複雜，經常進行合作或敵對的結盟與對抗。因此無法做出非常詳細的分類，或者，即使可以藉由進一步的人物訪談達到最清楚的分類，但過於細節的歷史敘述，可能無法兼顧一個較為系統性的分析。為了求分析方便，在各個階段的派系政治分析上，將以勢力最大且敵對的兩個派系作為分析對象。

為了解釋派系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本文將結合派系政治、政策辯論與經濟景氣循環來解釋俄羅斯經濟何以無法進入一個較為穩定發展的局面。權力與利益是派系組成的因素，因此，權力的對比與利益的匯合或衝突是導致派系互動的因素。而在派系的互動過程中，政策辯論也是重要的一環，派系對私有化及穩定化政策有激烈的爭辯，促使俄羅斯的改革政策不斷擺盪。對於經濟政策的辯論，我們一般的分析對強調改革與反改革的對立，分析的主軸都是改革如何受到反對勢力的阻撓。然而，更確切的分析經濟政策，應該以改革政策對不同團體、個人造成多少經濟利益與損害來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派系是以自己的關係和勢力基礎來決定自己的政策立場，例如，斯科柯夫與軍工複合體有關係，必然會為軍工集團爭取國家補助的利益；齊諾梅爾金與天然氣工業有關，必定會爭取有利於天然氣工業的經濟政策；蓋達、費多洛夫（Boris Fedorov）與楚拜斯與新興資本家、私人企業經理人關係良好，必然會堅持開放改革的經濟政策；共黨與農民黨的支持力量來自職工、農民，則共黨與農民黨必須為職工、農民爭取權益。穩定化政策環繞在緊縮與擴張間循環，緊縮政策有利於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擴張政策則有利於舊式國營企業、經理人與職工；而派系就是為了強化自己的勢力，才採取不同立場的政策。

在研究資料方面，主要採取葉爾欽的自傳⁴⁷、葉爾欽的專書、重要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另外，克列布尼柯夫（Paul Klebnikov）根據對俄羅斯許多重要政治人物的訪談所寫成的克里姆林宮之父（Godfather of the Kremlin）⁴⁸都是十分珍貴的資料。然而，以上這些資料都是政治人物對政治事件的自我觀感，可能有失之偏頗的地方，不能盡信。在俄羅斯的新聞方面，由於取得俄羅斯俄文雜誌極為不便，主要以挪威國際事務研究學院的「俄羅斯研究中心」（Centre for Russian Studies）的人名資料庫與事件資料庫為資料來源。⁴⁹

二、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論述研究動機與研究文獻。本文的研究動機乃是因為俄羅斯報章媒體經常運用「派系」這個名詞或「楚拜斯幫」等來分析政治事件；許多政治事件不僅是政治制度的運作，更牽涉到政治人物間的私人關係與非正式運作。雖然派系是目前學者與政治觀察家最喜歡使用的觀察途徑，但似乎較偏重政治事件的描述，尚未有一個較為完整分析，因此，希望透過此論文嘗試對俄羅斯的派系做一個系統的分析。藉由文獻分析整理出派系政治基本理論和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大致輪廓，以作為下面各章的研究依據。目前研究派系政治具有最完整理論的是中共的派系政治研究，對於俄羅斯派系的研究雖然不多，但極具參考價值。第二章論述派系政治的形成，從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兩個的層面來分析俄羅斯之所會形成派系政治的原因。在正式制度方面，超級總統制強化了派系

⁴⁷ 目前為止，葉爾欽總共出版了 3 本自傳。Boris Yeltsin,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Boris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Boris Yeltsin, *Midnight Diari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⁴⁸ Paul Klebnikov, *Godfather of the Kremlin Boris Berezovsky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Y: Harcourt Int., 2000).

⁴⁹ 挪威國際關係學院（The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UPI）底下的俄羅斯研究中心有詳細的研究資料庫。資料庫的內容整理的很有系統，可以依據政治人物、政黨、政治機構與政治經濟事件快速查詢到所需的資料。這個資料庫的新聞事件收集了俄羅斯國內報紙、美國報紙與自由歐洲電台等來源的新聞，極具參考價值。另外，引用這個資料庫最大的好處是這個資料庫保存從 1991 年年底以來到目前所有新聞資料，不像其他資料庫，只能追溯前一兩年的新聞資料。http://www.nupi.no/ForskEng/forsk-set-en.htm

運作的空間；而傳統的俄羅斯與蘇聯政治文化影響俄羅斯政治菁英的行為模式，仍舊習慣採取派系運作模式。第三章是派系政治的運作，根據派系理論與學者的俄羅斯派系政治分析，重新界定俄羅斯的派系，進一步提出俄羅斯派系政治的互動。俄羅斯派系政治有其基本規則與兩種模式，另外，運用派系平衡者的權力是否鞏固與政經局勢的穩定與否兩項指標，來評估俄羅斯派系的穩定程度；再以時間為縱軸，觀察俄羅斯派系結構的演變，說明俄羅斯如何歷經派系建立期、派系穩固期與派系混亂期。第四章是派系政治的影響，說明派系政治對俄羅斯政治不穩定與俄羅斯經濟政策轉變的影響。政治方面的不穩定將以葉爾欽不斷撤換其下的人馬來作說明，經濟方面將以穩定化與私有化政策來說明派系政治如何造成俄羅斯經濟政策的決策僵局與政策擺盪，並且形成俄羅斯嚴重的結構性貪污問題。第五章則是結論，提出本論文對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研究發現，並對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做一番評估。



第二章 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形成

以制度或組織的角度來分析，派系政治是一種非正式的政治制度、一種非正式的組織。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都是人所建立的。本章要探討俄羅斯派系政治如何形成，就是要探討哪些因素促使俄羅斯政治菁英選擇非正式制度—派系政治作為其制度抉擇。在討論歐洲後共產國家制度抉擇的文獻中，歷史先例（包括共產制度建立之前的傳統和列寧主義政權所遺留的傳統）、鄰近國家示範效應、政治文化、精英理性抉擇等因素都被提出來解釋東歐和前蘇聯共和國的迥異發展。克勞福（Beverly Crawford）與李帕特（Arend Lijphart）將制度轉型的文獻分為兩個學派，一派強調列寧主義的制度遺緒（legacies of the past），認為後共國家的制度轉型受到長期共黨專政和蘇聯控制的影響，在制度抉擇上偏向威權體制；另一派則強調後共民主國家在制度選擇上有很大的空間，國際上的壓力也可以產生很大的作用，而這些都可以抵消長期共黨統治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除了對制度遺緒的討論外，精英的理性抉擇也常被用來解釋新制度的產生。⁵⁰綜合兩派觀點，我們歸納出影響俄羅斯菁英的制度抉擇主要來自於正式制度因素與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亦即正式制度提供了隱藏性的誘因，給予政治菁英派系運作的空間；而政治文化影響政治菁英的政治行為，延續了過去政治菁英派系運作的習慣。

派系是正式制度下的隱性結構，換言之，派系是正式制度裡的附加物，不但依附在既有的正式政治制度之上，有時還會發揮破壞正式政治制度的力量。派系之所以可以依附在正式制度之上，表示正式制度有所缺失，派系正好彌補了正式制度的制度真空。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派系也必須依附在正式制度下，汲取正式制度所賦予的資源，才能維持生存。也就是說，派系是領導者與追隨者兩者間交換政治與經濟利益的自願性協議，如果派系領導人沒有正式政治職位或足夠的經濟利益可以提供給派系追隨者，派系就無法形成。而派系領導人正是因為擁有正式制度中的政治職務與政治職位所附加的權力資源，才得以成為派系領袖。

⁵⁰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 1992-1999》（台北：五南，民國 89 年），頁 53-54。

派系領袖藉由正式政治職位的力量，提供政治與經濟利益給追隨者，建立起自己的派系人馬，並透過可能從追隨者手中取回政治與經濟利益來確保派系人馬對他的效忠。

正式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是形成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兩大因素。就制度的因素而言，俄羅斯的政治正式制度運作不良，提供了非正式派系政治彌補正式制度不良的空間；另外，俄羅斯政治制度的設計亦具有強化派系政治運作的效果，例如超級總統制讓葉爾欽得以成為眾多派系的至高領袖，具有協調各派系的最後仲裁能力。如果俄羅斯是內閣制或傾向內閣制，則總理的權力大於總統，而葉爾欽可以成為派系平衡者的可能性就相對於超級總統制低。而促使俄羅斯政治正式制度運行不良的原因除了制度設計本身存在問題外，決定制度抉擇的政治精英與政治文化是更根本的因素。俄羅斯與蘇聯政治文化中的侍從主義、父權式領導、缺乏法治也是促使派系政治形成的一個深沉潛在的因素。

俄羅斯的民主機制雖已建立，但正式制度在運作與實行上尚未穩固，其政治運作仍以非正式政治的派系鬥爭為主。⁵¹正式制度的設計與政治精英的實際運作經常是存在許多差距的。總括而言，俄羅斯正式制度與政治文化，促使派系鬥爭成為決定俄羅斯政壇勢力轉變的動因。超級總統制賦予葉爾欽極大的權力，使葉爾欽成為派系鬥爭中的權力平衡者與派系政治的權力中心；政治文化中的侍從主義促成俄羅斯政治形成以某一人物為中心領袖，並以私人關係為聯繫、權力結構為基礎的派系林立的局面。

對於俄羅斯派系政治形成的因素將區分兩大部分來分析，第一部份將分析俄

⁵¹ 俄羅斯已經走向民主政體，但其政策制定過程是否真正符合民主的程式，能夠發揮民主的作用與功能，卻大大地令人感到質疑。在俄羅斯民主政治的外衣下，其內涵的本質卻是與民主截然不同的寡頭統治色彩，更甚者，有人更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犯罪國家 (criminalized state)。或者，亦有學者認為俄羅斯仍帶有極強的威權色彩。俄羅斯政府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舊蘇聯的新政權，而實實在在是個承續舊蘇聯的政府。俄羅斯的政治是由過去蘇聯政治文化轉化而來的另一個新的過程與階段，仍濃厚地帶有過去那套特殊的信仰、行為與統治的制度安排。俄羅斯的政治制度雖然借自西方，但俄羅斯政治文化與蘇聯過去歷史的影響持續性地處處顯現在目前俄羅斯的政治運作。許多學者認為，現在與過去不能完全斷絕，整個轉型的過程是具有連續性的。而過去仍深深地影響著現在的發展。而對於過去的價值評斷，多數學者是持負面的看法的。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75.

羅斯的政治正式制度如何提供派系運作的空間，第二部分則分析俄羅斯帝國與蘇聯政治文化的遺緒如何促成派系政治形成。另外，由於制度抉擇的主角是政治菁英，政治菁英中又以葉爾欽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關鍵，因此，第三部分將從葉爾欽的領導風格⁵²與性格來說明葉爾欽如何運用政治權術與用人策略，使得自己能獲得派系人馬的效忠，讓自己的總統權力立於所有派系之上。

既然制度因素與政治文化是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形成因素，因此，這兩項因素對俄羅斯派系政治在形成過程中具有極大的影響。本章將在最後中歸結出超級總統制、俄羅斯政治文化的遺緒與葉爾欽的領導風格對俄羅斯派系政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造就了哪些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特點。

第一節 制度因素層面

在制度因素方面，促成派系政治形成的因素可分成超級總統制和不成熟的政黨政治兩個層面來分析。制度可區分為正式的制度與非正式的制度。俄羅斯政治的政治制度是依據憲法架構所形成的超級總統制（superpresidentialism），⁵³俄羅斯的非正式制度就是派系政治。超級總統制的特色是：總統權力過大，總理受制於總統，國會與監察機關的制衡作用太弱。超級總統制提供葉爾欽作為一個派系平衡者應具有的超級權力，足以在建構自己的人馬派系體系時，提供足夠的政治職位、經濟資源或政治特權作為換取派系人馬對其效忠的籌碼。然而，超級總統制亦對葉爾欽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約，超級總統制使得俄羅斯總統和國會時常陷入

⁵² 有五個因素可以解釋葉爾欽的領導風格，這五項因素分別是：葉爾欽的個人特質、蘇聯的政治精英文化、俄羅斯帝國沙皇的傳統、葉爾欽認為這樣的強勢領導方式適合解決俄羅斯的問題、也為了葉爾欽的個人需要。另外，布瑞勞爾認為制度與政治文化、個人性格都是形成葉爾欽領導風格的因素，制度的改變所留下的政治真空、超級總統制都給予葉爾欽破壞制度、運用派系政治的機會。George W. Breslaue, "Boris Yeltsin as Patriarch," *Post-Soviet Affairs* (1999), vol.15, no. 2, pp.186-200.

⁵³ 多數學者將俄羅斯的憲法的政治制度設計稱為超級總統制。John P. Willerton and Aleksei A. Shulus, "Constructing a New Political Process: The Hegemonic Presidency and the Legislature," *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vol. 28, no.4 (Summer 1995), pp.787-825. M. Steven Fish, "The Pitfalls of Russian Superpresidentialism,"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7), pp.326-330.

政治僵局，總統與政府的政治、經濟決策受到國會的制約，而葉爾欽為了推動政務，必須在國會中尋求聯盟者，獲得更廣大派系人馬的支持。

另外，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尚未成熟。許多示威遊行事件顯示，政黨不具有動員民眾改變政府政策的力量；更令人失望的是，俄羅斯某些政黨居然願意為了金錢交換對政府的支持，例如，長期作為國會中第二大黨的自由民主黨的政治獻金主要來自葉爾欽，而自由民主黨在許多關鍵的投票時刻以支持政府來作為交換。葉爾欽雖然不加入任何政黨，但為了贏得國會選舉，在 1993 年、1995 年與 1999 年的國會選舉前幾個月，都曾命令總理或改革派人士在國會組成支持政府的政黨與派系，投入大量的金錢以求贏得席位。葉爾欽並非這些政黨的黨魁，可是這些政黨卻都是聽命於葉爾欽。葉爾欽並未加入上述的任何政黨，而這些政黨卻為了政治與經濟利益，寧願作為葉爾欽的人馬或政治盟友。

一、超級總統制

作為所有派系之上的平衡者，必須擁有最大的權力，才能對派系互動中鬥爭作出仲裁，讓派系不斷維持動態平衡，避免某一派系勢力過大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地位。葉爾欽強力推動俄羅斯走向超級總統制，為自己爭取了極大的權力，因此，可以利用超級總統制的正式制度成為俄羅斯非政治制度派系政治中的平衡者。派系政治雖然是非政治制度，但也是必須在正式制度的框架下運作，因此，在分析俄羅斯派系政治時，並不能忽略正式制度所建構的權力結構本質。

依據俄羅斯 1993 年的憲法，俄羅斯總統具有極大的權力，其權力大過政府行政部門、國會立法部門與總檢察長的監察部門，國會的制衡能力弱、總檢察長與憲政法庭的監督機制亦弱，形成葉爾欽一人獨大的局面。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曾說過俄羅斯總統的權力超過蘇聯時期的總書記。⁵⁴超級總統制使葉爾欽立於俄羅斯其他政治機構與政治人物之上，可以運用人事任命與總統令發揮極大的策略運作空間。俄羅斯總統權力來源在於其人事任命權與總統令的準立法權力，可以在政府部門安插自己的人馬，運用總統令推動政策。總統強大的人事任命權與運用總統令的準立法權推動政府的政策都讓總理、政府與總統辦公廳的人士必須依賴總統的支持。

1. 強勢總統

超級總統制的憲法⁵⁵特點是總統權力極大、議會權力很小、政府缺少獨立性，形成一種「強總統、弱議會、小政府」的格局，三權分立名不符實。

(1) 總統控制政府：強勢總統有權無責，弱勢政府無權有責

俄羅斯的憲政體制理論上是屬於雙首長制，⁵⁶俄羅斯總統在憲法中的角色是國家元首，總理是行政首長；但是由於憲法規定總理的任命需經由總統提名，因

⁵⁴ *Nezavisimaya gazeta*, 23 April 1994.

⁵⁵ 1990年修訂憲法與1993年憲法最大的不同是，1990年的憲法是議會制，一切權力歸為蘇維埃，規定代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不僅擁有立法權，並具有監督行政機關的權力。總統是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擁有領導國家大權。當時議會的權力比總統還大。例如，議會有權修改憲法，立法權，有權批准政府的組成，總統則無權解散國會。總統與議會在1992至1993年間的府會之爭，圍繞權力、修憲、經改的鬥爭衝突。1993年新憲法確立了超級總統制的架構，國會的制衡力量大大地被削弱。

⁵⁶ 憲法規定俄羅斯總統有權依照俄羅斯憲法與法律決定國家內政與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而憲法亦規定俄羅斯聯邦的行政權力由俄羅斯聯邦政府來行使；因此，俄羅斯的行政權是由總統與總理及政府共同行使。請參見畢英賢，《俄羅斯》（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83年）中俄羅斯聯邦憲法，第四章聯邦總統第80條至93條與第六章聯邦政府第110條至117條部分，頁467-482。雙首長制下的兩位國家領導人，位居元首的總統與定位為政府首長的內閣總理，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盡相同；換言之，總統與內閣總理所分擔的政務係因人、因事、因時而互有差異。Jean Blondel, "Daul Leadership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 Step Towards Executive and Regime Stability?" in Dennis Kavanagh and Gillian Peele, eds.,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S. E. Finer*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84), p.75.轉引自吳東野，「『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8期（民國85年8月），頁37-49。

而總理的權力基本上受限於總統，⁵⁷總理有隱約必須向總統負責的義務。憲法中俄羅斯政府的行政權不完整，無法獨立行使；並且必須向總統和國會負責，和總統有上下從屬的關係；總而言之，俄羅斯總統的行政決策權大於總理，而總理與政府的主要權力便在於行政執行權。

在總統與總理的職權分工方面，憲法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十分籠統，總統與總理在行使權力時，如未協調各自職權分工，便會出現相衝突之處與各自為政的局面。俄羅斯延續了蘇聯時期的傳統分工模式，亦即總書記掌握國防、內政、外交全局，經濟政策交由政府負責；因此，外交、國防、內政與安全自然成為俄羅斯總統個人專屬的權力管轄範疇；而經濟事務就通常由總理負責。這樣的分工運作是出於策略考量的，領導人本身通常不瞭解經濟且對經濟事務缺乏興趣，並策略性地以遠離對經濟事務的管理來作為確保擁有最大權力的手段（赫魯雪夫因經濟事務處理不善而下臺，另外，葉爾欽為了增加哈斯布拉托夫的政治負債，將俄羅斯 1992 年改革之初的農業政策交由哈斯布拉托夫負責）。但是總統任命總理直接負責經濟事務並不代表總統也同時賦予總理處理經濟事務的全權，在總統有總攬一切內外政務、大權獨攬的情況下，總統必會關鍵性地介入或干涉經濟決策；即使在其不熟悉的經濟領域，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仍認為經濟綱領應由總統制定大方向，而交由政府執行。⁵⁸

總理在雙首長制中的職能主要是作總統與部會間的中間協調人，但是根據法國、蘇聯與俄羅斯的實際運作經驗可觀察出：總統通常不願意透過總理來統治各

⁵⁷ 在人事權方面，俄羅斯總統事實上對總理組建政府與閣員的任免具有最後的決定權；而在政策的決策權方面：俄羅斯總統可以透過發佈總統命令的方式，不僅不須要經過總理的副署權認可，更可繞開國會的攻擊，不須經過與國會一番折衝或讓步妥協，即可讓自己的政策命令下達，由政府行政機關執行；另外，俄羅斯總統因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可強力主導政策的制定，更可透過在政府部門安插自己的人馬，進而達到影響政策制定的目的。

⁵⁸ Eugene Huskey,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in Russia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residency and Government,"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vol. 22, no. 4(1996), pp. 366-367. 胡斯克說明總統與政府在經濟決策過程中的關係。

部會。⁵⁹俄羅斯總統受到舊蘇聯政治制度遺緒（political inheritance）的影響，將自己視為前共黨總書記，仍希望握有監控政府部會一切決策與執行的權力，使自己立於各派勢力之上的平衡者地位。俄羅斯總統運用總統辦公廳監督政府，如同蘇聯時期共黨總書記運用政府各階層的黨組織來監控政府的決策，運用這種機構職務重疊的方式，讓制度運作混亂，兩個行政單位產生衝突，卻給予葉爾欽更多的權力運作空間。

俄羅斯的政府基本上不是個具備高度行政效能的組織，總統又設立總統辦公室來分散或監督政府的職權，形成兩個權力大小不一、職權重疊的行政系統，造成俄羅斯政策混亂、朝令夕改的情況。而總統在面對國會的指責與民意的不滿時，技巧性地將經改的過錯歸諸於政府；在幾次經濟危機中，葉爾欽以開除閣員表示總統的改革決心，由政府來負擔行政責任，政府在面臨總統與國會雙重的壓力下，只能默默地成為代罪羔羊。

俄羅斯政府在總統的掌控下，成為總統的權力基礎、人馬或結盟者。以俄羅斯的歷任總理為例，葉爾欽與總理的關係可以分成兩種類型，改革派的蓋達、基里延科、史泰巴辛與普亭都是葉爾欽的人馬，而中間派的齊諾梅爾金及普里馬科夫則是葉爾欽面臨政治危機下的聯盟者。每一次都是總統直接任命政府，議會多數派難以進入政府。在人事任命上，只有總理需經過國會的同意，副總理與各部部长、聯邦安全會議和總統辦公廳人員都由總統全權任命。俄羅斯奇特的現象是，少數派可以組織政府，多數派卻難以進入政府；在遭遇政治或經濟危機時，便拉攏中間派勢力入閣，但這樣卻也不能稱的上是聯合內閣。對葉爾欽而言，選擇總理必須符合自己的需求，最重要的是要選擇一個能和自己合作，順從自己命令的總理。但受限於任命總理必須經過國會的同意，因此，葉爾欽有時也必須與

⁵⁹ Archie Brow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X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oul, August 17-21, 1997.

國會妥協，任命國會可以接受的人馬。茲將葉爾欽與六任總理的關係整理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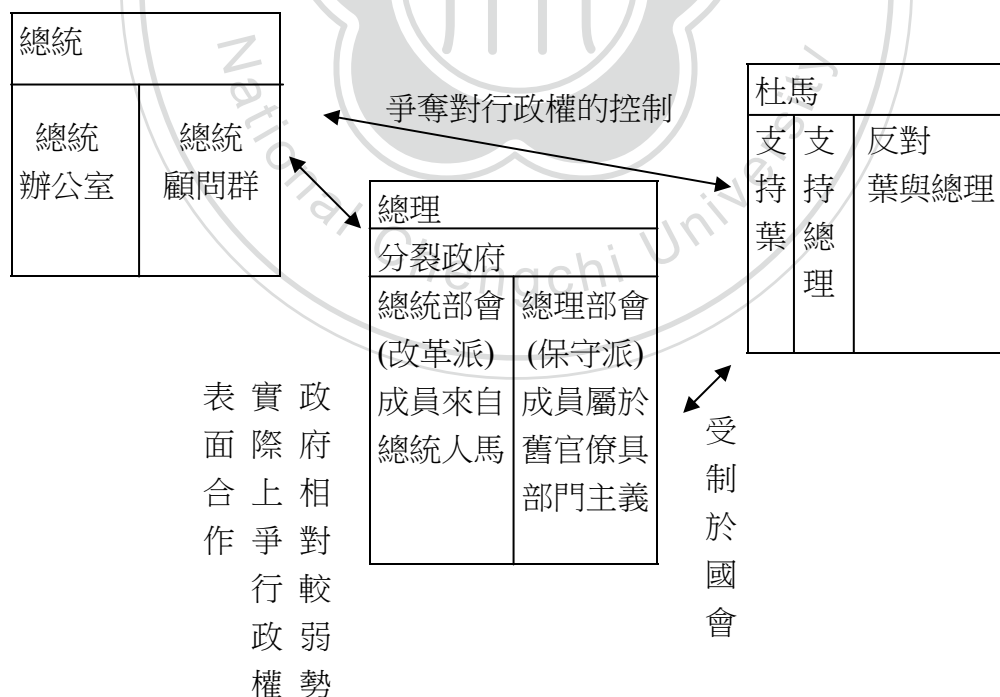
表一：俄羅斯總統與總理合作關係

時 間	總統－總理	關係	分合原因	職權分工	開除原因
1992.1－ 1992.12	葉爾欽－蓋 達 (葉爾欽兼 任總理、領 導政府)	十分良好	1.蓋達完全接受葉爾 欽的命令 2.理念一致	總統－國防、外交、內 政、安全、經濟 總理－專職經濟	國會反對勢力
1992.12－ 1998.3	葉爾欽－齊 諾梅爾金	良好 ↓ 尚可	1.齊諾梅爾金尋求更 獨立的政府施政地 位，不願受制於葉 爾欽 2.理念有出入 3.葉承受來自國際與 國內人民的壓力， 車承受來自部會與 利益團體的壓力	總統－國防、外交、內 政、安全、經濟 總理－經濟、後介入內 政、安全與外交	權力威脅到葉爾 欽
1998.3－ 1998.8	葉爾欽－基 里延科	良好	1.基氏完全聽命於葉 爾欽，本身無任何獨 立的權力基礎	總統－國防、外交、內 政、安全、經濟 總理－專職經濟	金融危機
1998.9－ 1999.5	葉爾欽－普 里馬可夫	良好 ↓ 尚可	1.普里馬可夫有國會 的支持，再加上葉爾 欽健康情況不佳，施 政獨立性大。 2.普里馬可夫施政方 向屬中間派，與葉爾 欽及國會在政策理 念上無大衝突。	總統－國防、外交、內 政、安全、經濟 總理－經濟、內政、安全 與外交	功高震主
1999.5－ 1999.8	葉爾欽－史 泰巴辛	良好	聽命於葉爾欽	總統－國防、外交、內 政、安全、經濟 總理－專職經濟	無法阻止反對派 陣營結盟
1999.8－ 2000	葉爾欽－普 亭	良好	成為葉爾欽的接班人	總統－國防、外交、內 政、安全、經濟 總理－獲得葉的信任，負 責內政、安全與外交	

(2) 制衡機制(checks and balances)微弱

在 1993 年砲轟白宮流血事件後，新憲法關於國會權限的部分顯示出俄羅斯國會對行政機構的制衡機制已經變得相對微弱。國會的制衡能力在總統人事任命的同意權與決策權兩方面都不盡理想。

國會對於總理的任命擁有同意權，但對內閣其他成員如部長等則無同意權可諸行使，僅能透過對總理的同意權、發動不信任案或杯葛議案來施加壓力發揮影響力。在歷次的總理任命案，總統都與國會爭奪主導地位。俄羅斯在葉爾欽任內經歷過六位總理，其中，只有齊諾梅爾金及普里馬可夫不是葉爾欽心中的最佳人選，只是總統與國會雙方彼此都能接受下的妥協人選。剩下的蓋達、基里延科、史泰巴辛與普亭，都是效忠葉爾欽的人馬。政府必須對國會負責任，接受其監督，但國會對政府提不信任案從未成功；相反地，葉爾欽常以總理實行經濟改革不力或經改引發經濟危機等原因開革總理職務。因此，俄羅斯政府傾向總統負責，而不是向國會負責。而關於總統、政府與國會的三角關係，簡要地以圖三說明。



圖三：葉爾欽時期總統、國會與政府的權力競爭關係

俄羅斯總統不需直接對國會負責。根據俄羅斯憲法，國會彈劾總統的程序十

分複雜，困難度高。在實際運作例子中，1999年5月杜馬彈劾總統失敗即是一例。再者，國會的立法權非其所專屬，總統與總理和政府都有立法動議權，但其所提法案必須提交杜馬與聯邦院審議通過，再送交總統簽署及公佈；而總統對聯邦法案有否決權，如總統將法案加以否決後，則杜馬與聯邦院須依照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的程序再度審議該法律；再度審議時，聯邦院成員與杜馬代表總人數中不少於三分之二贊成時，該法律才能以原來通過之版本獲得批准，總統必須在七天內簽署並予以公佈；總統對法案的否決權成為阻止政府、杜馬立法提案權的有力工具。總統發布總統命令並不需要獲得國會的認可，避開複雜的立法程式，不用擔心杯葛。因此，國會對總統令完全無制衡力量。在立法方面，葉爾欽雖然需要國會通過法案來進行改革，但國會故意否決法案，葉爾欽則逕自發布總統令，讓國會完全無招架之力。⁶⁰

國會議員的席位是俄羅斯政治精英覬覦的位子，由於國會議員擁有免於刑事責任的特權和一些優惠的特權，握有立法權，因此成為各界攏絡的對象。國會議員因為害怕喪失這些特權，因此在關鍵時刻，仍舊選擇對葉爾欽作出退讓。國會制衡力量的弱化造成行政權力的相對擴大。俄羅斯國會雖然扮演反對葉爾欽的角色，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由於國會的權力無法對總統產生制衡力量，國會中的某些議員會選擇性地作為葉爾欽的政治盟友。

然而，國會的制衡力量雖弱，但也反映出某一程度的民意，我們不能完全抹煞國會所代表的民意。1993年與1995年的選舉，改革派的政黨未能獲得高度支持，反倒是共產黨與自由民主黨穩坐第一與第二大黨的位置，顯示出民眾表達對政府不滿之意。下議院杜馬與上議院聯邦院的選舉強烈表現出俄羅斯利益團體的力量，國會成為利益團體競爭的場合(arena)。聯邦院是由各地區行政與立法領導人所組成，代表各地區的利益，是葉爾欽重要的拉攏對象，葉爾欽一直與聯邦院

⁶⁰ 請參見畢英賢，《俄羅斯》中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五章聯邦會議第94條至109條，頁473-479。

維持良好關係，有助於葉爾欽維持俄羅斯聯邦的政治完整性。

(3) 監察權受制於總統

俄羅斯憲法第 83 條第六款明文規定，俄羅斯聯邦總統有權向聯邦院提出任命憲法法庭、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法官及總檢察長職務之候選人；並向聯邦院提出關於解除總檢察長職務的建議。總檢察長的任命與罷免是由總統提出，因而監察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在某個程度上無法施展開來。如果總檢察長是葉爾欽的人馬，其立場根本無法達到中立與公正。事實上，俄羅斯的總檢察長根本就是葉爾欽的人馬。

憲法法庭主要的職務是審查總統、國會和政府的作為是否符合憲法，具有限制總統不當擴權的權力，但在實際的運作上，從未做出限制總統權力的決議。俄羅斯總檢察長主要完成界定國會兩院關係、區分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1992 年憲法法庭曾經宣佈葉爾欽將兩個部會併為一個部會違憲。葉爾欽在 1993 年 9 月停止憲法法庭，1995 年才恢復運作。⁶¹

總檢察長史庫拉托夫 (Yurii Skuratov) 在 1997 與 1998 年密集展開貪污的調查案，其中，尤其是牽涉到葉爾欽與葉爾欽家族的貪污案件。史庫拉托夫面臨極大的壓力，最後，葉爾欽為阻止史庫拉托夫的調查，製造史庫拉托夫的醜聞案，在藉此醜聞案解除史庫拉托夫的職務。以上看來，俄羅斯的監察機構對總統的監督能力無法發揮效用。

二、不成熟的政黨政治

(1) 政黨缺乏動員民眾的力量

嚴格觀察起來，俄羅斯無所謂執政黨與在野黨之稱。實際情況是，在政府中有其成員參與的政黨都是參政黨，而那些反對總統和政府方針的統稱之為反對黨。俄羅斯的政府由許多黨派組成，但這種現象卻無學者將它稱為「聯合內閣」。1993 年底國會選舉後，自由民主黨黨魁日理諾夫斯基曾強力向葉爾欽提出組織政府的要求，卻為葉爾欽所拒絕。

俄羅斯的政黨數目曾經高達一百多個，⁶¹但是，多數都是小黨。俄羅斯缺乏全國性的政黨，唯一最具組織規模的政黨是共產黨。蘋果黨是屬於知識分子的政黨，社會基礎不夠廣大。蓋達的民主抉擇黨、齊諾梅爾金我們的家園俄羅斯被稱為總統黨、總理黨，是奉葉爾欽命令所組成的政黨。俄羅斯的多數政黨具有個人色彩。俄羅斯政黨的影響力不大，總統葉爾欽偶爾會與各黨派代表人士會面，舉行所謂的圓桌會議。但這些會面卻從未產生實質的決策影響力。許多政黨雖然扮演著反政府的角色，但是卻缺乏完整的理念與黨綱。另外，不健全的政黨政治使得俄羅斯政黨無法有效號召群眾來對抗政府。幾次俄羅斯罷工都無法撼動政府的威權。

而反對葉爾欽最力的兩個政黨是共產黨和蘋果黨，其中，共產黨雖然是俄羅斯國內的第一大黨，但是，就俄羅斯國內政治觀察家與媒體的觀察，共產黨只願當一個只要動動嘴皮子、批評政府的政黨；共產黨根本不願獲得執政權，挑起解決國家政經危機的重責大任。而蘋果黨是一個屬於知識份子、中產階級認同的政

⁶¹ Thomas F. Reminton,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Longman, 1998), p.52

⁶² 俄羅斯正式向司法部登記的政黨超過 50 個，但大部份組織不健全，無明確的代表某一個社會階層。1980 年代是蘇聯與俄羅斯政治組織大量崛起的時期，主要以反對共黨為訴求。1989 年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及 1990 年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被選上的民主人士卻寥寥無幾，而且不是因為政治組織，而是靠個人名聲。Geoffrey A. Hosking, Jonathan Aves and Peter J. S. Duncan, *The Road to Post-Communism. Independent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Soviet Union 1985-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1992) .

黨，社會基礎有限，蘋果黨在三次國會選舉中所獲得的席位愈來愈少，所能產生的影響力愈來愈有限。

葉爾欽自視為全俄羅斯的總統，不加入任何黨派，再加上俄羅斯政黨無法動員足夠的力量，對葉爾欽與政府產生壓力，便形成了葉爾欽權力凌駕所有政黨的局面。在許多的總統與國會對局的關鍵時刻，例如總理任命案、政府不信任案與彈劾案，國會幾乎都扮演博弈賽局中小雞的角色。葉爾欽因此可以成為派系政治的至高領袖。

(2) 利益團體比政黨更具影響力

俄羅斯政黨政治非兩黨制，而是多黨林立，且大多數政黨的規模小且力量薄弱，缺乏廣泛且堅實的社會基礎，一直不能像美國或西歐政黨一般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政黨在西方國家基本上所履行的主要功能就是將意見及影響力從社會傳輸至政治中，但是，在俄羅斯政黨在傳達意見的功能性不強，反倒是落在一些專門的產業及專業協會等利益團體上。學者甚至認為，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不健全，利益團體的功能與影響力大於政黨，因此在俄羅斯沒有政黨政治，卻有遊說團體政治。⁶³

特殊利益團體⁶⁴透過各種方式保護自己的利益，使經濟改革不能真正實行，

⁶³ 學者比較俄羅斯各政黨黨綱，發現有許多一致的地方。此外，根據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民眾的政黨認同度極低。Richard Ahl, "Society and transition in post-Soviet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2 (1999), pp.175-193.

⁶⁴ 俄羅斯的利益團體可依職業別區分為四大類：一是企業經理、一是軍工複合體、一是農業、一是新興金融業。除了傳統上依具領域來劃分外，另一方面亦依照利益團體對經濟改革的態度來劃分，則俄羅斯的利益團體可區分為兩大類，亦即新產業利益團體與舊產業利益團體。新興產業代表的利益團體以金融業為主，舊產業利益團體則包含了軍事工業、能源工業與農業三大領域。在新興產業利益團體方面，往往一個產業領域裡會有兩個以上的利益團體。而舊產業與新產業情況剛好相反，舊產業領域裡通常只有一個利益團體作為整個行業的代表組織。利益團體影響決策的策略工具或手段：遊說、透過參與選舉進入立法體系。

例如利益團體透過遊說總統辦公廳與政府獲得免稅、補貼等特權。⁶⁵在所有利益團體中，就屬新興金融工業集團的勢力最為龐大。一些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雖然是專家，但卻受到利益團體賄賂的引導，已經沒有資格身為改革份子。俄羅斯的政商關係十分緊密，俄羅斯政治精英為了增加個人財富或獲得政治獻金、選舉資助，主動與金融家往來；另一方面，金融工業集團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或滿足個人的參政慾望，亦樂意與政治人物合作。而這樣模式的政商合作其實是一種私人利益交換，延伸了俄羅斯的侍從政治。葉爾欽本人在 1996 年總統選舉時與財閥合作，運用財閥的資金與媒體贏得選舉，選後再延攬財閥入閣。俄羅斯政府在發生經濟危機發生時，葉爾欽緊急與七大財團進行協商，希望運用財閥的資金為政府的財政紓困。楚拜斯利用職務廉價拍賣、抵押國營企業給財閥，用來增加自己的政經實力；這都是侍從主義延伸至利益團體的例子。利益團體成為俄羅斯派系人馬強化自己力量的重要助手。

葉爾欽面對利益團體的壓力與要求，使用了極有效的蘿蔔與棍棒並用策略。葉爾欽會適時地讓工業說客進入政府，排除其反對聲音。以政府的職務為誘餌，延攬產業界人士入閣，消彌其欲與政府對立的動機。而這種緩和社會壓力的做法就是所謂的統合主義。此外，葉爾欽亦會製造利益團體間的摩擦與衝突，讓勢力強大的利益團體認知到，必須與政府合作，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因此，葉爾欽將操弄、平衡派系的作法運用在利益團體上。

第二節 政治文化層面

⁶⁵俄羅斯企業的生存方式，主要有下列幾種方式：(1) 以貨易貨、相互拖欠三角債。(2) 國家的補助。(3) 尋求保護者。而這三種方式都是依靠企業間的私人關係或與政府官員的私人關係來達成。Vadim Volkov, "Violent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uropean-Asia Studies*, vol.51,no.5, (1999) ,pp.741-754.

政治文化是促成俄羅斯菁英選擇派系政治非正式制度的第二個因素。政治學者經常將俄羅斯的總統與舊俄沙皇或蘇聯共黨的總書記相比較，將俄羅斯的總統辦公廳與蘇聯的中央政治局相比較。而總統辦公廳的結構與功能的確在許多方面與中央政治局極為類似，都是總統或共黨作為監督政府機構的工具。這兩個機構的本質與精神延續了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傳統。另外，我們也可以說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延續了俄羅斯強人政治與威權統治的政治文化。⁶⁶

俄羅斯的政治文化組成有三大部分：俄羅斯帝國的政治文化、蘇聯的政治文化與西方的政治文化。俄羅斯帝國的政治文化與蘇聯的政治文化遺緒（heritage）對俄羅斯的影響極深。對俄羅斯而言，西方的政治文化是外來的，俄羅斯一直希望超越西方，因此仿效西方，學習西方的制度，但是俄羅斯的學習方式卻是採用俄羅斯式的強迫手段、由上而下的方式。俄羅斯走向民主制度是蘇聯俄羅斯的共黨上層精英推動的結果，而非公民社會中的人民大眾革命、向政府呼求而來。俄羅斯與東歐國家在走向民主化上存在強烈的對比。東歐國家的公民社會力量扮演著主要推動力量，而在俄羅斯卻是由政治精英來推動民主。對俄羅斯精英和民眾而言，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滲透普遍化、成為其政治文化中的主要成分。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泛指成員對政治體系的心理取向與行為模式。阿蒙（Almond）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態度、價值、感覺、信息和技能得一種特殊的分配狀態，人們的態度會影響到其行事意願，因此政治文化會影響公民與領袖在整個政治體系裡的所作所為。⁶⁷我們可以比較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從而瞭解其目前和未來的行為傾向。政治文化又可區分為次文化，如領導精英的次文化和社會大眾的次文化。而俄羅斯的政治精英的思維與行為強烈地受到俄羅斯過去

⁶⁶ Thomas F. Reminton,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Longman, 1998) ,p.48-49, Eugene Huskey, "Yeltsin as State Builder,"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vol.21, no.1 (1994) ,pp.61-62.

⁶⁷ 彭懷恩，《比較政治》（台北：風雲論壇，民國85年），頁。71-72。Gabriel A. Almond, G. Bingham Powell and Robert J. Mundt, *Comparative Poli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New York: Harper

政治文化的影響。歷史學派或歷史途徑的分析方式，強調所有一切都具延續性，所以，政治文化的因素會一直影響俄羅斯的政治發展。不過政治文化不是靜止的，會隨著時間改變。政治文化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可從三方面來看，第一是對政局穩定的影響，第二是對政治體系中行為者行為的影響，第三是對政治變遷的影響。

政治文化與非政治制度兩者具有一體兩面的關係，亦即，政治文化是存在政治菁英心中抽象的概念，派系政治是政治菁英具體的行為表現。政治文化反應了派系政治的精神，而派系政治反映出政治文化的本質。正是政治文化對俄羅斯政治精英行為影響的作用，俄羅斯政治菁英受到過去政治文化的影響，例如，俄羅斯帝國文化中的宮廷文化與世襲主義，蘇聯政治文化中的領導風格與政治鬥爭傳統、不重法治反重視私人關係，促使俄羅斯派系政治一直是俄羅斯政治菁英習慣採取的政治運作方式。我們從說明中發現，這四項政治文化的內涵有相互重疊之處，而事實上，其中心本質就是派系政治的侍從主義，證明了政治文化的確是促成派系政治形成的因素。以下分別以這四項政治文化來說明其對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影響。

一、 俄羅斯帝國文化

1. 宮廷文化

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來自其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經驗，因此拜占庭帝國、蒙古統治與俄羅斯擴展為帝國等歷史經驗都對俄羅斯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基礎是專制主義（*absolutist*），乃是指統治者對國家的事務和人民有絕對的權力；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俄羅斯沙皇的權力與西方國家君

王不同，沒有受到教會和貴族的限制，另外，俄羅斯沙皇的權力集中在一人，較為專橫、獨裁；因此，俄羅斯並未與西方同時發展出民主政治。卡爾和辛薩將俄羅斯帝國的政治文化分為三個次文化，分別是沙皇政治文化、官僚政治文化與農民政治文化。農民為了在艱苦的環境中求生存，加入村社，形成集體主義。沙皇和宮廷為維持其統治能力，建立極具滲透力的政治體系與軍事秩序，甚至有過度中央化的傾向。宮廷貴族為沙皇帝國提供軍事保護，貴族派閥間相互爭權，沙皇希望維持各貴族家族間的和諧。官僚滿足俄羅斯帝國不斷擴張過程中繁重的行政需求，甚至成為具有世襲地位的官僚貴族，官僚獲得官職和土地，以辛勤工作作為回報。而官僚對沙皇與貴族而言，是爭相爭取的人馬，也是沙皇和貴族權力鬥爭中的棋子。⁶⁸

綜合以上，卡爾（Carol Barber-Barry）辛薩、（Cynthia A. Hody）提出九種俄羅斯帝國的政治文化：專制主義、強勢領導人、人民是國家的財產、追求生存是主要目標、不鼓勵個人主義、控制是主要的價值、不需要制度（專制主義過度集中權力，不需用制度來維持統治）、共識、不信任外國人。其中專制主義、強勢領導人、不需要制度這三項對領導階層的政治文化有極深的影響。專制主義強調由沙皇來控制一切，甚至不惜採取暴力的手段，人民的任務就繳稅和從軍，並用家長主義（paternalism）來合理化統治者的角色。為了對抗外來侵略和貴族的爭權鬥爭，需要一個強大的領導人來統治國家，免於陷入無政府或內政的混亂局面，人民為了安全與生存寧願給予統治者完全的自由來統治國家，更加一步強化專制統治。專制統治沒有規則可循，專制統治的方式控制了一切也不需要制度來維持政體。政治權力和地位不是由制度的職位所決定，而是由出生、私人關係和政治權力平衡所決定。

⁶⁸ Carol Barber-Barry and Cynthia A. Hody, *The Politics of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32-43.

傑森 (Donald N. Jensen) 認為有三項俄羅斯文化的要素對俄羅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有重大的影響力，低度開發國家(an underdeveloped state)、世襲主義(patrimonialism)與帝國宮廷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imperial court)。⁶⁹另外，俄羅斯文化有強人政治的傾向。低度發展國家文化顯示出俄羅斯重視私人關係，世襲主義與宮廷文化則說明私人關係是如何連結成派系或非正式的團體。

傳統上，俄羅斯國家機關是衰弱的，國家機關龐大且無效率，政權與職權界定不清，貫徹決策的能力有問題，保障財產與權利的法律不是不存在就是無法有效執行；公民社會概念遲遲未萌芽，處於初始發展階段。現在俄羅斯內部存在著許多低度發展國家的問題：(1)政治制度的權力分配模糊不清，許多相互重疊之處造成權力的爭奪；(2)法律無法貫徹執行，行政官僚與社會大眾忽視國會或總統所通過的法令或命令。雖有龐大的官僚系統，政策執行無法完成；(3)公私領域界線模糊，國家的整體利益被忽視，政府關於與社會大眾均認為私利高於公利，公職成為官僚的個人財產，利用私有化的職權進行瓜分國家財產。國會代表通過一連串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法案，例如增加自己的收入、額外補貼並免除繳稅等特權。

宮廷文化是指俄羅斯統治階級以沙皇為中心，形成一個緊密的圈子。沙皇是仲裁者與平衡者，依照自己的意志、喜好與政治經濟利益協調其身旁派系人馬的相互激烈競爭。貴族勢力擴大，可能威脅沙皇的權力地位實，沙皇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便會扶植新的貴族，給予更高的權力，讓新的貴族去打擊舊貴族。過一段時間，新的貴族勢力壯大到足以威脅沙皇時。莫斯科公國的恐怖伊凡二世在接任時，面臨兩自克里姆林宮內兩大舊貴族家族的強大壓力，根本無自我決策的能力，於是設立了「沙皇直轄區」(oprichnina)，並成立一批私人軍隊

⁶⁹ Donald N. Jensen, "How Russia Is Ruled – 1998," <http://www.rferl.org/nca/special/ruwhorules/index.html>

(oprichniki)，對舊貴族進行肅清。葉爾欽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讓跟隨在自己身邊多年的侍衛兼好友科札柯夫組成一各小型的總統安全衛隊，來保護葉爾欽的安全，而這一群侍衛因親近葉爾欽的機會，便可以就近影響葉爾欽；尤其是侍衛長科札科夫一度成為俄羅斯政壇最具影響力的人。

2. 世襲主義

世襲主義乃指傳統俄羅斯的精英與財產權有密切的聯繫。俄羅斯的沙皇即代表國家，擁有國家、國家的龐大資源與公民。沙皇將獲利高的商業與工業集中在自己手中，透過給予貴族經濟特權來換取貴族的支援。貴族從事公職所獲的報酬是世襲主義所衍申出來的一種供養制度(kormlenie, feeding)，貴族協助沙皇管理土地與稅收工作，並從稅收中保留一部份作為己用。而世襲主義實際上就是侍從主義。在現今俄羅斯，世襲主義則以侍從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成為權力結構中菁英間的關係聯繫。俄羅斯的經濟菁英，如石油及天然氣等工業家，獲得來自政府中政治菁英如總理齊諾梅爾金的支援，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大量獲利。

世襲主義的運作方式，就是沙皇將國家財產視為私有，而在政治菁英間分贓，用來換取貴族的支持。演變到俄羅斯時期，政府公部門的資源部門成為各派系爭相爭取的地盤，政府部門取代政黨成為表達利益的媒介與代表。俄羅斯的政府行政體系並不屬於行政中立的技術官僚。各部門以部長為首，不同的部長有不同的政策方向。擔任部長的精英利用部會所賦予的權力作為私人利益之用；例如，財政部長負責預算、國家債券等財政政策，在預算編列或出售國家債券時，便可利用職權之便，圖利特定個人，建立自己的私人權力關係網絡。私有化部長負責大型國營企業的拍賣，更是各家爭相搶奪的國家財產大餅。各派系都希望能獲得部長的職位，藉此正式職位來擴大自己的權力。

俄羅斯的政府與西方的內閣性質不同，不具有西方內閣遵守黨紀及集體負責的傳統，俄羅斯的政府在蘇聯時期是各方經濟利益的代表，部會的權力基礎來自分歧複雜的利益網絡，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農工綜合體（Agro-Industrial Complex, APK）、軍工綜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VPK）與燃料能源綜合體（Fuel and Energy Complex, TEK）；反觀西方民主國家中，政黨扮演著傳達社會各方利益的角色，在俄羅斯卻由政府部門來擔任此項功能。⁷⁰因此，俄羅斯政府不過是一群保衛各自利益的部門集合，而部門主義使得俄羅斯政府不是一個團結的組織，各部門各自為政，相互爭奪利益強奪分配國家資源。部門主義與地方主義的結合使俄羅斯經濟版圖陷入更加分崩離析的局面。此外，部門主義是以領導首長為首的，俄羅斯政府各部會首長有完全的政策主導權，因而各部會的立場會隨著首長的撤換而不斷調整轉變。

俄羅斯的政府是分裂的，可分為兩個對立的勢力，其中一部分可稱為總統部會（presidential ministries），因為總統會在某些政府部會儘量安插自己的人馬，而這些人馬主要來自總統辦公室或顧問班子，如財政部的費多洛夫、經濟部的拉辛與國家財產委員會的楚拜斯，是屬於改革派的部會，與總統的關係較密切，常直接聽命於總統；另一部分才是總理的部會，但總理不一定握有控制這些帶有強烈部門主義各自為政的部會，例如，在 1992 年蓋達領導經濟改革政策的階段，蓋達雖然擔任經濟部，但經濟部底下又細分不同的部門，並且是以行業的類別區分，有軍工部、礦業部、能源部等，而這些次級部會都是由蘇聯技術官僚、企業經理人或利益團體的代言人擔任，光是經濟部一個部會內，就為了爭奪資源而吵翻天了。值得注意的是，這類部會由於能獲得利益集團所提供的中央預算外的基

⁷⁰ Eugene Huskey,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in Russia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residency and Government," pp. 368-370.

金⁷¹ (extrabudgetary fund)，有了這筆獨立於中央控制的財源，政府對這類部會的控制力相對減弱許多，政府內部呈現各部會派系林立、侍從主義充斥的情況。基本上，中間派的政府與總統有時會對經濟改革的看法不同，總統的幕僚與諮詢專家大多是傾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者，而政府的組成份子主要是舊蘇聯時期的技術官僚，與舊利益團體有關係，因此較保守、傾向延緩或阻止改革。

保持政策的制定是圈子內部成員的集體共識，而共識的產生是來自沙皇的最高權力與各派利益的相互折衝。而在俄羅斯，政治權力與權力鬥爭以葉爾欽為中心。葉爾欽為避免自己被定位為任何一個固定的派系，葉爾欽在自行運作的政治鬥爭中選擇有利於自己的盟友。在重複不斷的政治鬥爭中，葉爾欽的權力運用策略加速激化寡頭間的鬥爭，造成政策的混亂，而其權利卻因此不斷地強化。

二、蘇聯的政治文化：蘇聯共黨文化與經驗的影響

1. 領導人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權力運作模型

在過去，蘇聯時期制度與政治的紊亂，促使政治精英習慣採用非正式的方式進行政治活動。蘇聯領導人的產生沒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或規則可尋，蘇聯的權力繼承就是一部派系鬥爭循環史。克宮派系鬥爭是主導蘇聯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領導階層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意見溝通、政策辯論以及利益交換等活動；在此過程中運用派系聯盟、政策辯論、說服技巧、鬥爭策略以及妥協藝術等。克里姆林宮學派分析有兩種類型，純權力動機學派(pure power motives)與政策偏好學派(policy preferences)。⁷²政策辯論即是派系鬥爭最常運用

⁷¹ 預算外基金是政府預算中不須受到國會監督的一部份。

⁷² George W. Breslauer,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pp.8-9.王定士，「車臣戰爭研究：車臣戰爭決策中的

的工具之一。派系鬥爭主要是指一種權力運作與互動的過程，呈現出來的便是派系間合縱聯橫的現象。在派系鬥爭中所運用的主要手段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經常是既聯合又鬥爭。在鞏固己方勢力的過程，應善於運用各派系間的利益矛盾。俄羅斯政治遊戲規則並沒有發生實質的轉變，主要以派系鬥爭為主，只不過有時必須受限於憲法吧了。

蘇聯的權力繼承鬥爭過程中，領導人透過組織、人事與政策辯論來強化自己的權力，獲得領導者的地位。獲得權力後，為維持自己的最高權力，仍必須繼續運用派系鬥爭來維持自己的最佳位置，在面臨政治經濟危機時，能持續立於不敗的地位。領導人豎立個人崇拜、肅清等政治運動，都是用來肅清政敵或迫使政治精英效忠於領導人的手段。

民主政治中藉由政黨或政治人物在選舉的自由及民主競爭的規則下決定誰獲取權力，相反地，蘇聯是圍繞在共黨內部的幾個領導人及其背後所支持的派系間的鬥爭。蘇聯權力鬥爭，領導者必須獲的總書記的戰略職位，藉由職位的權力去穩固自己的權力地位。權力鬥爭的階段，除了如何獲得與失去權力外，應該中間還包括鞏固權力、擴展權力、使用權力、維持權力、分享與任命權力。⁷³

蘇聯領導人運用職官名錄來建立自己的派系，就是典型的侍從主義的表現。過去精英升遷的管道主要遵循黨內一套職官名錄(nomenklatura)的系統。領導人透過擁有人事任命權來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獲得職位的政治精英以效忠領導人來回報。俄羅斯領導人與其人馬的關係也追尋這樣的模式。俄羅斯精英的流動與補充方式，主要以「效忠－保護」關係⁷⁴(patron-client relation)與非正式政治和選

克裏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第二期，民國 88 年 5 月。

⁷³ Baruch A. Hazan,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infighting in the Kremlin* (London: Weatview Press, 1987), pp.1-9.

⁷⁴ 史達林、赫魯雪夫與布裏茲涅夫均運用「效忠－保護」關係來建立自己的跟隨者或下屬，成

舉為主。政府行政部門的精英主要是與總統有私人關係的人士擔任，而國會的政治精英則是經由選舉產生。

過去也有針對蘇聯時期派系作研究，主要集中在領導權的爭奪。由於蘇聯並無一套明確的權力移轉制度，因此，權力鬥爭成為最後的決定因素。進入俄羅斯時期，1993 年建立超級總統制，但葉爾欽卻仍舊偏好派系鬥爭方式，傾向個人主義，輕視制度的限制。蘇聯的政治制度對權力缺乏許多明確的規範，而發展出派系鬥爭與派系模式的非正式機制。

2. 不重法治、重私人關係

蘇聯政治文化與過去的政治經驗的特色是：體制不健全，人治重於法治。蘇聯的權力繼承沒有一套正式制度或規則可依尋。非正式制度影響力大：侍從主義連結形成派系。制度與規則是由人所制定，機構組織與部門是由人所操控。在俄羅斯這個不重視法治、缺乏法治(rule of law)，一切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尋求一個穩固的庇護者⁷⁵成為人人求生存的基本手段與法則。因而侍從主義、族閥主義(nepotism)極度盛行。俄羅斯的人民對政治沒有信心，普遍不相向制度，相信的是人。公私領域界線不但模糊，更甚者，是藉由利益相合組成公私勾結的利益共生體(private-public collusion)。所以俄羅斯貪汙的情形嚴重，而這是一種結構性的貪汙(structural corruption)。⁷⁶經濟決策不是市場的理性行為或官僚部門的專業所決定，而是公私結盟成的各派系間的利益爭奪。俄羅斯民主化並未降低非正式關係與非正式政治在俄羅斯政治上的重要性。

功地維持統治的聯盟。布裏茲涅夫統治班底的網絡最廣，橫跨個政府部門與地區。戈巴契夫初期的派系人馬只有長期的跟隨者，是所有蘇聯領導人中網絡最小，而在進行改革時，戈巴契夫開始尋求與短期政策立場及利益一致的分子結盟。

⁷⁵屋頂(krysha)是俄羅斯普遍的社會現象。屋頂的概念是指保護者，而葉爾欽是最大的保護者。

⁷⁶ Andras Sajo, "Corruption, Client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Eastern Europe," <http://www.law.nyu.edu/eecr/vol17num2/special/special.html>

由於人治重於法治，因此，俄羅斯雖然有法律，但卻存在不遵守法律的傳統。俄羅斯的稅制混亂、稅法多如牛毛，民眾逃漏稅的狀況十分嚴重。俄羅斯尚未建立起重視制度的精神。重視私人關係。在蘇聯時期，國營企業間調動物資與一般人民或取缺乏物資的方式是透過私人管道。俄羅斯人民無法依賴國家的安全單位來保障自身的安全，尤其俄羅斯商人必須依賴私人警衛或軍隊來確保個人人身安全。私人關係帶來安全的保障與經濟上的物資補充。

第三節 葉爾欽的領導風格

葉爾欽的領導風格⁷⁷是屬於父權式的領導人。而葉爾欽的政治權力運作與政治行為，實際上是違反制度與憲法。葉爾欽的用人策略彈性靈活，有效地建立起三類人馬。由於葉爾欽是利用正式職位所擁有的權力與非正式的統治方式，來擴大自己的權力。政治威權主義是葉爾欽統治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有人亦認為葉爾欽實行的是總統獨裁。⁷⁸

一、強化領導權力的策略運用

1. 總統令⁷⁹

葉爾欽就任俄羅斯總統後，發佈大量的總統命令，內容涉及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對外貿易、文化教育、軍事和社會生活各領域；從辦 1991 年 7 月到 1994 年 6 月，約 3 年期間，葉爾欽頒布了大約二千多個總統令，平均每天頒布兩道總

⁷⁷有五個因素可以解釋葉爾欽的領導風格，這五項因素分別是：葉爾欽的個人特質、蘇聯的政治精英文化、俄羅斯帝國沙皇的傳統、葉爾欽認為這樣的強勢領導方式適合解決俄羅斯的問題、葉爾欽為了個人需要。另外，布瑞勞爾認為制度與政治文化、個人性格都是形成葉爾欽領導風格的因素，制度的改變所留下的政治真空、超級總統制給予葉爾欽破壞制度、運用派系政治的機會。

⁷⁸ 羅嗣炬、王鵬，「從俄羅斯威權政治看葉爾欽辭職」，《世界知識》，頁 7-8。

⁷⁹就美國與俄羅斯總統令在法律上的比較，美國總統無權發布具有法律效率的總統令。

總統令。⁸⁰關於經濟改革方面，由於政府推動私有化及財政緊縮常遭到議會的阻撓，因此，許多私有化政策都是靠總統命令的方式來推動執行。⁸¹有了總統令這項工具，總統可以單獨片面地決定政策。總統令除了運用於決策外，葉爾欽常用總統令來進行內閣改組與人事任命，展現自己的權力。

葉爾欽亦相當善於運用否決權，使國會通過的法案失效。國家杜馬通過的法案需先由聯邦院通過再經由總統簽署，才能頒布生效。如果總統否決法案，需由聯邦院和國家杜馬各佔三分之二以上代表投票贊成，才算通過。便形成議會很難通過總統否決的法案。1993 年底選舉產生的杜馬成立半年內共通過 44 項新法案，其中 34 項因為沒有得到總統的簽署而失效。1995 年底選舉產生的杜馬在 1997 年春季會議共通過 200 多項法案，總統簽署的只有 90 多項。

2. 總統辦公廳

葉爾欽在 1991 年 6 月當選俄羅斯總統後，為鞏固總統的權力，在總統職位下設立了三個機構：國務會議、聯邦會議與安全會議，主要的用意在於削弱分散總理與政府的權力。葉爾欽為加強總統在行政系統的地位，在 1993 年修憲中加入賦予總統在其職權下設立總統行政機關的條款。葉爾欽善於設立新機構來弱化原先存在的機構，使兩個機構職掌的權責重疊；葉爾欽的總統辦公室的部門劃分即與政府部門極類似，讓有「第二政府」之稱總統辦公廳取代真正的政府。1994 年初總統班底的兩派主要人馬，即總統辦公室與總統顧問，在運作過程間發生彼

⁸⁰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民國 86 年），頁 115。

⁸¹ Eugene Huskey,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in Russia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residency and Government," pp. 375-377. 葉爾欽雖善用總統令行使職權、推動改革，但卻也常出現命令前後矛盾或衝突、反覆無常的狀況，對經改起不了真正的指導作用。例如，葉爾欽於 1994 年 5 月發佈一項總統命令，取消對一些貿易機構或地區免關稅的特權，但這個命令使政府損失 15 兆盧布的收入，雖然如此，總統仍強調命令用意在於斷絕中央與地方傳統利益輸送關係的決心；但就在六月，總統卻又發佈一項命令表示能源部門不受 5 月總統命令的限制，這顯示總統本身亦受到利益團體的遊說而屈服。

此機構重疊、職能混淆而相互爭權的狀況；⁸²總統的行政機構存在著某些問題，如內部決策不透明化、多頭馬車、無監督機構等弊病。



圖四：俄羅斯總統行政機構 資料來源：Eugene Huskey, “The State-Leg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dundancy,” *Post-Soviet Affairs*, vol. 11, no.2, 1995, pp. 122-123.

⁸² 總統辦公室以菲拉托夫 (Sergei Filatov) 為首，下轄 24 個委員會，1400 多名工作人員；總統顧問班子以伊柳辛 (Viktor Iliushin) 為首，人數與建制始終保密。關於兩個總統行政機構的衝突與爭權，請參見馮紹雷，《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1992 年以來的俄羅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 葉爾欽的彈性用人策略與雲霄飛車政策

葉爾欽在俄羅斯的各大政治勢力與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中一直是個權力平衡者，這除了與葉爾欽具有憲法所賦予的強大權力外，更與葉爾欽巧妙的用人策略有關。俄羅斯的政壇大致上可分為三大勢力，一個是以楚拜斯為首的激進改革勢力，一個是以朱加諾夫為代表的中左勢力，另一個則是以車諾爾梅爾津為代表的中右改革勢力，長久以來，楚拜斯改革勢力派即與朱加諾夫反改革派相互對立，而楚拜斯與車諾爾梅爾津雖同處在政府機構中，也是處於相互鬥爭的局面。葉爾欽面對這樣的情勢，主要藉用其用人策略與改組政府的時機，來調整各派勢力的消長，以達到政權內部相互牽制與平衡的生態。

葉爾欽選擇人馬的原則(clan principle)⁸³主要有三點：忠誠度、專業能力、符合公眾輿論。因此，葉爾欽上臺以來就一直在不停地啓用新人，希望以新生力量為俄羅斯的改革注入活力，如「改革金童子」蓋達、費多羅夫、楚拜斯和涅姆佐夫等，都是三四十歲左右的少壯派，這些改革份子都具有專業能力，且由於是由葉爾欽任命，因此都對葉爾欽效忠，符合了忠誠度與專業能力兩項。但是，由於改革對民眾產生衝擊，並且有改革分子甚至自己成為貪污的一員，為民眾所厭惡，而葉爾欽也以改革不利為藉口，開除這些改革派。

葉爾欽的政治聯盟包含範圍廣闊。葉爾欽在改革派與中間派、保守派間不斷平衡，成為俄羅斯政治變動的主要動因。⁸⁴葉爾欽不斷地調整其統治班底，主要是因應政治環境變化與政策所需。1992 年進行震盪療法式的經濟改革，葉爾欽

1997 年 11 月)，頁 45-49。

⁸³ V. V. Razuvaev, "Power in Russia – The Bureaucratic Dimensio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s*, (May-June 1996), pp.6-25.

⁸⁴ John P. Willerton Jr, "Presidential Power," in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4*, ed. Stephen, Alex Pravda and Zvi Gitelm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的人馬完全由改革派組成，在遭遇國會保守派勢力的強大攻擊下，葉爾欽必須強化、擴大統治基礎，因而開始延攬中間派與工業家、技術官僚入閣。1992 年底中間派的齊諾梅爾金取代改革派蓋達成為俄羅斯的第二任總理，但與此同時，葉爾欽又在第一副總理得職位上安插同樣與蓋達是激進改革派的費多洛夫來平衡車的勢力，讓費多洛夫主持財政與經濟政策大權，因而，經濟改革政策尚能維持在改革派所堅持的方向。此外，葉爾欽同時也調整了總統辦公廳，將原本是中間派的辦公廳主席彼得洛夫（Yury Petrov）改由改革派的費拉多夫掌任，藉此在總統辦公廳裡培植改革派人馬。另外，葉爾欽從來沒有與保守派合作過。葉爾欽運用人事任命來不斷平衡統治聯盟內部個機構與部門間的衝突。

雲霄飛車策略(roller-coaster principle)是指葉爾欽讓其親信或人馬在政府職務中上上下下的策略。葉爾欽具有任命總理及左右總理任命各級部長的權力，會運用人事任命權來強化自己的勢力，尤其善運雲霄飛車策略，更使得其人馬願意對葉爾欽繼續效忠。許多葉爾欽的人馬雖然因擔負政治責任而下臺，但葉爾欽卻可能重新任命他們重回舊職務或轉任新職務，葉爾欽的人馬為了能再度獲得政治職位，因而願意繼續追隨葉爾欽。歷任總理並無真正與葉爾欽違抗者，在面臨葉爾欽撤除其職務時，也從未有任何怨言。史泰巴辛即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綜合以上正式制度、政治文化與葉爾欽領導風格對派系政治的影響，我們可以歸結出這三項因素對派系政治的影響，使得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具有以下這些特點。就正式制度的影響來看，正式制度超級總統制讓葉爾欽得以成為所有派系的至高領袖。葉爾欽高居於俄羅斯所有派系之上，具有操縱派系政治的能力。而俄羅斯的正式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葉爾欽的派系人馬來源比蘇聯時期多元，如此，葉爾欽的統治基礎才夠鞏固。就政治文化的影響來看，注重私人關係、以權力為中心的派系政治促使俄羅斯的民主制度基礎不穩，而侍從關係中的利益交換促使俄羅斯的派系政治成為一種結構性的貪污體系，國家的整體利益在派系鬥爭

中被犧牲，造成俄羅斯國家機關能力的弱化。就葉爾欽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葉爾欽在行政組織架構上，安排總統辦公廳與政府職務重疊，不僅藉由總統辦公廳來監督政府，並讓兩者相互競爭政策主導權，而自己擔任仲裁者的角色，成為各部會爭寵與影響的對象。



第三章 俄羅斯派系政治的運作架構與模式

在俄羅斯國內報章雜誌或傳播媒體關於俄羅斯政壇的報導中，常有「派系鬥爭、改革派暫居上風、保守派扳回一成」等描述性的分析。「派系」是俄羅斯政治與決策過程的主要行動者，而究竟俄羅斯「派系」的定義與內涵為何？俄羅斯有哪些主要的派系？派系的結構為何？派系間的互動為何？派系在正式制度與政治文化下所形成的運作結構又是如何？派系互動對俄羅斯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又為何？

同時，我們也必須在派系政治中探討，葉爾欽如何運用派系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在權力鞏固的過程中動員了什麼力量？葉爾欽的權力基礎建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為何葉爾欽的支持度如此的低，卻能夠維持其最高權力於不墜？為何俄羅斯少數的中央精英能夠掌控俄羅斯龐大的社會力量？

為了解答以上這些問題，必須對俄羅斯派系政治分類與運作有詳細的了解。

第一節 俄羅斯派系結構與分類

我們要根據第一章的文獻分析中學者對派系的定義，對俄羅斯派系的定義進行檢視，重新界定一個符合俄羅斯民主化後派系政治的內涵。政治分析的途徑經常是依據特定時空環境所建構的一個分析架構，具有時空的限制性，例如，中國大陸派系政治的研究與理論模式就歷經了多次的轉變，因此，蘇聯與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分析模式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也會有所轉變。俄羅斯帝國時期的派系政治是以沙皇為中心、貴族為追隨人馬的宮廷政治；蘇聯時期是以共黨總書記為中

心，利用職官名錄所建立的層級官僚統治；而俄羅斯民主時期則是以總統為中心，總統辦廳和政府中的官員為人馬的派系政治。這三個時期的派系政治個有不同。而我們要用派系來分析俄羅斯的政治，必然與過去學者所界定的派系概念並不完全相同，必須作出一個適當的修正。我們要探討的是：俄羅斯在民主化後，派系是否存在？而派系的形成、結構、運作方式和互動又呈現出哪些不同的風貌？葉爾欽在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外在政經環境中，必須建立哪些派系人馬？

一、俄羅斯派系結構的變遷

論文第二章解釋了俄羅斯雖然民主化，但是因為制度與政治文化等因素，派系政治從蘇聯到現在的俄羅斯，一直都是政治精英的主要互動模式。但是，俄羅斯派系政治在面臨民主化的衝擊之後，派系的形成方式與組成結構都產生重大轉變，與蘇聯時期的派系政治並不相同。但是，派系的核心概念「隨從依附」並沒有改變，亦即俄羅斯的派系是仍舊是依靠私人關係與互惠性連結而成，只是其中的某些形成因素相對弱化，而某些因素得到強化。整體而言，民主化後精英進入政治圈子與晉升的管道增加，因此獨立性增強。而派系至高領袖必須面臨更大的民意考驗，因此必須廣納派系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經濟在實行市場化與私有化後，金融資本的作用擴及到政治，成為拉攏派系的重要資源。以下分別以政治、經濟的變遷方面來分析民主化與市場化對俄羅斯派系的形成與結構的影響。

1. 政治民主化的影響

俄羅斯領導人在民主政治中所受到的制度制約和政治壓力超過蘇聯的黨國體制、一黨專政時期，領導人從事派系政治運作，必須考量國內外的政經環境因素；另外，再加上民主化開啟了政治精英更多重的從政管道，因此，俄羅斯領導者必須廣納外來的政治精英、不同黨派的政治精英，甚至可能是政治上的競爭對

手，不能像過去蘇聯領導者單純吸納共黨黨員為旗下的派系。

在吸納派系人馬的考量因素中，私人關係的因素弱化，而專業與政治策略的因素反而強化。私人關係是葉爾欽原本長期人馬的主要來源，但是，基於專業能力與政治策略的相互需求，葉爾欽延攬了許多年輕的改革派和中間派作為其短暫的人馬與政治盟友，來維持與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在蘇聯時期，一黨專政，俄羅斯則是多黨制。過去蘇聯領導人的人馬完全來自於共產黨內部的政治精英，但是，對葉爾欽而言，在民主政治的環境與制度中，其人馬則必須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勢力團體與黨派，亦即民主化後，俄羅斯派系人馬的來源由封閉轉向開放。過去人馬來自蘇聯共黨內部，而葉爾欽則必須建立學者與顧問等非共黨黨員、技術官僚的人馬；對於具有政治魅力的政治人物，葉爾欽也必須想辦法與其結成政治聯盟。

民主化後，菁英流通的管道與晉升的方式增加(*diversified*)且公開(*open*)，選舉就是一種不受限於領導人提拔的方式，因此，政治菁英的獨立性增加。⁸⁵對某些政治菁英而言，如果自己的政治魅力足夠，則可以不必加入葉爾欽的派系。另外，身為葉爾欽派系下的人馬，由於選擇離開葉爾欽的損失成本較低，不至於完全絕斷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俄羅斯派系成員的自主性比蘇聯時期的派系大大增加許多。由於葉爾欽在民主政治中對政治權力的掌握相對較弱，葉爾欽運用人事任命作為其招納人馬的方式受到限制，例如，葉爾欽所任命的某些政治職位必須經過國會的同意，抑或這些人馬也必須有民眾的政治支持度，尤其政府的官員。威列頓強調相對蘇聯封閉的政治環境，俄羅斯在民主化的環境下，派系人馬可以公開地利用自己的職務、媒體等工具來動員社會中的力量。⁸⁶從以上諸多因

⁸⁵ John P. Willerton, "Post-Soviet Clientelist Norms at the Russian Federal Level," in Graeme Gill ed., *Elite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55-56.

⁸⁶ John P. Willerton, "Post-Soviet Clientelist Norms at the Russian Federal Level," in Graeme Gill ed., *Elite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pp.71-74.

素看來，派系所擁有的議價籌碼較高、獨立性變大，葉爾欽與派系間的不對等關係縮小。

2. 經濟市場化與私有化的影響

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經濟利益成為動員派系一項更為重要的誘因。⁸⁷蘇聯時期，政治菁英的特權就是能夠透過特殊管道取得較好的生活物資或奢侈品，但是，俄羅斯在經濟改革市場化與私有化後，人人只要有錢就可取的所需要的任何物資，人人皆可經營企業、擁有私有財產，因此，在蘇聯時期，經濟因素不是連結派系的主要因素，通常只是附加利益。但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政治精英想進一步藉由從事政治來增加個人財富。另一方面，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提供更多的尋租機會，釋放出更多的國家財產。在蘇聯時期，對政治菁英而言，追求政治權力重於經濟利益，但是在市場化之後，政治菁英追求經濟利益的目標或慾望有時反而超越政治目標。在俄羅斯同時進行民主化與市場化的情況下，運用經濟力量可獲取政治職位，但在蘇聯時期，經濟力量卻無法轉換為政治力量。在俄羅斯民主化的環境下，經濟力量甚至是鞏固政治力量的一種方式，例如，金融資本在選舉中扮演重要的作用，目前金融資本成為政治人物最主要的爭奪目標。葉爾欽提供派系特許的經濟利益或部分特權超過蘇聯領導人所能給予的程度。在派系的互惠原則中，領導人必須能夠提供政治與經濟利益，派系則提供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葉爾欽透過給予銀行委託證以管理國家預算，財閥則在政府出現財政危機給予援助，大量購買政府債券；葉爾欽與地方領導人達成個別的雙邊協議，強化領導人利用地方的財政權力，地方領導人繼續聽從中央領導，不選擇獨立。

另外，葉爾欽可以以職務來換取人馬的忠誠，以給予經濟特權來取得政治支

⁸⁷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 1995), pp.467-494. 羅德明與吳玉山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開放，對

持。政治與商業活動的結合，兩者以共生的關係並存，是一種以商養政、以政保商的現象。但是，由於俄羅斯國家的財政能力過低，因此，尤其在政府面臨財政或金融危機時、總統或國會選舉需要大量資金進行競選活動時，葉爾欽反而需要派系中財閥的援助，產生葉爾欽可能會受制於財閥的狀況。但另一方面，財閥在金融危機期間，受到的打擊也很大。⁸⁸一般說來，俄羅斯派系介入經濟的比重比蘇聯時期強化。蘇聯的派系只專注於經濟政策的辯論，俄羅斯的派系則實際參與經濟活動，甚至本身成為財閥，例如總理齊諾梅爾金與私有化部長楚拜斯。俄羅斯在派系政治將政府權力、國家財產私相授受的情況，已經夠成一個普遍性的貪污結構。⁸⁹

在派系的組成結構上，蘇聯時期的政治屬於極權和威權體制，蘇聯時期的派系較為單純；俄羅斯則相對是個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因此俄羅斯的派系結構的範圍必須相應擴大。一個有效運作與動員的派系必須包含領導核心(leadership core)、意見團體(opinion groups)與個人酬庸體系(personnel reward system)，亦即一個派系應該包含特定的團體、成員與特定的政策及共同的利益。⁹⁰俄羅斯派系的領導核心集中葉爾欽之下的總統幕僚與政府官員，派系的追隨者則除了派系領導人所在政治職位下的中低階的官員幕僚外，俄羅斯政壇中的各政黨與利益團體也在派系的追隨者之列。在民主政治中，利益團體為爭取自己的利益，向行政機關遊說，與派系合作結盟；而派系藉由利益團體與民意的支持來強化自己的力量。另外，派系的結構如果考慮到制度層面，則派系領導人所擁有的政治職位也是一樣重要的因素。因此，俄羅斯派系的基本結構包含領導人、政府機關、政黨與利益團體，是屬於擴大定義的派系。

派系的形成、結構與運作都發生衝擊，派系政治相應於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調整。

⁸⁸ J. Johnson, "Russia's Emerging Financial-Industrial Groups," *Post-Soviet Affairs*, vol.13, no.4, pp. 333-365.

⁸⁹ V. Coulloudon, "The Criminalization of Russia's Political Elite,"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Fall 1997), p.74.

⁹⁰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47, no.4 (Jul. 1995), pp.467-494.

運用此一擴大的派系結構能說明政治精英間、官僚機構間與政黨間在派系政治中與在政策制定過程的相互競爭，以及國家機關與社會利益團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關係與互動型態。派系政治可以解釋俄羅斯各派政治勢力在經濟政策上的辯論、府會對經濟政策制定權的爭奪、政府與利益團體間的利益輸送連結關係。俄羅斯政治體系的特色就是「派系」取代「制度」成為俄羅斯政治運作的主體。從制度面來看，所觀察到的是府會、雙首長或各部門在決策過程中的權力與資源爭奪。而在非正式制度作用力大於正式制度的俄羅斯，私人關係與互惠體系連結了政治領導人、政府部門、政黨與利益團體，形成政策決策過程中的相互對立的派系。

在比較完蘇聯與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差異性後，可以更清楚的重新界定俄羅斯的派系。俄羅斯派系與學者所研究的傳統派系類型不同，俄羅斯的派系不是在一黨之內，而在總統葉爾欽一人之下不同政治色彩的各派人馬。俄羅斯的派系主要是指葉爾欽的人馬，葉爾欽與其人馬間存在朋友、工作關係、政治與經濟利益關係，葉爾欽順應時勢所需的專業人士或是拉攏的戰略盟友，而這些人馬的權力基礎主要都是依靠葉爾欽。葉爾欽希望建立一個廣大的權力基礎，因此，葉爾欽底下的人馬包含各種不同立場與各方勢力的團體。俄羅斯國內並不會將葉爾欽視為改革者，也不認為葉爾欽是民主派人士。

二、派系的劃分

1. 劃分標準

劃分派系的方式有幾種標準：以實力領袖區分、以政策路線區分、以制度上組織結構區分。用不同的標準來劃分，所得出的派系分類不盡相同。通常以實力領袖做區分時，較強調權力的因素，以派系領袖的名字來稱呼，例如「蓋達幫」。

如以政策路線來區分，則冠以政策立場的名稱，稱為「改革派」與「反改革派」等，此種劃分方式則明顯偏重經濟政策的分析。如果依照派系活動的領域來分析，可分為中央與地方，中央層次的派系與國家機關、中央政府作為主要的活動領域，地方派系則以地方基層政權作為主要的活動空間。而按照以上這三種劃分標準所歸類的派系數目，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形態的不同。二分法也就是劃分兩個敵對的團體，例如改革派⁹¹與反改革派，這樣的劃分方式是簡單明瞭，但卻又有過於化約、簡化的危險，忽略派系政治的複雜性。三分法就是在兩個敵對團體中，加入具有制衡作用的中間派別，例如左、中、右。四分法則激進改革派、溫和改革派、左、中左、中右、右派。以上的二、三、四分法，都是以政策立場來作區分。以實力領袖來作區分的分析幾乎很少，而且這樣的分析經常流於過度瑣碎繁雜，有陷入描述人事糾紛的弊病。政治派系鬥爭可能以政策辯論或權力爭奪的方面展現，而本文認為政策只是派系衝突的表面化與爭的手段，派系鬥爭的真正主因還是在權力。茲將過去學者或報章雜誌中所提及的派系羅列如表二。

表二：學者與媒體曾經提出的俄羅斯派系種類

分類	名稱	成員
葉爾欽家族	私人關係	葉爾欽的女兒塔吉雅娜、網球教練塔爾比雪夫 (Shamil Tarpishchev)
改革派 (短期庇護者)	學者幫	蓋達、費多洛夫
	聖彼得堡幫	楚拜斯、科赫、波伊科、史切潘辛、普丁
	諾夫哥羅德幫	涅姆佐夫、基里延科
強硬派 (幕僚舊識)	斯維得諾夫斯科幫	斯科柯夫、巴蘇柯夫、布爾布利斯、拉洛夫、比特洛夫、科札柯夫 ⁹²
聯盟者 (中間派)	總理	齊諾梅爾金、普里馬柯夫
	地方領導人 (例如莫斯科幫)	盧須柯夫 (Nikolai Ryzhkov)
	利益團體的領袖	沃爾斯基 (Arkady Volsky)
	具一定支持度或高度魅力的政治人物	杜馬議長、聯邦會議主席、列別得
	財閥	貝瑞佐夫斯基等七大財閥

⁹¹ 以政策的強度來分析，學者將改革派以 1993 年區分為兩類，1993 年前的蓋達是激進改革者，而 1993 年以後的費多洛夫、楚拜斯、涅姆佐夫等屬於務實的改革者。

⁹² 這群人都曾被稱為灰衣主教 (gray cardinal) 意指葉爾欽身邊影響力最大的人。

2. 俄羅斯的派系劃分是以人劃分為主，以政策取向為輔

在整個俄羅斯的派系政治中，葉爾欽無疑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葉爾欽是派系政治的核心，其下的派系首領在不同的時期由不同的人來擔任。但是葉爾欽底下的派系要以何種標準來劃分？由於俄羅斯的派系極為複雜，而派系的區分可大可小，⁹³區分愈細雖能愈清楚說明，但區分太細也沒有意義，應該以具有影響政策能力為主。因此，我們將以最主要的三個派系作為分析的對象，分別是長期的追隨者、短期的庇護者和暫時的盟友。這三大派系一直在俄羅斯政壇上活動，但是，派系的領導人和主要分子則隨著情勢有所更替。派系間亦有合縱聯橫，敵對的派系可能因為某些因素而合作；而原本友好的派系或依各派系之內可能分裂，形成相互敵對的派系。

俄羅斯的派系雖然有不同的色彩或政策立場，但實際上不適合用政策來劃分派系，而必須以人、派系領袖來作為劃分的標準。主要的原因是，俄羅斯派系政治中改革派與保守派存在好友的關係，許多俄羅斯改革派之所以進入政府，引薦成為葉爾欽的人馬都是透過保守派的穿針引線，改革派與強硬派的關係實際上是朋友的關係。由於，葉爾欽安排保守派負責國防軍事政策，改革派負責經濟政策，在清楚的政策分工區分下，兩各派系反而不易產生衝突。另外，有時改革派和保守派會同在一個派系的情況，只不過在改革派中保守派人士佔相當少數，所以，無人質疑改革派立場。改革派對經濟政策可能立場相同，但對軍事與國防外交可能發生歧異，例如，楚拜斯並不反對車臣戰爭，蓋達則基於強烈反對。

雖然運用政策趨向來區分派系會產生相衝突矛盾的地方，但是，由於政策辯論是派系鬥爭的重要工具，藉由政策來爭取支持支持，擴大勢力。例如，在經濟

⁹³ 單就葉爾欽過去的幕僚所組成的派系就可區分為 1968-85 的斯維得諾夫斯科幫與 1985-87 莫斯科幫與 1987-1989 中央政府幫。

改革方面，1992 年初以工業家為主的公民聯盟則利用經濟情勢對政府中的改革派進行大肆抨擊，藉由訴求民眾來壯大自己的勢力，並得以進入政府。派系間的互動經常以政策辯論的方式展現出來，因此，不能忽略政策立場的重要性，因此，我們還是以政策取向作為輔助分類派系或分析派系互動的標準。

葉爾欽 (patronage) 長期的追隨者 (long-term proteges) 是指葉爾欽在 1991 年當選俄羅斯總統之前的過去的幕僚與好友，又可稱為死忠派，例如斯維得諾夫斯科幫。這一批人馬是屬於價值關係取向，與葉爾欽有共同的工作經驗，並在葉爾欽的不斷提拔下晉升政治高層。葉爾欽在 1987 與 1988 年對抗蘇聯政權的緩慢改革時，連續被撤除莫斯科第一書記與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是，這一批死忠派仍舊追隨葉爾欽，與葉爾欽共同經歷了許多危機，建立起共患難的革命感情。因此，對葉爾欽而言，雖然這批長期追隨者的背景是蘇聯時期的官僚，但是卻是他最能信任的一群人。葉爾欽安排這批長期追隨者負責安全與內政事務。而由於這群人馬與葉爾欽的關係最親密，最無厲害衝突，因此關係能維持得最久。但是，葉爾欽侍衛長科札柯夫則曾經因為影響力一度過大，受到外在的嚴厲批評，因此，葉爾欽在面臨巨大壓力下解除其職務。

而短期的庇護者 (short-term client) 主要是學者，葉爾欽提拔來進行改革。對這批學者而言，從政是一條嘗試的道路。由於短期庇護者從事吃力不討好的經濟改革工作，成為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眾矢之地，經常是俄羅斯政壇上最不受歡迎的一群。而葉爾欽面對政經壓力常不得不棄卒保帥，但卻又在需要這群改革派重振改革之風時再度賦予經改要職與重任，所以短期庇護者的政治生涯極短且顛簸，經常在政府職位中上上下下，或在政府與總統辦公廳間來來去去。葉爾欽長期追隨者的在政治生涯中是跟隨著葉爾欽緩慢晉升，短期庇護者則一下子降位居高層，如同我們所謂的空降部隊，再加上這群學者都是屬於年輕的改革派，因此，常被批評為「童子軍治國」。威列頓認為經過兩次以上的職務晉升才可歸類為葉

爾欽的短期人馬，如果只有擔任過一次政治職務，則只能算是葉爾欽的盟友。葉爾欽雖然迫於政經情勢開除短期庇護者，但離開政府後卻直接轉入總統辦公廳，國會完全無法影響總統辦公廳的人士與運作，給予短期改革派人士一個繼續安身立命之處，因此，改革派願意繼續效忠葉爾欽。另外有一部份短期庇護者則參與國會選舉進入國會，繼續支持葉爾欽。

短暫的盟友的角色比較曖昧不明，會在盟友、人馬與對手三種角色間游走。短暫盟友與葉爾欽合作的模式有一個固定的規則。一開始，在尚未與葉爾欽結盟前，這類短暫的盟友有自己的權力基礎，但是在權力對比上不足以對抗葉爾欽。在葉爾欽面臨政治僵局與經濟危機時，葉爾欽開始拉攏這類的短期盟友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基礎，而短暫盟友亦需要葉爾欽給予政治職位來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雙方處於相互利用的互惠關係，因此可以達成結盟合作的關係。短期盟友在加入葉爾欽聯盟之後，開始由盟友的角色轉向人馬，通常會選擇支持葉爾欽，希望透過對葉爾欽的效忠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與授權；然而，就在短期盟友不斷壯大自己的勢力後，葉爾欽會對短期盟友的權力高漲抱持警戒之心，另外，短期盟友的獨立性增加，選擇對抗葉爾欽的籌碼增加。最後，葉爾欽將短期政治盟友視為其政治敵人，葉爾欽會在短期盟友權力威脅到期總統職務時，拔除政治盟友的職務。而短期盟友的政治影響力在失去職務後，最多可以維持一年，但最後多落入失勢的悲慘下場。

成為葉爾欽短暫盟友的條件是，必需具有獨立的政治基礎、在自己的領域範圍內具有影響力。葉爾欽選擇與短暫盟友結盟合作，乃是以擴大統治基礎為出發點。因此在中央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地方領導人與利益團體領袖都是葉爾欽必須拉攏的短暫盟友。葉爾欽運用統合主義⁹⁴，給予這些盟友壟斷的政經權力的方

⁹⁴所謂的統合主義指的是國家機關跨越傳統社會部門藩籬，以經濟產業的分際來垂直分割社會，把個人強制編織入法定的職業團體，包括各種資方的產業組織和勞方的工會組織。這些團體在同

式來統治整個俄羅斯。以地方領導人為例，葉爾欽給予地方領導人管理地方財政的權力，地方領導人則以服從俄羅斯中央聯邦政府的領導作為交換。地方領導人是葉爾欽維持俄羅斯聯邦完整、有效統治俄羅斯 89 個行政主體的重要盟友。在這批地方領導人的產生方式還是由葉爾欽指派任命時，地方領導人的角色是葉爾欽的人馬，因為，地方領導人不是由地方選舉產生，自然在地方上無權力基礎，必須依賴葉爾欽給予政治職位。然而在 1996 年地方領導人陸續由地方舉行選舉產生後，葉爾欽與地方領導人的關係就改變了。地方領導人在其所在的地區具有民意支持度，獲得權力的合法性增強，因此可以運用自己的職位來向葉爾欽討價還價，爭取更多的預算資源。而從這時起，葉爾欽與地方領導人的關係由權力地位及不對稱的領袖與人馬轉變成地位較為平等的政治盟友。⁹⁵

在國會中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也是葉爾欽極欲拉攏的對象。例如從 1993 年到 1995 年的聯邦議會（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議長蘇梅柯（Vladimir Shumeiko），國家杜馬主席盧布金（Ivan Rybkin），1996 年到 1999 年的謝列茲涅夫（Gennadii Seleznev）與史特羅耶夫（Yegor Stroyev），都與葉爾欽有良好的溝通管道。除了國會中的領導人物外，社會中的利益團體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葉爾欽藉由成立體制外的圓桌會議、諮詢小組方式，來籠絡這些利益團體的領袖，將統合主義的統治方式運用地淋漓盡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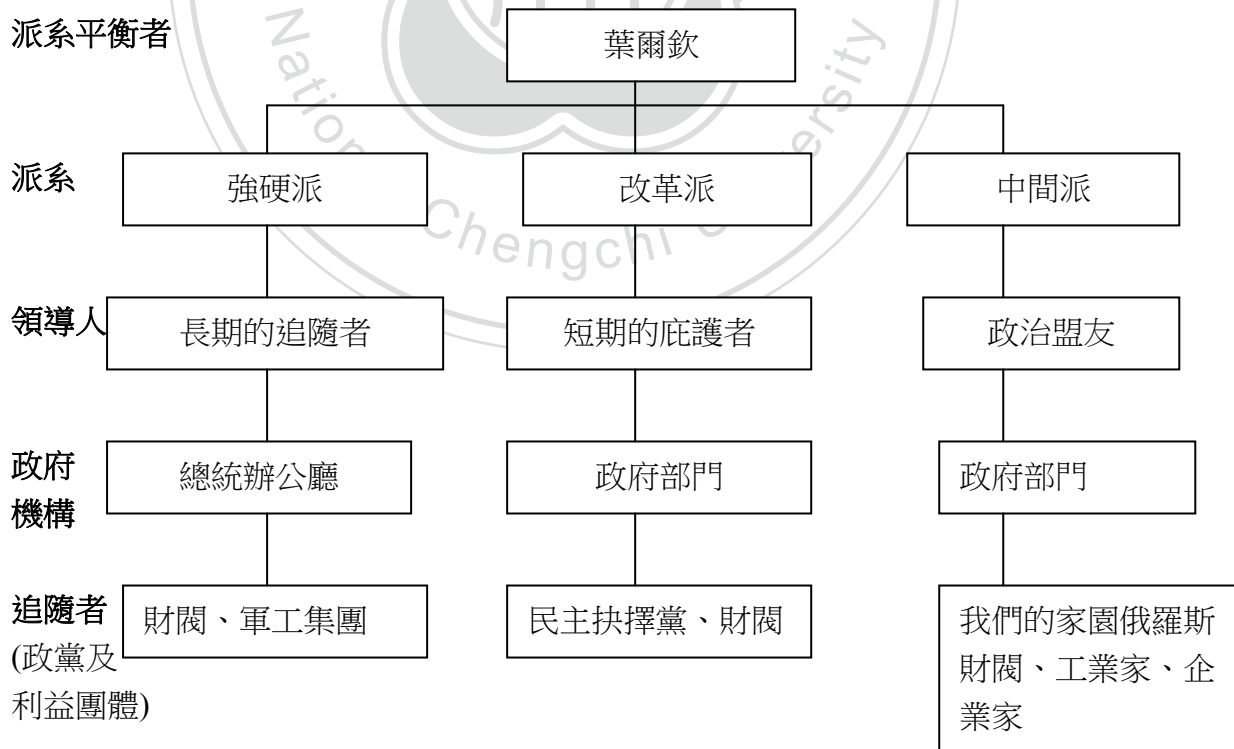
葉爾欽的人馬集中總統辦公廳與中央政府內部，葉爾欽的聯盟者則分佈在國會、利益團體與地方領導人。葉爾欽與盟友的關係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葉爾欽與盟友在相互需要時才會結盟合作，當葉爾欽不需要政治盟友時，或者政

一個地區同一性質的產業僅能組織一個，與多元主義的自由結社不同，完全水平壟斷該產業的利益代表。又每一職業團體，都依中央到地方作層層分割，上下隸屬，層級分明。國家機關透過給予這些社團壟斷的代表權，以換取對該社團領導者挑選權與利益要求的監控權，近而獲得對該團體的有效動員與支持。

⁹⁵ William A. Clark, "Presidential Prefects in the Russian Provinces: Yeltsin's Regional Cadres Policy," in Graeme Gill ed., *Elite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24-47.

治盟友的權力威脅到葉爾欽時，葉爾欽就會中斷合作的關係。我們發現，當短期盟友的權力基礎較薄弱時，可能願意暫時作為葉爾欽的人馬，但是由政治盟友轉變而來的人馬，對葉爾欽的忠誠度不夠，葉爾欽對這類由盟友委身為人馬的人物也持懷疑態度，採取一定的提防措施。當短期盟友的獨立性愈大，就可能選擇離開葉爾欽自立門戶。

另外，為了簡便分析，我們可以說這三大派系的基本政策立場分別是：長期的追隨者屬於保守派、短期的庇護者屬於改革派、暫時的盟友屬於中間派。其中，必須注意的是，政策並非派系著重與堅持的，政策只是派系作為展現勢力、為謀取利益的工具。葉爾欽雖是各界公認的改革派，但實際上，葉爾欽的政策傾向曖昧不明；實際上，葉爾欽底下囊括許多不同色彩與立場的派系，而在派系運作中，葉爾欽配合情勢與派系勢力對比，以最有利於自己為考量基礎，採取不同政策。茲將葉爾欽底下的三大派系結構與政策取向以圖五表示之。



圖五：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結構圖

第二節 派系的互動

俄羅斯派系的互動是如何，主要的觀察重心在派系的勢力對比，在各個時期中分別由不同的派系佔優勢。派系間的力量對比除了派系本身的力量外，還受到葉爾欽的個人考量，以及當時的俄羅斯國內政治環境等因素所決定。整個說來，影響俄羅斯派系勢力間對比變化的因素有葉爾欽與派系本身力量的內在因素以及國內政經及國際政經的外在因素。

一、 影響派系勢力消長的內在因素

對葉爾欽和派系而言，各別有其政治目標和經濟利益的考量。派系的形成必須符合互惠的原則。對葉爾欽而言，具有政治能力、能提供政治支持度的人事才能夠成為葉爾欽的人馬。對政治人物而言，葉爾欽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職位或特權，才是其願意為葉爾欽效忠的誘因。葉爾欽的權力較大，因此對派系互動的影響力較大，派系雖會被葉爾欽操縱，但也會強化自己的勢力，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1. 葉爾欽的角色

俄羅斯的派系極多，傳統上派系至高領袖會採取對自己最有利的雙派系主義運作模式，亦即領導人讓自己底下的人馬形成勢均力敵的兩大派系，領導人再藉由具有仲裁者的權力在兩大派系間操縱，選擇抑制或扶植派系勢力，達到兩大派系處於相互恐怖平衡狀態的目的，維持自己的權力不受挑戰。雙派系主義乃是指葉爾欽的策略是必須防止某單一派系實力持續增大，在人事任命或決策上讓不同派系的人馬相互牽制。葉爾欽不斷地在派系政治中展現自己具有仲裁者的角色和權力。有時某一派系鬥爭失敗，此派系的官員被迫下臺，但另一派系的官員卻也

必須相應下臺，另外，有時某位人士的出臺是表示此派系的佔優勢，但另一派系的人馬也會被安插上重要的職位，其目的只是要保持兩派勢力的平衡。例如，1992年底齊諾梅爾金接任總理，葉爾欽則在任命費多洛夫來制衡。

2. 派系本身的力量

領導人的目標是維持政權，派系的目標是獲得政策影響力來壯大自己的勢力，這些派系政治的權力運作會進而影響派系間的互動與力量對比。派系間爭奪政治權力，經常集中在政策的主導權。派系與領導者對權力和政策的考量，都是以自利為基礎，而不是國家整體的利益與人民的期望。所謂的政策主導權，不一定是指政策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執行與實際執行的權力。就以私有化而言，葉爾欽的人馬都支持私有化，因為他們都想要藉由私有化從中獲利，因此，派系都支持私有化，不過，私有化中的國家財產劃分就成為派系爭奪的焦點。如果某一派系無法從中獲得利益，則會提出停止私有化的要求。例如，在投資電信公司私有案過程中，齊諾梅爾金為防止波坦寧取得股份，要求立即停止拍賣。

派系的力量愈大，對其他派系發動攻擊的能力就愈強，成功的機會也愈大；另一方面，派系也可能強大到足以打敗至高領袖，取代至高領袖。派系間的勢力對比愈平均，則派系發動攻擊的成功性降低，派系會選擇累積勢力為暫時的策略，因此派系結構會較穩定。相反地，派系的勢力對比愈大，或某一派系勢力足以威脅至高領袖，則派系鬥爭會愈激烈，派系結構會愈不穩定。

二、 派系互動的外在因素

任何一個成功的領導人都必須能掌握外在的情勢，盱衡局勢，權衡得失；身為派系的至高領袖，必須維持自己的最高地位；而派系為求生存，也必須運用外

在情勢，攻擊其他派系，以維持或壯大自己派系的勢力。

1. 國內政治因素：國會與總統選舉

葉爾欽在面對反對勢力較強大的情勢下，不斷的更換短期的庇護者改革派人馬，並尋求中間派政治人物的結盟。俄羅斯政府的組成在歷次的演變下，呈現著愈來愈中間派的色彩。而葉爾欽屢次撤換內閣的時機都是在國會會期期間、國會與總統選舉，這顯示葉爾欽以撤換人馬來降低國會的反對壓力或為選舉佈局。

2. 國際環境：北約東擴進程、國際貨幣基金會、軍火販賣

國際的政經情勢會影響到俄羅斯國內的政經情勢。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援助能夠帶來改革的助力，但是口惠而實不至且條件嚴苛的貸款卻會招來民眾的反感；北約東擴威脅到俄羅斯的戰略安全，促使俄羅斯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對俄羅斯各派系而言，在經濟政策與外交政策的辯論和政策主導權的爭奪上，必須善加運用國際情勢強化自己的勢力。短期庇護者多半是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學者，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人員不但理念一致，在屢次談判過程中更建立起好友的關係，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經濟援助能夠強化改革派的聲勢。另一方面，北約東擴激起俄羅斯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讓中間派、保守派與強硬派藉以強調自己的主張，要求重視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走向東西平衡的大國外交。強硬派中的軍工集團更主張軍火販賣可以為國家帶來財富，強大俄羅斯的國防與國防工業。

3. 經濟因素：通貨膨脹的壓力、人民的不滿、私有化中國家財產的搶奪

經濟改革的成效會影響到國內民眾對經濟政策的態度。如果改革能夠讓經濟穩定，通貨膨脹控制良好下，則改革順利可以進行，改革派可以繼續握有政策的

主導權；但如果發生經濟危機，如生產大幅衰退、失業率增加、企業破產等，則葉爾欽面對壓力，改革派必須為政策失誤負責，因此中間派獲得政策主導權，轉而採取擴張性措施，以通貨膨脹的代價來換取失業率的降低及企業的免於倒閉，如果經濟情勢穩定，則中間派繼續擴張政策，反之，則可能改由改革派重掌經濟政策。穩定化政策的轉變造成俄羅斯經濟的波動，而經濟波動則進一步透過國內外政經環境與因素的影響造成派系政治勢力的重組，形成派系循環與經濟波動的現象。

4. 媒體因素：媒體作為攻擊對方的工具

俄羅斯派系在發現媒體強大的影響力量後，開始爭奪對國內媒體的主導權。媒體是派系作為攻擊對方派系與政策的宣傳的工具。相互在媒體上批評對方的政策失誤，指控對方貪污等事件層出不窮。俄羅斯財閥均有自己的媒體王國，尤其是 1996 年總統選舉，政府發現媒體的重要性，在 1997 年開始積極介入媒體。⁹⁶

三、 派系互動模式

關於派系互動模式的研究，黎安友對中國大陸派系提出 15 點特性，陳明通對台灣的派系互動提出 7 點特性，根據兩位學者所提出的特點，對照俄羅斯派系的運作，基本上都符合所描述的特性。茲將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運作的基本規則，簡要歸納如下。俄羅斯派系除了基本的運作規則外，還具有兩種互動模式，並且與經濟的景氣循環形成規律的互動關係。另外，派系政治的運作對俄羅斯政治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如果派系結構穩定，則俄羅斯政治亦較穩定；如果派系鬥

⁹⁶ Floriana Fossato, Anna Kachkaeva, "Russian Media Empires," (September 1997)
<http://www.rferl.org/nca/special/RUMEDIA/index.html>. 2000 年普亭當選俄羅斯總統，運用媒體得當是一項重要的因素。

爭嚴重，則俄羅斯的政治亦會相對處於極不穩定的危機。因此，評估俄羅斯派系結構穩定的程度成為預測或解釋俄羅斯政治是否穩定的重要指標。

1. 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的基本運作規則

(1) 派系鬥爭以總統為中心：

葉爾欽總統具有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是派系間的平衡者。葉爾欽建立派系，作為其統治的基礎，透過派系有效地統治俄羅斯。不過，葉爾欽的權力並非完全無可挑戰，派系領袖累積一定的實力，又有一批願意效忠的人馬時，則可能威脅葉爾欽至高領袖的位子。以權力的角度來看，葉爾欽是派系的至高領袖，是各派系間的平衡者、仲裁者；從政策的角度來看，葉爾欽是政策的發動者與協調者，是決策過程中的最後定奪者。葉爾欽其下的派系可約略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短期的庇護者、長期的追隨者與短暫的盟友。

(2) 平衡性：

葉爾欽是派系的平衡者，葉爾欽為維持自己的至高領袖地位，必須維持派系的平衡發展，讓派系間時時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葉爾欽的最佳策略就是讓派系間相互對立、內耗，而達到不致威脅葉爾欽地位的目的。因此，當派系威脅到葉爾欽的至高領袖地位，葉爾欽會迅速採取行動削弱其勢力。另外，葉爾欽為了配合俄羅斯的政經環境的變化，經常需要撤換改革派與中間派的人馬來緩和政經壓力，以保持自己對政策的掌握能力。因此，改革派與中間派人馬在俄羅斯政府內部是處於不斷循環（rotation）的互動。人馬的撤換進一步影響到政策的決策產出。葉爾欽採取雙派系主義，以眾多派系中的兩個最大的派系為中心，不會讓某一派永遠佔上風，採取欲擒故縱的戰略，讓某一派認為自己受到寵信，而極力

求表現。葉爾欽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俄羅斯的派系眾多，但以勢力最大的幾個派系才具真正的影響力。如果有兩大派系存在時，這兩大派系會對抗；如果有三大派系存在時，則會發生兩個派系結合打擊一個派系的情況，此派系被消滅後，則又會恢復變成兩大派系對抗的局面。

(3) 派系政治不具完全的毀滅性：

俄羅斯的派系幾乎壟斷了俄羅斯國內所有的政治權利與經濟資源，對派系而言，彼此間雖然爭奪公部門的資源分配而時時處於對抗，但是，派系卻必須在激烈的衝突中維持共存。如果派系的整個體系瓦解了，派系就會失去掌握政權與經濟特權的特殊地位，對任何一個派系都不利。因此，儘管派系鬥爭如何激烈，一定會以維持派系政治存在為最後的底限。

(4) 利益決定派系的結盟與對抗：

派系間合縱連橫，存在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派系鬥爭有總統辦公廳內部的鬥爭、政府內部的鬥爭，以及總統辦公廳與政府部門的鬥爭。總而言之，只要存在權力因素、利害衝突與政策歧異，都會發生派系鬥爭。總統辦公廳要爭奪對總統的影響力，政府部門間要爭奪財政預算的分配。派系時時有相互重疊或變換的現象。對於派系而言，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是維繫派系網絡的最重要養分。派系為利益爭奪一切行動以利益為依歸，對派系而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原本的結盟關係可能因利益衝突而瓦解，原先的地對關係亦可能因存在共同利益或需要互相利用，派系拋棄過去的成見而合作。

例如，在政府內部，總理齊諾梅爾金與楚拜斯是兩個長期對抗的兩大派系，但是，在 1996 年第二輪總統選舉後，列別得進入政府，權力迅速高漲，威脅到

齊諾梅爾金與楚拜斯。而原本應該是三人為主的派系三國鼎立對抗的局面，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楚拜斯與齊諾梅爾金結盟合作，合力將列別得拉下馬。而在兩派系聯合除掉列別得後，共同的目標消失，兩派系又恢復過去對抗的局面。

派系的分裂可能是因為利益衝突或政策立場不同而產生內部分裂。七大財閥在協助葉爾欽競選時，是一個團結的集團。在選舉過後，首先，古辛斯基與貝瑞佐夫斯基就因為爭奪對媒體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隨後，大型國營企業私有化的拍賣案子，幾次均由波坦寧低價得標，古辛斯基與貝瑞佐夫斯基就聯合起來對抗波坦寧。支持葉爾欽連任競選的七大財閥，在幾次大型的國營企業拍賣中，因為經濟利益的衝突，發生銀行家的大戰（bankers' war），聯合政府內部的官員、外國的投資者、自己旗下的媒體進行一場搶奪國家財產的混戰。⁹⁷另外，葉爾欽底下的強硬派長期追隨者則曾因車臣戰事，基於對處理車臣的政策立場不同，而導致強硬派內部分裂。⁹⁸以上的這幾個例子說明了派系的合縱連橫。

（5）派系增強力量的三種方式：

派系為增強自己的力量，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試圖影響葉爾欽，尤其是透過葉爾欽的女兒來影響葉爾欽是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葉爾欽的長期追隨者對葉爾欽的影響力通常高於短期的庇護者。二是獲取政府中職位，擁有決策與執行的權力；三是獲得政策的主導權。有時，雖然改革派的短期庇護者位居財政部長的職位，強硬派的長期追隨者位居經濟部長職位，兩者都有決策權，處於相

⁹⁷ J. Johnson, "Carving up the Bear: Bank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Russia," *CSIS: Post-Soviet Prospects*, (March 1997), pp. 1-4. Natalia Dinello, "Bankers' Wars in Russia: Trophies and Wounds," *CSIS: Post-Soviet Prospects*, vol. 6, no. 1 (1998), <http://www.csis.org/ruseura/psp/pspv11.html>.

⁹⁸ 強硬派人馬間的鬥爭，集中在安全會議內部與、國防部內政部之間，由於這些人都是葉爾欽的效忠追隨者，因此，葉爾欽均能掌握狀況。由於安全政策與國民生活較無密切關連，因此政策辯論的鬥爭不會浮出檯面。車臣戰爭中的進兵車臣、人質事件等，因為屬於全國性的大事，內戰支出與恐怖主義的行動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和安全，所以會影響俄羅斯的政局發展。葉爾欽決定使用武力解決車臣問題，完全是安全會議內部的決議，政府與國會完全被排除在決策之外。

互對抗的局面，如何能獲取最後的政策主導權。

2. 俄羅斯派系互動兩種的模式與循環

在葉爾欽時期的俄羅斯派系政治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是葉爾欽任命自己的人馬為總理，另一情況是葉爾欽任命政治聯盟者為總理。這兩種情況是呈現不斷循環的規則性，說明了葉爾欽如何不斷地轉換人馬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生涯。而兩種模式顯示出制度因素對派系的影響力，也突顯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關係。在第一種情況下，葉爾欽面對國會的壓力大。在第二種情況下，葉爾欽透過總理作為緩和與國會關係的調節器，面對正式制度的壓力小。

當葉爾欽任命自己的人馬為總理時，派系政治的鬥爭情況較不嚴重，但是，由於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總統葉爾欽，而非國會，因此，府會之爭的激烈程度往往高過於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相較於府會衝突，政府內部卻能夠相對處於較和諧的狀態，這是因為，葉爾欽清清楚楚地將兩派人馬所負責的領域劃分清楚，因而兩派人馬不會對政策產生衝突。例如，葉爾欽讓自己的幕僚與好友負責國防、內政與情治領域的決策與執行，讓新延攬的學者負責經濟改革的工作，在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況下，葉爾欽底下的人馬相安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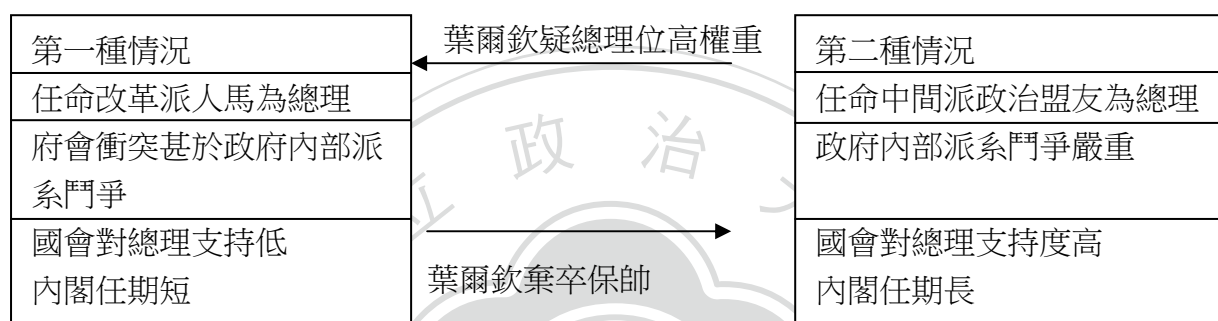
然而，由葉爾欽人馬總理當家的俄羅斯政府，如蓋達、基里延科等，在無法獲得國會的支持，又不斷地發生激烈的府會衝突與政治僵局的狀況下，葉爾欽面臨到一定程度的政治壓力，便會採取棄卒保帥的策略，改革派主政的政府存活期幾乎不到一年。葉爾欽必須拉攏中間派人士入閣當總理，例如齊諾梅爾金和普里馬科夫，葉爾欽藉此來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中間派人士可以獲得人人覬覦的總理職位，樂意成為葉爾欽的政治聯盟者，但是，一開始政治聯盟者為了取信於葉爾欽，讓葉爾欽能夠更充分的授權，便從原先政治聯盟者的角色開始往葉爾欽人

馬的角色傾斜。葉爾欽事實上任命中間派為總理是出自於政治權力策略，因此，必定會安排自己的人馬或改革派為副總理來牽制中間派的總理。中間派的總理在政府內閣組成上的決定權力不大，主要仍得由葉爾欽決定。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中間派的政治聯盟者藉由總理的職位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會漸漸由葉爾欽人馬的角色轉換回原先政治聯盟者較獨立的角色，甚至顯示出願意出任競選總統的政治野心，而葉爾欽則會在總理威脅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出現跛腳總統現象時，迅速開除總理。

在中間派擔任總理期間，由於中間派人士在國會具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度，因此，通常能維持地較久。但是，由於政治聯盟者雖然暫時願意成為葉爾欽的人馬，但其效忠度仍有問題，葉爾欽會安排自己的原人馬來制衡；此外，中間派人士與葉爾欽人馬的政策取向不同，產生政策衝突，因此，中間派當任總理時，俄羅斯政府內部的派系政治鬥爭特別嚴重，相反地，府會之爭的情況卻相對較弱。而中間派擔任總理的在位期間，由於總理有國會的支持，因此，中間派總理執政能夠維持一段較常的時間，直到葉爾欽在總理功高震主時將其開除後，才會又改任命由葉爾欽自己的人馬來擔任總理的職務。其中，齊諾梅爾金的任期比普里馬科夫長許多，乃是因為普里馬科夫的獨立性與威脅性高於齊諾梅爾金許多，而齊諾梅爾金較謹慎處理與葉爾欽的關係之故。這類暫時的政治盟友雖願意短暫屈居葉爾欽的人馬，但一旦累積勢力超越葉爾欽可以忍受的界線，葉爾欽隨即過河拆橋，將這類短暫盟友撤除。

而這兩種情況在俄羅斯有輪替發生的現象，葉爾欽在 1992 年欲任命蓋達為總理，但在受到國會的強烈反對下，蓋達領導政府不到一年，1992 年底葉爾欽就任命齊諾梅爾金為總理，而齊諾梅爾金在位期間常達五年多，從 1993 至 1998 年，爾後，葉爾欽轉回頭任命基里延科為總理，而基里延科任期從 1998 年 3 月到 8 月，和蓋達一樣是個短命內閣，爆發金融危機後，葉爾欽面臨巨大的壓力便

延攬普理馬科夫擔任總理，普里馬科夫最大的貢獻就是能夠在金融風暴下維持了俄羅斯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然而，葉爾欽又產生擔心普里馬科夫權力凌駕期總統職位，因此在 1999 年 5 月開除普里馬科夫，轉回頭任命自己的人馬史泰巴辛為總理，史泰巴辛內閣的壽命最短，只維持了 3 個月。而最後，葉爾欽在面臨政權必須交接移轉的情況下，考量到必須安排一個能夠保護自己利益，任命普亭為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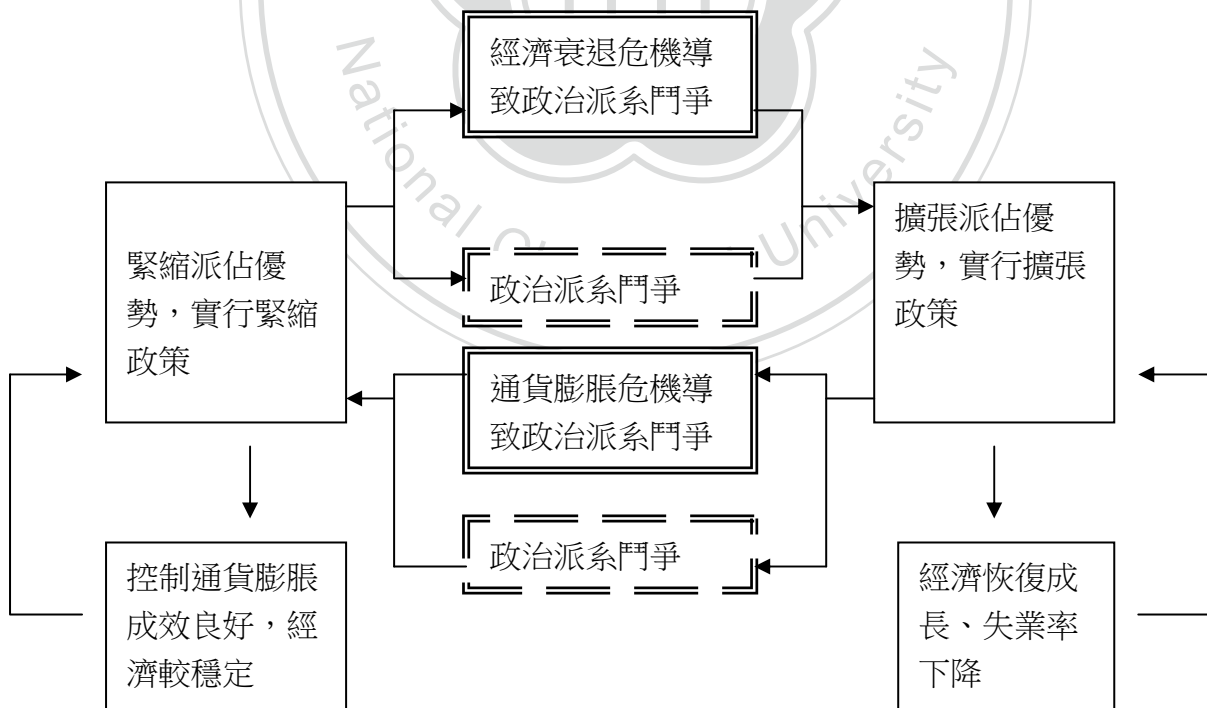
圖六：俄羅斯兩種派系模式互動循環

3. 派系互動與經濟景氣循環

派系在互動的過程中，派系必須藉由獲得政策的主導權來不斷強化自己的勢力。吳玉山在研究中國大陸的派系政治方面，發現派系的互動與經濟景氣循環有強烈的關聯。而對照俄羅斯的情況，我們發現，俄羅斯的派系互動也同樣地與俄羅斯短期的經濟景氣循環有密切關係。俄羅斯穩定化政策轉變與葉爾欽人馬的派系鬥爭存在密切的連動關係。如果葉爾欽短期人馬改革派佔優勢，主導穩定化政策向緊縮性方向執行，在經濟穩定、通貨膨脹控制良好下，改革派會繼續執政；但如果發生經濟危機，如生產大幅衰退、失業率增加、企業破產等，則貨幣學派有可能因此被迫下臺，由中間派或保守派派主導經濟政策，採取擴張性措施，以通貨膨脹的代價來換取失業率的降低及企業的免於倒閉，如果經濟情勢穩定，則中間派持續執政，反之，則可能改由改革派重掌經濟政策。俄羅斯的穩定化政策

在俄羅斯派系政治勢力的轉變下朝這兩個方向擺盪，穩定化政策的轉變造成俄羅斯經濟的波動，而經濟波動則進一步透過國內外政經環境與因素的影響造成政治勢力的重組，形成派系循環與經濟波動的現象。

俄羅斯自改革以來穩定化政策不斷地在緊縮性政策與擴張性政策間擺盪，讓俄羅斯的經濟呈現著一收一放、一緊一鬆的週期性循環波動。穩定化政策的反覆變動則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所致。俄羅斯國內對穩定化政策的看法主要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是緊縮派，一是擴張派。民主改革派是俄羅斯國內新崛起的政治家，許多出身於學院，與舊保守勢力無利益關係，傾向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合作，因此主張採取貨幣主義式的緊縮性政策，稱為緊縮派；中間派與反改革派則因較具民族主義色彩，並與國營企業有利益上的牽扯，因此傾向採取保護國內產業的擴張式穩定化政策，稱為擴張派。⁹⁹緊縮派與擴張派間勢力轉變造成穩定化政策的擺盪與經濟運作的循環波動。



圖七：政治勢力的轉變與經濟政策的擺盪、經濟運行波動關係圖

⁹⁹ Stephen Fortescue, *Policy-Making for Russian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pp.18-35.

4. 俄羅斯派系穩定程度的評估

根據影響俄羅斯派系互動的因素，我們可以歸納出兩大指標來評估俄羅斯派系的穩定程度。第一項指標是派系平衡者的權力是否鞏固，亦即派系平衡者的權力愈鞏固，他對派系互動的掌握程度愈高，因此派系的結構愈穩定。第一項指標受到下列三項因素影響，即派系平衡者的健康狀況、國會的反對力量以及總統與總理的權力對比。第二項指標是政經局勢的穩定與否，亦即如果有國會選舉、總統選舉時，則派系平衡者在必須為選舉進行佈局的情況下，可能必須調整其下派系的勢力對比，以應映當時的政治情勢；而如果發生經濟危機時，派系平衡者也必須將導致經濟政策的派系人馬撤換掉，重新安排派系人馬對經濟政策的主導權。

為了方便評估派系的穩定程度，我們運用點數的方式來計算，我們給每一個促使派系不穩定的變數各一個點數，亦即，派系平衡者（至高領袖）的健康狀況不佳、國會反對力量強大、總理權力凌駕總統、政治事件與經濟危機各一個點數，因此，點數愈多，便代表派系結構愈不穩定。其中，第一項指標有三項因素，因此，派系平衡者權力穩固時，點數為 0；派系權力平衡者權力不穩固時，點數為 1-3（點數 1 代表只有一項因素不利派系平衡者的權力穩固，點數 2 表示存在兩項可能削弱派系平衡者的因素，點數 3 代表三項威脅派系平衡者權力的因素同時存在）。第二項指標有兩項因素，因此，在政經情勢穩定下，點數為 0；政經情勢不穩定時，點數為 1-2（點數 1 是代表有政治事件或經濟危機，點數 2 是代表同時發生政治事件與經濟危機）。綜合這兩項指標，我們可以將派系穩定程度分成四種情況，以表三表示之。

再依據時間的順序來加以觀察這兩項指標對派系穩定程度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從 1992 至 1999 年底俄羅斯在葉爾欽時期總共經歷了派系建立期、派系穩定

期與派系混亂期這三個階段。1992 年到 1993 年是葉爾欽的派系建立期，我們發現，葉爾欽建立派系受到外在政經環境極大的影響。對葉爾欽而言，他身邊一群忠誠的幕僚首先就自然成為第一批最基本的班底，而後為了應映經濟改革的需要，葉爾欽啟用了第二批經濟學者出身，與蘇聯官僚體系較無關係的改革派人士；而民主化後，葉爾欽面臨國會的反對壓力，葉爾欽為了解除、反制國會的反對勢力，又啟用了第三批中間派的人士，一來是擴大自己的政治統治基礎，二來則是藉由任用中間派人士表示在政策上做出妥協，並利用中間派人士與國會較良好的關係來緩和國會對政府的反對聲浪。在葉爾欽建立派系這段期間，雖然府會之爭十分激烈，程度嚴重到曾經武力相向，但葉爾欽成功地将俄羅斯的憲政體制推向為自己量身定作的超級總統制，且有效地利用超級總統制的權力將自己立於各派系之上的至高領袖地位，葉爾欽的權力達到高峰，完整建立其下的統治派系，另外再加上葉爾欽底下的派系才剛剛建立起來，三個派系的勢力均不足以對抗葉爾欽，因此，此時正是派系最為穩定的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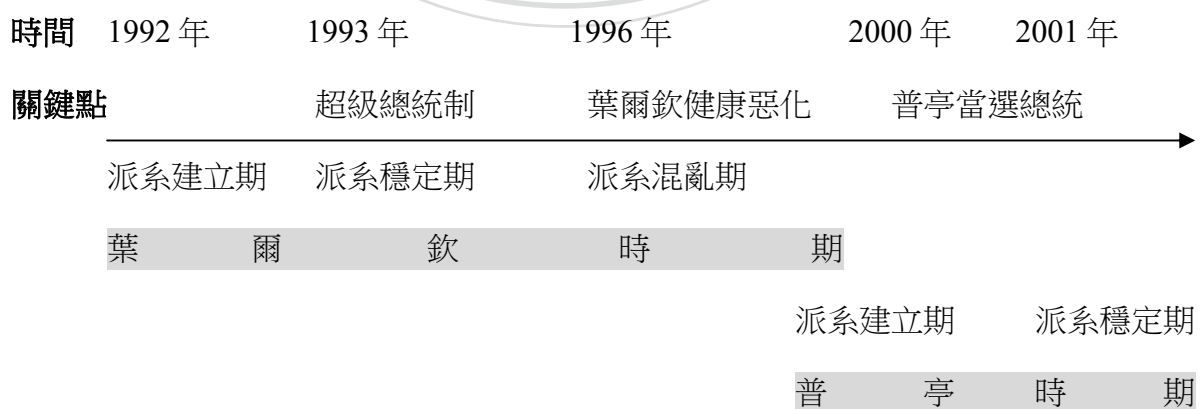
表三：俄羅斯派系穩定程度表

派系平衡者權力 政經局勢	穩固 0	不穩固 1-3
穩定 0	派系穩定 0 例子：葉爾欽 1992 年前半、普亭執政至目前	派系相對不穩定 1-3 例子：無
不穩 1-2	派系相對穩定 1-2 例子：1993 年 4 月公投、1993 年 10 月砲轟國會、1994 年 10 月黑色星期二盧布暴跌	派系極不穩定 2-5 例子：葉爾欽 1997 至 2000 年

俄羅斯經常發生政治僵局、兩次大經濟危機、小型經濟危機不斷，然而在政經情況不佳時，只要葉爾欽的權力穩固，葉爾欽還是具有維持派系平衡的力量，因此，派系結構能仍維持一定的穩定程度。在這個階段，我們會發現國會選舉的結果雖然是反對派勝利，葉爾欽會象徵性地讓某些改革派人馬下臺、安排中間派人馬上任，同時安排另外一批的改革派人馬來制衡中間派人馬，不但維持了其下

派系的平衡，緩和了國會的壓力，並確保經濟改革的路線的持續。健康情況是影響葉爾欽權力穩固的關鍵因素。到了葉爾欽在 1996 年中後健康情況惡化時，俄羅斯的派系開始進入混戰期，此時，葉爾欽已經無法隨時掌握派系的運作，其底下的派系也開始運用葉爾欽生病時的權力真空，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例如，楚拜斯為主的派系則幕後掌握了總統的決策權，而總理齊諾梅爾金也以總統代理人之勢，透過出現在公眾場合，在幕前展示、擴大總理的權力。在派系混戰期，我們可以看見病弱的跛腳總統葉爾欽經常從醫院裡出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開除其底下的派系人馬，以繼續維持派系的穩定。但是，葉爾欽的做法不但造成了俄羅斯政治的不穩定，更進一步地逐漸削弱的自己的權力。而派系混戰期在葉爾欽確定由普亭成為其接班人之後，才又緩和下來。

普亭利用本身的總理職務，加上葉爾欽突然宣佈退休後，普亭獲得代總統的職務，普亭逐漸地將葉爾欽的人馬收編，並且將自己人馬與葉爾欽的人馬加以整合。由於普亭的權力十分鞏固，不但第一輪高票當選俄羅斯總統，許多政治與經濟事件也處理得宜，因此能夠順利地穩坐派系平衡者的寶座。未來，隨著普亭支持度的下降，或者俄羅斯政經情勢的惡化，則俄羅斯的派系可能會進入一個較不穩定的時期。



圖八：俄羅斯派系發展演進圖

第四章 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實際運作與影響

由於派系的運作是在整個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進行的，因此，俄羅斯派系政治的運作會對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造成影響，但這些影響也會回過頭來影響派系的運作，簡言之，派系的運作與政經環境是相互影響的。整體來說，俄羅斯的派系愈不穩定，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情況就會愈惡化；政經情勢的變動會在轉過來影響派系的互動。由於說明俄羅斯派系對俄羅斯政治與經濟的影響無法抽離於整個政經環境，因此，本章將分別以葉爾欽的派系建立期、派系穩固期、派系混戰期作為分期，說明俄羅斯的派系運作情況與政經環境相互影響的過程，並在最後一小節歸納出俄羅斯派系的發展趨勢與派系運作和政經發展的關係。

第一節 派系建立期

葉爾欽在建立派系的過程中，一開始只有過去共事的幕僚與老友。之後，隨著經濟改革的需要，開始啟用年輕的改革派人士。然而改革並不順利，因此，葉爾欽又進一步拉攏中間派人士來強化自己的勢力基礎。葉爾欽在配合整個俄羅斯政治與經濟環境的需求下，建立起自己的統治人馬。一方面看來，這是葉爾欽的主動策略運用，但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葉爾欽受到客觀外在環境的限制。葉爾欽的權力在 1993 年底確立超級總統制後達到高峰，此時葉爾欽具有操縱派系的最大力量，葉爾欽派系在此時正式確立其派系至高領袖的地位，葉爾欽底下的派系正式完整建立。

在派系建立期，由於各派系剛剛形成，本身的勢力都過弱，不具威脅葉爾欽的力量，再加上此一階段俄羅斯的經濟危機與政治衝突只有在 1992 年改革之初和 1993 年砲轟國會時特別嚴重，而俄羅斯的政治對抗與經濟政策辯論集中在府會之爭；派系這個階段處於累積自己內部實力的狀態中，因此派系內部的鬥爭與

對立較不嚴重，葉爾欽基本上可以掌握住派系，派系結構相當穩定。在派系建立階段，派系的運作並未導致俄羅斯政局的混亂；而府會之爭才是此階段政經不穩的因素。

一、葉爾欽建立短期庇護者派系進行經濟改革

葉爾欽最信任的第一批人馬就是葉爾欽在蘇聯時期在斯維得諾夫斯克與莫斯科工作時的同僚與下屬，其中包括斯科柯夫、巴蘇柯夫、布爾布利斯、拉洛夫、比特洛夫、科札柯夫等。葉爾欽將這群強硬派人士安插在總統辦公廳與安全單位部門。這批人馬是葉爾欽最忠實的人馬，也是葉爾欽權力最堅實的基礎。但是葉爾欽不僅需要這批忠誠的人馬，還需要為其執政基礎注入改革的新血。

俄羅斯脫離蘇聯獨立與經濟面臨崩潰邊緣¹⁰⁰為俄羅斯創造良好的改革時機，激進式的經濟改革便在這個背景下產生。對葉爾欽而言，在國內一片支持改革的期望中，選擇老友布爾布利斯的朋友蓋達來進行年輕、活力且充滿決心的改革，對葉爾欽而言，是很重要的戰略選擇。更重要的是，葉爾欽讓年輕的學者來從事改革可以避免本身必須直接擔負改革責任的風險。

1991年8月，葉爾欽開始積極籌建真正的新政府。¹⁰¹葉爾欽在9月所考慮的人選有經濟學家雅辛、亞伏林斯基。10月，葉爾欽確定選擇蓋達來領導改革團隊，有兩個主要因素：第一是蓋達與布爾布利斯的關係。9月時，布爾布利斯即要蓋達擬定改革方案，而蓋達之外還包括尼恰也夫(Andrei Nechayev)、戈羅夫

¹⁰⁰ 1991年是蘇聯、俄羅斯經濟走向全面崩潰的一年。1991年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與工業產值據官方統計分別比去年下降15%、15%與7%。財政赤字高達3000億盧布，為議會通過預算的10倍，黃金儲備只有240噸，1953年為2049.8噸。1991年的貨幣發行比計劃多出20倍，1991年底美元與盧布比值達1:110以上，盧布形同廢紙。

¹⁰¹ 葉爾欽的第一個工作是成立新政府，而事實上，葉爾欽第一任政府的總理是司賴耶夫(Ivan Silyaev)，從1991年7月13日至1991年9月27日期間，具過渡性質，其主要的任務是迅速接管蘇聯的主要行政、經濟、財政單位與資源，但卻無法進一步推動改革。司賴耶夫是典型的官僚人物，謹慎，缺乏遠見及洞察力，且與舊網絡關係過於密切。葉爾欽更在1991年10月28日自己任命為總理，聲稱這是改革者的一大突破，11月葉爾欽正式成立新的俄羅斯政府。在這段期間，1991年至1992年葉爾欽有國會給予的特別權力，首先自兼任總理，組成一個年輕改革份子的政

柯夫(Aleksei Golovkov)和卡加洛夫斯基(Konstantin Kagalovsky)也都參與改革計劃的籌備。第二個原因是蓋達的背景。葉爾欽想極力擺脫戈巴契夫的影響。因此，葉爾欽不選擇過去戈巴契夫有關係的亞伏林斯基。¹⁰²另外，亞伏林斯基反對解散蘇聯，亞伏林斯基有自己的勢力基礎，獨立性較高。而蓋達有活力、願意承擔風險責任，不同於技術官僚，蓋達有自己的工作團隊，且與西方有良好的接觸與關係，此外，蓋達不具任何政治勢力，可以完全為葉爾欽所掌握，諸多條件皆符合葉爾欽的需求。葉爾欽在其自傳中描述，他十分欣賞蓋達的自信心，說話簡單明瞭。¹⁰³11月6日，葉爾欽簽署成立新政府命令，葉爾欽兼任政府總理，任命蓋達為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任命布爾布利斯、修金為副總理；布爾布利斯是第一副總理，實際上是代總理；修金兼任勞工部長，楚拜斯是私有化部長。

另外，我們也必須了解當時葉爾欽除了蓋達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將葉爾欽推上權力高峰的俄羅斯民主運動。俄羅斯民主運動與蓋達都符合改革派的色彩，因此，葉爾欽可以找俄羅斯民主運動的人士來進行改革，但是，由於葉爾欽的策略是要追求一個獨立的角色，不想受制於俄羅斯民主運動；此外，葉爾欽當時的聲望極盛，已經不需要民主派的支持，因而拒絕俄羅斯民主運動民主派組成政府的要求，更不用談要葉爾欽加入俄羅斯民主運動。此時，俄羅斯民主運動內部鬧分裂，部分民主派人士選擇入閣，以政府為根據地；部分民主派人士則走反葉爾欽路線，以國會為根據地。兩種路線之爭造成民主派的內部大分裂。¹⁰⁴

府，而主要的改革大將是副總理蓋達。

¹⁰² *Komsomolskaya pravda*, August 21, 1992.

¹⁰³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p.17.

¹⁰⁴ 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俄羅斯與東歐國家最大的不同處在於：東歐國家的民主派獲得政權，俄羅斯的民主派從未獲得實際權力，卻選擇屈居於葉爾欽之下；此外，民主團體的社會組成也不同於東歐國家，東歐的民主團體來自於政治體制與共黨之外，俄羅斯的民主團體則由蘇聯體制或共黨內部的人所組成。因此，可以合理地解釋為何俄羅斯的民主人士的性格，其思想與作為方式經常未能遵循民主原則，相反地，卻試圖依靠領導人及侍從網絡，不想獲取社會大眾的支持。悲觀者認為民主派無任何機會掌權，結構性因素、歷史因素限制了民主派，無法持續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因素在於民主派尚未準備好執政。缺乏行動綱領，無法團結，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未能充分利用葉爾欽對他們的依靠。可以事實建立一個強大的政黨、採行新憲法、建立新的制度。錯過了時機。(Alexander Dallin)表示，民主派無力取代在位者，並進行經濟、司法體系的改革、撤除軍工部門，簡言之，民主派未完成革命，進一步造成內部分裂與失敗。人民人士情願依靠在葉爾欽之下，作為幕僚人員。Alexander Dallin,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in *The New*

而此時葉爾欽人馬的分裂與對立，是檯面下的派系競爭、私底下的暗中較勁。葉爾欽身旁有兩派人馬的競爭，分別以布爾布利斯及彼得洛夫為首的兩個集團。布爾布利斯代表激進改革的一方，彼得洛夫則是代表新保守主義的一方。布爾布利斯期望在各領域進行激進的措施，尤其是經濟改革，而不考慮政治與社會可能帶來的限制。葉爾欽選擇蓋達是因為布爾布利斯的推薦。彼得洛夫則公開支持總統應有極大的權力，並可用命令進行統治。彼得洛夫集團則與蘇聯時期的舊官僚仍保持密切聯繫，彼得洛夫希望建立一個父權主義式的國家。兩派人馬都想要獲取壟斷影響葉爾欽的權力，佔領優勢位置。但葉爾欽左右逢源，從未真正明確固定支持某一派。更重要的是，葉爾欽讓布爾布利斯及其引薦的蓋達負責經濟事務，讓彼得洛夫負責內政安全事務，使得兩方對政策的衝突得以降低。

二、葉爾欽面臨政經壓力，吸納中間派人士為人馬

1. 反對派勢力利用經濟改革副作用作為反撲葉爾欽的工具

葉爾欽不斷地擴大自己的權力，相對地，也不斷削弱其他政治人物的權力，尤其是副總統魯茲柯伊與議長哈斯拉托夫¹⁰⁵。魯茲柯伊的權力不斷被架空，便由葉爾欽的昔日盟友轉而成為葉爾欽的首要政敵，在國會中集結反葉勢力。這樣的轉變一切都要歸諸於權力的爭奪。當初葉爾欽選擇與魯茲柯伊合作，其策略是想利用魯茲柯伊的軍人身分來吸引軍方部分的選票。而自由派人士對於葉爾欽聯合魯茲柯伊的做法感到不解。事實上，魯茲柯伊在選後才了解到，自己副總統職位只是個花瓶，但魯茲柯伊不甘於此，積極運作自己的影響力，不甘於作個虛位

Russia, ed. Gail W. Lapidus(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p.247.

¹⁰⁵ 1991年8月政變時，葉爾欽在各地區任命自己的第一任代表與行政首長，1992年2月哈斯拉托夫宣佈地方蘇維埃不隸屬於葉爾欽的省代表之下。這是議會建立抗衡總統權力的第一步。兩人均視自己為權力的中心，兩人的怨恨轉擴大為行政與部門之爭。總統成為自由派技術官僚菁英的發言人，議會則代表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部分。在葉爾欽集團的支持下，大眾媒體將國會描述為改革的阻礙。

副總統，雖然進入了克里姆林宮的圈子，卻無法參與決策制定的過程。葉爾欽對哈斯布拉托夫的評論是：魯茲柯伊最大的錯誤在於不願了解且不願接受自己的處境與地位。¹⁰⁶

魯茲柯伊的策略就是加入反對葉爾欽的聯盟，但是魯茲柯伊的第一步就是攻擊蓋達政府，而避免直接對抗葉爾欽。共黨與國家主義份子將魯茲柯伊視為潛在的領導人。葉爾欽為去除魯茲柯伊的力量，便指定他負責農業事務。而熟悉蘇聯歷史的人都知道，負責蘇聯農業的職務就等於是宣判政治死刑，因為要解決國家的農業問題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事情。魯茲柯伊本人也稍具個人魅力，懂得如何在群眾面前表現自己，很快地，魯茲柯伊的支持度緊接在葉爾欽之後。

改革對俄羅斯的經濟與人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衝擊，俄羅斯的總體經濟失調，生產大幅衰退，物價指數飆漲，人民收入減少，福利品質下降，所以人民對改革派不滿，民眾對改革失去信心。反對葉爾欽的共黨與民族主義派則利用此情勢，批評葉爾欽的改革政策，不斷增強自己的聲勢。1992年1-2月紅褐聯盟反對派首度展開街頭抗議，未能吸引大批群眾，大約只有1至4萬人參加。但政府對此感到憂慮，找不出對策回應。反對派逐漸以議會為中心團結起來，尤其是巴布寧(Sergei Baburin)領導的統一派系(Unity faction)。2月反對派集結各派勢力組成國會公民與愛國勢力(Congress Civil and Patriotic Forces)單一運動，正式合作。少部分民主人士亦加入，身分轉換為愛國主義傾向，甚至提倡恢復國家統一與強勢帝國政策。葉爾欽表達對反對派的關切，認為反對派所進行的一連串運動對政府造成威脅。一般我們都認為經濟改革與經濟情勢惡化是引發政府與國會雙方衝突階段的開始，但事實上，與其說經濟改革的副作用結束了府會合作的蜜月期；到不如說，葉爾欽權力擴張促使反葉勢力集結，並利用經濟改革政策攻擊葉爾欽。

¹⁰⁶ Lilia Shevtosova, *Yeltsin's Russia Myth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pp.28-29.

2.第六屆人大會（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促使葉爾欽拉攏中間派

面對這一連串的政治壓力，葉爾欽開始轉變策略，擴大其政治聯盟。起初，葉爾欽力保蓋達政府，聯合對抗國會。但情勢一直未能好轉，葉爾欽迫於情勢改而尋求聯盟者，拉攏中間派的勢力。葉爾欽不得不因為經濟改革政策的失誤，棄卒保帥。俄羅斯政府內部便由清一色的改革派，轉為改革派與中間派混合的內閣。

在 1992 年 4 月第六屆人大¹⁰⁷開議前，葉爾欽為了緩和議會對政府的攻擊，對政府內部進行了調整。葉爾欽解除布爾布利斯第一副總理職務、沙赫萊副總理職務與蓋達兼任財政部長的職務；並且由舒梅科（Vladimir Shumeiko）任第一副總理、齊諾爾梅金任副總理負責能源、希札（Georgy Khizha）任副總理負責工業。三位工業家進入內閣，葉爾欽自己承認犯了嚴重的錯誤，給予三人重建因經濟改革而支離破碎工業部門的重責大任。¹⁰⁸但同時任命蓋達為代總理，作為平衡。第四屆人代會結束後，葉爾欽把蓋達由第一副總理的職位提升為代總理，繼續與議會對抗。將兩派的力量又再度平衡回來。

第六屆人大開議後，以反對派為主的人代會強烈攻擊政府的經濟改革方案震盪療法，要求以蓋達為首的政府辭職，要求葉爾欽不得再兼任總理，並需在三個月內提出總理人選交付議會討論。蓋達率政府成員退席以示抗議。哈斯布拉托夫為首的會議勢力指責改革等改革派是一群乳臭未乾的毛孩子，人代會通過「關於俄羅斯聯邦經濟改革進程的決定」，批評政府的經濟政策，開始試圖限制總統與政府的權力。

¹⁰⁷ 俄羅斯國會，人民代表大會，一般稱為舊國會，是蘇聯舊體前 1990 年由公民直接選舉選出 1033 名代表所組成。

¹⁰⁸ *Keesinge'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May 1992, p. 38923.

左派及中間派提出停止私有化、加強國家調節作用、實行社會保護與福利等主張，這完全符合俄羅斯民眾迫切希望獲得保障的心理。¹⁰⁹但是這樣的建議，對於改革派人士而言，這樣就等於是又走回半調子改革的老路，是他們所無法接受的。改革派並不重視任何社會不滿的警訊，甚至蔑視、批評這些建議，認為改革必須堅持下去，必須更加強力地執行。輿論界認為俄羅斯的經濟危機不是過去未解決的問題所累積造成的，而是錯誤的改革方針與改革方式所造成的。對於這些意見，蓋達等改革派人士只是將其視為改革的阻礙力量，對改革的惡意攻擊。在經濟危機一直未解決前，蓋達政府受到愈來愈多的批評與抵制。副總統魯茲柯依諷刺蓋達政府的改革基礎是建立在總統的肩膀上，而不是民意的支持上。

3.第七屆人代會的持續攻擊下，葉爾欽任命齊諾梅爾金為總理

1992年12月召開的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俄羅斯的經濟形勢更加惡化，議長哈斯布拉托夫發誓要把蓋達拉下台，且會議第一天就迅速提出彈劾總統案。在這種種的壓力下，葉爾欽權衡得失，必須與國會妥協，提名國會與自己均能接受的齊諾梅爾金為總理。葉爾欽在經濟改革上對於政策的堅持早已消失，調整政策。葉爾欽任命亞洛夫（Yuri Yarov）為副總理，是對保守派的讓步；另一方面，任命費多洛夫負責財政與經濟的副總理，保持改革派的勢力，另外葉爾欽則暫時讓蓋達退居幕後，擔任總統經濟顧問，給予蓋達繼續發揮所長，能繼續為葉爾欽效忠的機會。

齊諾梅爾金為取得葉爾欽信任轉變為其人馬，葉爾欽利用政府佈局制衡齊諾梅爾金的影響力。齊諾梅爾金任總理從1992年12月至1998年3月，大約五年

¹⁰⁹ 左派共產黨堅決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化，反對私有化，要求恢復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要求國家對經濟實行全面性的干預與控制。中派也主張應該再必要時恢復指令性計劃經濟，加強國家干預。工業聯盟主席沃爾斯基指出：在生產出現雪崩式的大衰退情況下必須採取非常措施，權宜之計應暫時恢復計劃經濟與國家對資源的控制，沒有國家的調節是無法走向市場經濟的，最後，還是必須對價格進行調整，而這樣的經驗是符合德國與日本在過渡時期的經驗。

的時間。齊諾梅爾金是個妥協性的人物。齊諾梅爾金擔任總理初期為取得葉爾欽的信任，獲取更大的決策授權，在許多情況下表現服從於葉爾欽，短暫地化身為葉爾欽的人馬。齊諾梅爾金能在位這麼久，除了能妥善處理與葉爾欽的關係外，與國會良好的合作關係也是一項重要因素。1996年6月葉爾欽再度蟬連總統職務後，再度任命齊諾梅爾金為總理，被稱為反對派的國會，卻以314贊成票對85反對票，3票棄權，通過了齊諾梅爾金的任命案。

1992年12月蓋達的下臺，原第一副總理齊諾梅爾金的接任總理。而由於齊諾梅爾金並非葉爾欽的人馬，葉爾欽便安插費多洛夫¹¹⁰為財政部長，用以平衡齊諾梅爾金的中間派勢力。齊諾梅爾金在這樣的內閣中無法改變政策，而葉爾欽又讓費多洛夫主導經濟政策，負責協調政府各部會間及與中央銀行的經濟大權。另外，蓋達時期的政府人事大抵上維持不變，基本上還是以改革派為主，有人稱齊諾梅爾金一開始的政府是個「沒有蓋達的蓋達政府」。葉爾欽挑選費多洛夫挑大樑的主因是西方認定費多洛夫是經濟改革的保證，另外，費多洛夫比蓋達多了與政府官僚共事的經驗。費多洛夫在葉爾欽的支持下，成功地排擠齊諾梅爾金，使齊諾梅爾金的政策邊緣化。因此有人稱齊諾梅爾金的經濟政策是「沒有蓋達的蓋達經濟政策」。

在齊諾梅爾金前期，主要是費多洛夫與齊諾梅爾金的對抗，後期則以楚拜斯—涅姆佐夫聯盟和齊諾梅爾金的對抗為主軸，而後期的派系鬥爭尤為激烈，參雜了財閥、媒體間的纏鬥。兩派對立勢力各有上下，齊諾梅爾金政府的架構格局主要由工業家等中派人士所組成，而改革派則多次在葉爾欽的支持下，透過政府改組、人事任命案來強化改革派的勢力。

¹¹⁰ 費多洛夫在蘇聯時期擔任財政部長，兩年在倫敦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後被任命為俄羅斯在世界銀行的代表。

三、葉爾欽為公投佈局，進行小幅內閣改組

在 1993 年 4 月公投前，葉爾欽為爭取人民的支持，主動在 4 月 15 日進行內閣改組。在公投前夕，4 月 15 日葉爾欽任命拉夫洛夫（Oleg Lobov）為負責經濟與投資政策的副總理，顯示出葉爾欽願意站在人民身邊，採取更為彈性的政策。公投後，葉爾欽任命沙斯科維奇（Oleg Soskovets）為負責工業、能源與運輸的副總理。¹¹¹這兩位人士是葉爾欽的親信，都具有工業背景，屬於保守派，觀察家認為這是葉爾欽減緩改革的徵兆，改革派與西方都認為這是葉爾欽調整政策的警訊。但實際上，是葉爾欽用拉夫洛夫來平衡齊諾梅爾金的勢力。另一方面，葉爾欽的策略是要吸收工業遊說進入決策核心，以調和穩定化政策和產業政策。1993 年 4 月全民公投證明葉爾欽獲得人民的支持，鞏固了葉爾欽在 1990 年第六屆與第七屆人代會不斷流失的權力基礎，且給予經改一劑強力支持。

公投過後，葉爾欽的權力較為穩固。此時，葉爾欽下的派系，主要是費多洛夫與拉夫洛夫的對抗。拉夫洛夫認為除了應該採取放鬆與擴張的經濟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俄羅斯境內的生產聯繫，以恢復俄羅斯的經濟成長；給予企業優惠的貸款是要讓企業能夠繼續生存；在促進生產聯繫方面，則以組建金融工業集團為重心。費多洛夫與拉洛夫的對抗達到最高點，費多洛夫認為拉洛夫的政策違反的政府的經改路線。而葉爾欽究竟會支持誰的政策，葉爾欽與人代會處於衝突中，因此必須與中間派維持良好關係，因此，葉爾欽此時的政策立場傾向拉夫洛夫，費多洛夫的影響力與政策相對地被削弱了。

四、葉爾欽在解散國會後，進行內閣改組

葉爾欽與國會的關係，愈來愈趨緊張。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葉爾欽必須降低其底下派系的鬥爭。1993 年 9 月 16 日，葉爾欽再度任命蓋達為第一副總理兼經

¹¹¹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April 1993, p.39421.

濟部長，且讓拉夫洛夫轉任安全會議秘書，這項任命案代表葉爾欽欲剔除拉夫洛夫對政府穩定化政策的干擾。葉爾欽不希望其底下人馬的派系鬥爭造成內傷，而必須集中全力來對付國會。

葉爾欽與國會的對峙衝突點是憲政體制中的權力爭奪，究竟是趨向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國會威脅彈劾葉爾欽，葉爾欽則威脅解散國會。9月21日，國會通過降低彈劾總統的門檻，葉爾欽對此加以還擊。葉爾欽發布總統令宣布解散國會，把立法機關改名為國家杜馬，並宣佈1993年12月提前舉行國會選舉。¹¹²國會拒絕接受葉爾欽的總統令，國會舉行餘黨會議，宣布魯茲柯伊為總統。葉爾欽此時採取十分冒險的政策，斷絕國會白宮的電源。國會試圖接管奧斯坦基諾電視塔。魯茲柯伊和哈斯部拉托夫希望能引發全國性的反葉爾欽暴動、革命，吸引軍隊往國會靠攏，並企圖扳回對幾個關鍵部會的控制，希望撤換部長而由自己的政治盟友接任。軍隊的態度游移，最後決定支持葉爾欽，進行鎮壓國會，魯茲柯伊和哈斯部拉托夫等反對人士被捕。隨後，葉爾欽又發布總統令宣布解散各級蘇維埃、禁止勞動俄羅斯、救國陣線等20多個反對派政黨和組織的活動，停止真理報、蘇維埃俄羅斯報等10多家報刊的發行，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初步形成總統極權的局面。10月，葉爾欽採取更為極端的措施，直接砲轟國會，武力鎮壓國會反對勢力。¹¹³

為了拉攏民心，11月2日葉爾欽在對政府的講話中強烈地批評政府，譴責政府忽視窮人的需求，並要求政府加速改革。葉爾欽成功地單方面決定於1993年12月12日進行國會選舉與憲法公投。葉爾欽對制憲會議通過的新憲法草案做了修改，為自己量身定作，充分體現總統極權的精神，提交全民公決。在憲法公投方面，葉爾欽版的憲法在54.8%的投票率與58.4%贊成票下成功過關。而國會

¹¹²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Sep. 1993, pp. 39648-49.

¹¹³ Yeltsin,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p.12.

選舉方面，葉爾欽人馬的俄羅斯抉擇黨則未能達成使命。¹¹⁴1993年6月葉爾欽指示第一副總理蓋達成立俄羅斯抉擇黨，擔任黨主席，亦稱為總統黨，雖然有葉爾欽的支持，但是在人民生活水準大幅下降情況下，這個具改革派人士色彩的政黨，實在無法獲得生活於貧窮線下的民眾的支持。

第二節 派系穩固期

1993年新憲法通過後，葉爾欽確立了其在各派系之上的至高領袖位子，葉爾欽具有憲法所賦予的龐大權力，可以運用總統職位的人事任命權與決策權，來進行各派系間的運作。在這個階段，俄羅斯的政經狀況主要有1993年與1995年年底兩次國會選舉以及1994年10月的盧布暴跌事件，而派系也逐漸累積了一定的實力，派系的獨立性較初期大，派系間的互動頻繁，但在葉爾欽掌握派系運作大局的情況下，派系結構大致維持平衡。在派系穩固期的後期，葉爾欽為競選連任總統，尋求財閥的協助，這群財閥也成為葉爾欽的人馬，所謂的葉爾欽家族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所形成的。選舉過後，葉爾欽為了酬庸財閥，便讓其中兩位財閥進入政府內部，讓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界線模糊，政商合作關係正式形成一種半公開的貪污結構，根本無法治可言，政府的權力與國家財產為派系所利用與掌控。

一、國會選舉過後，葉爾欽相應改組內閣

1993年12月的國會選舉，共黨與自由民主黨大勝，俄羅斯抉擇黨的表现令改革派的聲勢受挫。而在國會選舉前，葉爾欽為了消除其下派系的鬥爭，讓改革派主導經濟政策，對選舉的策略而言無異是項自殺行為。1993年葉爾欽砲轟反對派為主的國會，雖然暫時解決了國會的反對勢力，但是新國會仍是以反對派為主，所以基本的衝突繼續存在。雖然共黨與自由民主黨是國會中的第一與第二

¹¹⁴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Dec. 1993, pp.39782-83.

大黨，但是由於俄羅斯並非內閣制，因此無組閣的權力。然而葉爾欽面對國會的新生態，葉爾欽雖然掌握政府的組成，不需要由共黨來組閣，或接納共黨人士入閣，但是，葉爾欽還是必須相應做出一些人事上的調整，以平息國會的反對聲浪，因此，1994年1月費多洛夫及蓋達即馬上離開政府。1月16日蓋達辭職，26日費多洛夫辭職，兩位改革大將的下臺使俄羅斯未來的改革變的不確定，新內閣呈現中間派為主的特色，強化了以齊諾梅爾金為首的中間派力量。強力部會的人士則維持不變。政府內部只剩下激進改革派楚拜斯、溫和改革派沙赫來、修金可以制衡齊諾梅爾金的勢力。另外，葉爾欽對政府的組織結構進行重組，發布總統令將副總理的人數由九位減到五位，政府的部門改為23個，比之前少了7個，增加了3個新部會，分別是：24個國家委員會，20個聯邦級機構。¹¹⁵

面對仍以反對勢力為主的國會，葉爾欽採取較為溫和與妥協的態度，並讓兩百四十五位社會政治團體代表於莫斯科簽署(Treaty on Civil Accord)，算是葉爾欽的策略運用成功。

二、葉爾欽的保守派人馬與齊諾梅爾金對抗

經過1993年砲轟白宮事件後，敵對的勢力會試圖尋求某種形式的妥協以維持相互的生存，而害怕再度發生流血衝突與軍事介入政治的心態，反成為促進穩定的因素，因此，1994年是俄羅斯相當平靜的一年。此時，葉爾欽底下人馬的派系鬥爭又浮出檯面。而這次的鬥爭主要是齊諾梅爾金與葉爾欽人馬斯科柯夫、科札柯夫和巴蘇柯夫的鬥爭。

第一副總理斯科柯夫與總統侍衛長科札柯夫、巴蘇柯夫結成聯盟，¹¹⁶其中，

¹¹⁵ *Izvestiya*, January 20, 1994.

¹¹⁶ 科札柯夫稱為我們親密的(Our close team)，包括葛拉喬夫、巴蘇柯夫、總統辦公廳經濟事務主任包羅定(Pavel Borodin)、內政部長葉林(Viktor Jerin)以及葉爾欽的網球教練(Shamil Tarpishchev)。

斯科柯夫一直想成為總理，科札柯夫則開始介入政府的經濟事務，想從齊諾梅爾金手中搶奪出口與出售的許可證與配額，這是一項利潤極大的權力。科札柯夫逐漸成為獨立的政治掮客，斯科柯夫與軍方關係良好，是軍工複合體在政府中的代言人兼說客，斯科柯夫的人馬特拉夫金（Nikolai Travkin）被任命為不管部部長（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顯示出斯科柯夫具有一定的影響力。¹¹⁷而這三位葉爾欽的忠實人馬屬於強硬派，與安全會議的葉果洛夫、史泰巴辛、拉夫洛夫等強硬派被稱為戰爭黨（party of war），當時擁有最大的影響力，促成葉爾欽派兵進入車臣來解決國家聯邦完整性的問題。

此時，葉爾欽底下的人馬派系不合，導致總統辦公廳內部和政府內部都呈現激烈派系鬥爭的現象，總統辦公廳與政府也相互爭奪對總統的影響力。而為了解除這個問題，葉爾欽發布總統令協調政府與總統辦公廳（Decree on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and presidency）。葉爾欽與齊諾梅爾金均否認政府與總統行政部門間存在衝突與對立，這項總統令是為了促進工作效率。

三、金融風暴引發國會提不信任案

10月11日俄羅斯爆發盧布暴跌事件黑色星期二（Black Tuesday），不僅對俄羅斯的經濟造成極大的衝擊，也震動了俄羅斯的政壇。面臨這項危機，葉爾欽隔天隨即設立一調查小組，由聯邦反情報局主席史泰巴辛（Sergei Stepashin）負責。失勢的改革派則利用黑色星期二事件，向政府與中央銀行發難，迫使葉爾欽對政府進行大刀闊斧的改組，指出中間派必須對黑色星期二事件負責，葉爾欽即藉此良機，開除中央銀行總裁葛拉申科與財政部長。

¹¹⁷ 根據1994年10月的民意調查，科札柯夫是第7位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11月晉升至第4位，12位是第3位，1995年1月則成為第2位，僅次於總理齊諾梅爾金。科札柯夫曾說，葉爾欽再度入睡，我開始統治國家。科札柯夫與葉爾欽的直接接觸讓他能夠對葉爾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引起民主派與務實派人士的疑慮。改革派認為如果能革除科札柯夫這個親信，就能葉爾欽變得更加

另外，針對盧布暴跌事件，10月27日國會要求政府總辭，提出不信任案，但沒有通過。葉爾欽與農民黨達成私下協議，任命農民黨納札爾楚克（Aleksandr Nazarchuk）為農業部長，作為放棄不信任案的回報。因此，55位支持共黨的農民黨員卻在此刻棄權，成為政府安然度過不信任的關鍵因素。政府雖然通過不信任案的考驗，葉爾欽卻在11月17日又進行一次內閣改組，所有的改革派在政府的職務一一遭撤除，而只有楚拜斯是唯一的倖存者，但職位層級提高到政府的第一副總理，全面負責財政和經濟工作，而楚拜斯的私有化部長職位改由波列范諾夫（Vladimir Polevanov）接任。總統辦公廳人員潘斯科夫（Vladimir Pansov）接任財政部長。

四、針對布丹諾夫斯克人質危機（Budennovsk hostage crisis），國會提不信任案，葉爾欽開除強硬派份子回應

1995年6月車臣叛軍攻擊了車臣以北的布丹諾夫斯克，並挾持醫院裡1000至1500名人質。在解決人質危機上，政府內部發生分歧，國防部長葛拉喬夫主張使用武力解決危機，內政府長葉林則反對使用武力。國會則針對人質危機案提政府不信任案，由於葉爾欽開除了三位自己的強硬派人馬，包括葉林、葉果洛夫及史泰巴辛，讓亞伏林斯基的蘋果黨和農民黨改變決定，放棄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又再次安然度過不信任案。另外，內政部部隊兩次攻擊醫院解救人質的任務失敗後，總理齊諾爾梅金出面採取談判的和平方式解決，最後，車臣反叛軍同意釋放人質，但以護送他們到車臣的讚達克（Zandak）作為交換條件。齊諾爾梅金成功地利用人質事件提高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力。¹¹⁸

五、國會選舉

面對即將來臨的國會選舉，葉爾欽又採取相同的策略，責成總理諾爾梅爾金

加開放且積極從事改革。

¹¹⁸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June 1995, p.40608.

組成我們的家園俄羅斯（Our Home is Russia），而這個政黨有政府閣員、企業家的強力後盾。然而，1995 年 12 月國會選舉，共黨仍舊是大贏家。葉爾欽充分了解到 1993 年底與 1995 年底兩次國會選舉，反對派的勝利與改革派的敗選，反映民眾不滿政府的經濟政策和過度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回應 1995 年國會選舉共黨勝選，葉爾欽進行部長會議改組，撤換掉一些改革派人士，以使政府較不易受到強硬派的批評。外交部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辭職，1996 年 1 月 9 日葉爾欽任命普里馬科夫為新外交部長。

1995 年 12 月 29 日國會選舉後，葉爾欽開除改革派人士是基於兩項考量，一是對國會生態做出相應的人事調整，二則是關乎 1996 年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葉爾欽面對新局勢，將其身邊的人馬，政府及總統辦公廳的人士組成中剔除一部份改革派人士，加入較具左派色彩的人士；然後在 1996 年總統勝選後，才加強改革派人士。¹¹⁹ 共黨份子謝列茲諾夫（Gennady Seleznov）當選為杜馬主席，歐列爾（Orel）區省長史特洛耶夫（Yegor Stroyev）當選為聯邦院主席，葉爾欽迅速與兩人建立良好關係。

六、葉爾欽為連任之路佈局

葉爾欽為了連任總統成功，將楚拜斯解職，與這位俄羅斯全國最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脫離關係。但是，隨後楚拜斯的政治能力高，可以為葉爾欽籌組競選團隊，規劃最佳的選舉策略，葉爾欽才又讓楚拜斯擔任競選團隊的主任。在第二輪選舉投票前，葉爾欽為吸收列別得的票，於是拉攏列別得為短暫的政治盟友，允諾給予列別得安全會議秘書的職位。選舉過後，葉爾欽又對政府及總統辦公廳的人士做出相應調整。

葉爾欽於 1 月 16 日將第一副總理楚拜斯解職。楚拜斯是首要的支持改革者，

負責俄羅斯的全盤經濟政策。總統令在解職楚拜斯中提到，楚拜斯在經濟事務領域與職權範圍對於聯邦機構的態度不當，並且無足夠能力實行許多總統命令與指示，但葉爾欽為尋求連任成功才是背後的真正原因。1 月 25 日葉爾欽任命卡達尼可夫（Vladimir Kadannikov）接任楚拜斯的遺缺第一副總理負責經濟，是全俄羅斯最大汽車公司總裁，是舊式官僚與工業家，是葉爾欽的私人朋友，亦是葉爾欽強硬派保鏢科札柯夫的朋友。葉爾欽任命楚拜斯的副手卡札柯夫（Alexandr Kazakov）為副總理及國有財產局主席。顯示出楚拜斯的職務與權力已經有效地徹底拔除。副總理沙赫來與不管部部長特拉符金因當選國會議員而卸任。葉爾欽將農業部長那札爾楚克開革，任命副總理札維路哈（Alexandr Zaveryukha）為農業部部長。另外，在總統辦公廳方面，1 月 13 日總統辦公廳主任自由派人士費拉托夫（Sergei Filatov）辭職，15 日葉果洛夫（Nikolai Yegorov）接任主任。費拉托夫的辭職與葉果洛夫的就任被視為是鷹派勢力的增長。22 日蓋達辭去總統顧問，在電視訪問中說明他與葉氏的分離是無法挽回的。

1996 年 6 月 16 日總統選舉，葉爾欽未能獲得 51% 的選票，因此必須與朱家諾夫競爭第二輪總統選舉。7 月 3 日舉行總統第二輪選舉，葉爾欽獲得 53.82% ，朱家諾夫獲得 40.31% ，葉爾欽順利連任總統。

第三節 派系混戰期

根據派系穩定的要件，當派系的至高領袖權力愈不穩固時，派系的結構會愈不穩定。葉爾欽在順利連任俄羅斯總統之後，健康極速惡化。葉爾欽生病住院開刀給予各派系競爭葉爾欽決策真空的空間。另外，派系在穩固期已經累積的一定的勢力，有實力對其他派系發動猛烈的攻擊，甚至欲取代葉爾欽，成為俄羅斯的領導人。此時，後葉爾欽時期的現象浮現，俄羅斯政壇開始討論誰是葉爾欽的代

¹¹⁹ Thomas F. Reminton,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Longman, 1998) ,p.56.

理人？誰又是葉爾欽的接班人？葉爾欽在某些決策上不得不依賴其身旁的人，此階段政治僵局與經濟危機接連不斷，更是讓葉爾欽應接不暇，尤其是 1998 年 8 月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一連串政經危機，更是讓葉爾欽的地位與威信降到最低點。葉爾欽在無法時時掌握派系運作的情況下，權力明顯地下降許多，再加上幾大國營企業現金私有化的拍賣事件，政治權力的空間與國家財產的大餅成為派系爭奪的戰場，更加強化了派系間的混戰。

一、列別得權力晉升，葉爾欽將其職務與權力拔除

總統選舉過後，派系鬥爭又浮出檯面。派系在行政機關內的職位爭奪戰馬上展開。第一輪選舉的最佳贏家是列別得，第二輪的最大贏家是代總理齊諾梅爾金及楚拜斯。選後，葉爾欽授權齊諾梅爾金組成新內閣。齊諾梅爾金獲得左派反對勢力的支持。列別得毫不隱瞞地聲稱自己有能力當總統，具有特別權力。齊諾梅爾金反對列別得。列別得權力突然高漲，引起政壇其他勢力的質疑，而葉爾欽借用各方的勢力與意願，將列別得弄下臺。

列別得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 15% 選票，位居第三。列別得是位將軍，屬於軍方系統，在政策上強調愛國主義、國家主義。葉爾欽在總統第二輪選舉中，為了拉攏列別得，葉爾欽不惜解除其忠實人馬科札柯夫、巴蘇柯夫與斯科柯夫的職務，以換取選戰的勝利。葉爾欽允諾給予列別得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總統辦公廳國家安全顧問的職位，另外，葉爾欽還授與列別得打擊罪犯與貪污的特別統治權力，並授與列別得解決車臣問題的任務。為了更進一步滿足列別得，葉任命列別得的人馬拉吉諾夫(Igor Rodionov)為新國防部長。但實際上，葉爾欽刻意成立新機構國防會議(Defense Council)來抵銷列別得所在的安全會議的權力。

國家安全會議根本無實際的權力，憲法無文明規定其權限。列別得成功地與車臣達成停火協議，這是他個人的勝利。列別得的聲勢超過總統辦公廳及政府中

的其他政治人物，招來他人忌妒。葉爾欽順勢利用這股反列別得勢力，於 1996 年 10 月解除列別得的職務，列別得在國家安全會議總共只待 3 個月。8 月 10 日葉爾欽改任列別得為總統代表，雷布金取代列別得接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二、楚拜斯派系的權力大增

楚拜斯在協助葉爾欽再度當選俄羅斯總統後，成為俄羅斯政壇上的風雲人物。許多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觀察家，一度認為楚拜斯是葉爾欽之後第二位有權力、具影響力的人物。在葉爾欽生病期間，人稱私有化之父的楚拜斯被其政敵稱為攝政王、克里姆林宮的第二號實權人物。楚拜斯獲得葉爾欽的信任，在許多事情上頻頻立功，成功地操盤總統選舉，運用適當的策略；然而楚拜斯亦是葉爾欽的政治負債，由於楚拜斯主導私有化，是俄羅斯斯共產黨反對派最厭惡的頭號人物。1995 年 12 月的國會選舉，政權黨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選舉失利，葉爾欽將其責任歸咎到楚拜斯的身上，一方面亦考量到未來的總統選舉，不得不將楚拜斯第一副總理的職務撤除，但是不到一個月之後，楚拜斯應葉爾欽之邀出任領導總統競選班子，1996 年 7 月 15 日復出，東山再起，擔任總統辦公廳主任兼總統首席助理。撤除楚拜斯的職務不過是葉爾欽一時的權宜之計。

楚拜斯取代保守派的葉果洛夫成為辦公廳主任，重組總統辦公廳。楚拜斯背後有七大財閥的支持，葉爾欽家族影響力的增加。楚拜斯的人馬相繼進入政府，佔據重要的職務。而選舉過後，葉爾欽酬庸財閥在競選時資金與媒體的援助，讓楚拜斯的人馬金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及波坦寧進入政府。奧涅克辛銀行總裁波坦寧 (Vladimir Potanin) 接任副總理，並負責企業的債務問題，擔任政府改善支付與清償體制委員會主席 (Government's Operational Commission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Payments and Settlements, non-payments commission)。別列佐夫斯基擔任安全會議副秘書職位，負責車臣經濟重建的任務。別列佐夫斯基的任命代表了

一種新趨勢，與共黨或官僚無關係的人士開始接管經濟與政治。¹²⁰這對官僚與經理人的舊利益集團造成威脅，舊利益集團必須與這些新來者分享利益，或者相互競爭。新俄羅斯人極具侵略性、進攻性，在追求個人利益時是毫無任何原則的，可以在任何的情下中迅速適應且生存下來。而大部分的舊利益者不夠狡猾詭詐，不足以和對抗，此外，舊勢力也缺乏總統家族與總統圈子的關鍵性支持。

三、總理齊諾梅爾金仍牢握權力

楚拜斯是讓葉爾欽繼續牢握政權的最大功臣，而楚拜斯的全盛時期自此開始，楚拜斯開始叱吒風雲。然而，齊諾梅爾金在擔任總理邁入第四年後，累積的實力已經顯現出來。8月9日葉爾欽重新任命車爾諾梅爾金為總理，10日杜馬通過齊諾梅爾金的任命案，以314票贊成對85票反對。齊諾梅爾金輕鬆順利獲得國會的通過，顯示出齊諾梅爾金是葉爾欽所需的聯盟者，亦是國會所支持的人物。齊諾梅爾金在許多方面的表現也逐漸開始建立自己的獨立性，有掙脫葉爾欽命令的傾向。在此階段則呈現楚拜斯與齊諾梅爾金相互對抗、上上下下的局面，其中更交雜了媒體與財閥的激烈鬥爭。

四、健康因素引發跛腳總統現象，葉爾欽強化自己的人馬

1996年10月組成四人協商會議(four-person Consultative Council)，是在總統進行心臟手術讓政治情勢保持穩定的機構。協商會議由總理車爾諾梅爾金、第一副總理兼總統辦公室主任楚拜斯、聯邦院與杜馬主席謝列茲紐夫、斯特洛耶夫組成。葉爾欽的健康情況引發一場是否應該修改憲法的辯論。這時，葉爾欽的忠實人馬甚至開始尋求方法限制總統的無限權力，以防止總統的繼承人同樣擁有這些無限權力。政治菁英已經開討論後葉爾欽時期(post-Yelstin era)的安排。葉爾欽的人馬，以楚拜斯為首也提出幾套方案：例如，以安全會議來取代總統、任命葉爾

¹²⁰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July 1996, p.41197.

欽的忠實者為總理，此外，葉爾欽的助手們也開始和各方談判總統辭職後各項待遇的保證。俄羅斯憲法沒有規定誰或哪個機構有權在總統生病時停止其全權。俄羅斯憲法第 92 條第二款規定，俄羅斯聯邦總統在其任期未屆滿之前如因辭職、或因健康狀況無能力執行其所有之全權或遭罷滿職務時，即停止行使全權。在此情況下，俄羅斯聯邦總統之選舉應在總統全權提前終止之刻起三各月之內舉辦之。但是未規定誰有權決定總統因健康理由無法視事。葉爾欽的助理強調只有葉爾欽本人有權作出決定。

1997 年 1 月 14 日杜馬安全委員會主席共黨黨員柳辛 (Viktor Ilyukhin) 提出彈劾葉爾欽，基於葉爾欽因健康因素無法擔任總統職務，要求永遠終止其總統權力。1 月 22 日，杜馬代表投票以 229 票對 63 票一讀大體上支持這項提案。以憲法層面來看，這項提案的效力有問題。因為依據憲法第 92 條規定，當總統無法視事時，並未賦予特定人士決定總統權力的終止。隨後提案二讀程序中，在葉爾欽的支持者抗議下，二讀的程序時間有問題，暫時解除危機。

葉爾欽不甘成為跛腳總統，開始強化自己的勢力，任命自己的人馬來戰線自己的權力。3 月 6 日葉爾欽於聯邦院發表國情茲文，對俄羅斯現階段經濟狀況與政府表現作出評估。演講結束後，葉爾欽進行政府人事改組，再度延攬改革人士入閣。葉任命楚拜斯為第一副總理負責經濟。3 月 17 日，任命涅姆佐夫為第一副總理。涅姆佐夫是各激盡改革者與的能力高的行政官員，自己形容接受此項任命是自殺的行為。5 月 19 日葉爾欽將農業部長赫魯斯廷 (Viktor Khlystun) 職位提升到副總理，負責農工複合體。這使得俄羅斯政府的副總理人數增加到七位，兩個第一副總理。觀察家表示赫魯斯廷的晉升是是總統用以緩和杜馬內保守派農業遊說者對政府削減支出不滿的做法。6 月 30 日葉爾欽任命女兒塔季安娜 (Tatyana Dyachenko) 為總統顧問，負責改善總統的公眾形象。

五、齊諾梅爾金利用醜聞案成功地打擊楚拜斯與涅姆佐夫派系，獲取更大的權力

總統選舉過後，楚拜斯的權力大增，但齊諾梅爾金的權力也未減弱，兩派的鬥爭在選後激烈展開。楚拜斯握有總統辦公廳，且楚拜斯的人馬，包括財閥，都位居政府要職。而齊諾梅爾金也不甘示弱。齊諾梅爾金利用醜聞貪污案開始攻擊楚拜斯及其人馬。齊諾梅爾金成功地讓葉爾欽解除楚拜斯職務，但是，最後葉爾欽親自開除了齊諾梅爾金。

1997年11月20日，楚拜斯及涅姆佐夫因貪污醜聞案因此失去財政部長與能源部長職務，仍保留第一副總理的職務。而能源部長由涅姆佐夫的人馬基里延科接任，因此，涅姆佐夫仍保持對能源部門的掌握。葉爾欽任命杜馬預算委員會主席札多諾夫（Mikhail Zadornov）為財政部長。札多諾夫是自由反對派蘋果黨黨員，但在接受職務後退掉黨籍。亞伏林斯基表示蘋果黨不同意札多諾夫的任命，並且繼續在杜馬杯葛政府1998年的預算。亞伏林斯基否認黨內有分裂的情況。11月24日札多諾夫開革負責擬新稅法的副財政部長夏塔洛夫（Sergei Shatalov），改派預算委員會主席莫托寧（Mikhail Motorin）負責。另外，財政部宣佈終結政府在奧涅克辛（Oneximbank）七個處理稅收的帳戶，這項舉動顯示出政府明顯地想斷絕與財閥間的關係。¹²¹而以上的人事變動顯示初楚拜斯的勢力不斷地被削弱，而原先楚拜斯掌握的經濟政策有轉由札多諾夫負責的傾向。

兩位第一副總理楚拜斯及涅姆佐夫改革的影響力降低，總理齊諾梅爾金將兩位改革大將的職務削減並且將自己的職務擴大到其他領域，如直接監督財政部、內政部、國防部、外交部及能源部等。齊諾梅爾金的權力擴張正在不斷擴大中，1月16日齊諾梅爾金重新分配兩位第一副總理及七位副總理的職務，這項調動獲得葉爾欽的批准。涅姆佐夫在此次職務重新分配下，被奪去負責監督能源政策

¹²¹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Nov. 1996, p.41418.

的權力，楚拜斯則不再負責媒體。涅姆佐夫轉而負責最具政治敏感的福利、住房、運輸改革；楚拜斯負責增加預算收入、起草全盤的經濟改革戰略。而對葉爾欽而言，繼續楚拜斯的職務，甚至賦予重任，一來具有給予西方投資者一針鎮定劑的效用，維持其對俄羅斯市場的信心；二來則可以繼續用來平衡齊諾梅爾金了。此外，這也證明了楚拜斯具有強力的行政能力與處理經濟問題的長才。而楚拜斯這位俄國最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恰好是葉爾欽與齊諾梅爾金在被批評表現不佳時的避雷針，做為大眾指責批評的第一線犧牲者，楚拜斯更不具接班相，不會對他人造成威脅。

六、葉爾欽拔除齊諾梅爾金，以除後患

齊諾梅爾金權力高漲，被視為是葉爾欽的接班人，讓葉爾欽備感威脅。1998年2月26日齊諾梅爾金政府向總統提出的年度報告上呈，葉爾欽照例會對內閣發表談話，而跟過去一樣，葉爾欽要求政府對無法解決經濟問題一事負責。葉爾欽在聽取完政府報告後，又再度入院，這次是因為喉頭炎。此時齊諾梅爾金被視為是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被視為是葉爾欽的正式接班人。葉爾欽因臥病在床，無法出現在公眾場合，許多總統的例行事務改由總理齊諾梅爾金代任。

葉爾欽決定開除齊諾梅爾金，以展現自己的政治實力，而非是個跛腳總統。而葉爾欽開革整體內閣是秘密計劃進行的，只有一小群圈內人塔季安娜、尤馬雪夫知道細節情形，克里姆林宮的觀察家稱這次秘密行動為「總統政變」(presidential coup)。因為唯有秘密進行，才能在不遭到預先的抵抗的情況下順利完成。同樣地，葉爾欽並未仔細想過後果與後續發展，葉爾欽首先宣布自己將代理總理職務，但是這是不合憲法的。在與齊諾梅爾金會面時，葉爾欽表示要提供杜馬的一個職務給齊諾梅爾金，雖然齊諾梅爾金不是杜馬代表。在解除內閣的命令中上寫道，總統指示齊諾梅爾金集中精神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準備工作

上，這是葉爾欽警告齊諾梅爾金暗地在為總統選舉準備，齊諾梅爾金加以回擊，說他的確會進行自己的競選運動。在分析齊諾梅爾金遭解職的原因，許多人士認為 1998 年 3 月齊諾梅爾金－高爾在美國舉行的高峰會，被稱為「未來總統的高峰會」。而齊諾梅爾金在奧德薩（Odessa）與烏克蘭及摩達維亞總統的會晤讓葉爾欽大感憤怒。葉爾欽打電話向齊諾梅爾金質問：是誰派你去哪裡？這表示齊諾梅爾金已經處於危機邊緣了。事實上，葉爾欽的行動是臨時起意的，基於個人情緒與本能反應，他的即興之作不過是個政治生存計劃。

1998 年 2 月 28 日葉爾欽開除三位內閣成員，分別是獨立國協關係副部長謝洛夫（Valery Serov）、運輸部長夏赫（Nikolai Tsakh）、教育部長季列涅夫（Vladimir Kinelev）。隨後 3 月底葉爾欽發佈一連串命令，並在 3 月 23 日開革整個內閣及總理齊諾梅爾金。3 月 27 日正式任命 35 歲的能源部長基里延科為預定總理。葉爾欽解釋此項作為的原因，政府的總辭是為了讓經濟改革注入活力與效率，葉爾欽表示政府無法處理許多關鍵問題，而且近來政府亦缺乏動力與刺激。葉爾欽稱讚齊諾梅爾金，並讓齊諾梅爾金準備二〇〇〇年的總統大選。葉爾欽在開革政府後，暫時擔任總理的職務，並要求部長在任命新內閣前繼續負責原先職務。

七、葉爾欽任命自己的人馬基里延科為總理

一般政治觀察家認為，葉爾欽任命基里延科¹²²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因為基里延科完全是位行政官員，本身不具有獨立的政治基礎與勢力，根本不可能對葉爾欽造成威脅；第二個原因是基里延科屬於改革派。第一個原因顯示出齊諾梅爾金的政治抱負是葉爾欽解除職務的原因。此外，因為基里延科是涅姆佐夫一手所提

¹²² 下諾夫哥羅德的共青團領導人，和其他共產黨青年青年組織中的年輕人一樣，在蘇聯時期就掌握住機會學習如何做生意，作為一個企業家。是下諾夫哥羅德地區石油公司的負責人。涅姆佐夫提拔基里延科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政壇中心發展，基里延科具組織天份，快速地在政府內部晉升。1997 年 11 月已經是俄羅斯的燃料能源部長。在被提名為總理後，迅速展現出靈活性以爭取各方勢力的支持，例如，為了使共產黨同意任命案，他承認自己沒有丟棄共黨黨證，對於參加共黨不感到羞恥。

拔的，因此基里延柯的上任代表楚拜斯與涅姆佐夫勢力的勝利，延續著改革派的勢力。雖然基里延柯的竄昇是相當機運的，但基里延柯十分符合葉爾欽所認為適合人選的條件。因為葉爾欽需要一個不與任何利益團體掛勾的人物，葉爾欽喜歡年輕的官僚，基里延科年輕有活力，有說服力地推動自己的理念，基里延柯缺乏全國性的政治經驗，在莫斯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年，在沒有政治勢力基礎的情況下，讓基里延柯必須完全依賴總統的支持，這更是適合葉爾欽。但是，一個事事依靠總統的弱勢政府能解決國家的問題嗎？這位不經世事的年輕總理會獲得其他老練政治家的尊敬嗎？

然而，就像葉爾欽任命自己的人馬為總理時，必定會遭受國會的反對一樣。葉爾欽任命基里延科面臨俄羅斯國會與各方政治勢力的反對。葉爾欽的選擇引起極大的震驚與不滿，葉爾欽堅定地表示不會改變決定。杜馬兩次否決。反對最力的是共黨與蘋果黨，有不同的理由。共黨要求其黨員必須加入政府，蘋果黨則是認為基里延柯無法帶領國家渡過危機，他們認為基里延柯不過是葉爾欽及其內部圈子的傀儡，不斷地撤換政府是葉爾欽用以轉移政治責任的詭計。在第三次投票時，葉爾欽又運用了同時威脅且收買人心的兩手策略慣倆。葉爾欽的盟友沙赫賴向代表們警告，如果不通過任命案，總統會解散國會，根據新法進行選舉，不加入政黨名單。而這將對共黨及蘋果黨造成極大的打擊。在投票前，葉爾欽在電視發表演說，表示投票贊成基里延柯的代表將獲得個人補助，這同時是各威脅，也是項賄賂。葉爾欽的策略奏效，4月17日，杜馬251票贊成對25票反對。¹²³代表們實在不願意被解散，重新投入累人的選舉。葉爾欽再度贏得勝利。

5月5日葉爾欽與基里延科會面後，葉爾欽表示要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來執行政策。但是基里延柯政府的組成不代表一個改革派的團隊成立，基里延科的人事任命仍是由葉爾欽決定。基里延柯迅速組成政府，經濟部會由自由派人士擔

任。三位副總理分別是涅姆佐夫、西蘇耶夫（Oleg Sysuyev）與赫斯天柯（Viktor Khristenko）都是來自省地區的地方性的人士。外交事務及軍事部門則仍舊政府人士所擔任，國防部長謝爾蓋耶夫、外交部長普里馬柯夫、內政部長史泰巴辛，這表示葉爾欽要讓年輕的改革派負責經濟全權，讓內閣在政治上附屬於總統之下。西方的分析家對葉爾欽的此項政治作為感到樂觀，表示這是葉爾欽堅持改革的證明，葉爾欽會不斷堅持改革的路線。

另外，葉爾欽任命別列佐夫斯基為獨立國協代執行秘書。另外，同時俄羅斯聯合電力系統（UES）董事會特別會議選出楚拜斯為主席，而這無疑是總統團隊壓力所促成的結果。這代表葉爾欽受到多方團體的影響與壓力，葉爾欽試圖將這些相互敵對的派系團體安排適當的權力平衡的新架構。

葉爾欽在失去齊諾梅爾金後，短暫的效應是會引起政治的不穩定，因為齊諾梅爾金是可以補償葉缺席及代表領導階層某些重要部分利益的人物。更重的觀察點是，葉爾欽破壞了自 1993 年以來所形成舊的派系與聯盟平衡體系，而這個體系某個程度上補償了政治體制的缺乏制度化。這個體系也有助於葉爾欽穩固自己權力。在舊體系未變動前，統治階級的每一部份均認為葉爾欽允許其追求各自的利益，但是現在葉爾欽的作為，表示他不會永遠維持一切不變，他不是穩定與利益的保證。而這些政治菁英與既得利益者體認到葉爾欽的認知改變了，便會開始對葉爾欽產生不滿。

八、葉爾欽任命普理馬科夫解決經濟危機

新內閣的處境艱難，1997 年底俄羅斯的經濟就已經危機不斷，1998 年 2 月，投資比去年下降 7.8%，政府的支出中有 30% 用來償付國內外債務。基里延柯指出，如果這樣的趨勢再繼續發展下去，到了 2003 年，聯邦預算將有 70% 必須用

¹²³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Mar. 1998, p.42141.

以償還債務。聯邦稅收每月不到 100 億美元，但每月的支出卻高達 250-300 億美元，欠國營職工的薪資在 2 月時又增加了 21% ，每月的預算赤字高達 1650 億盧布。¹²⁴基里延柯有三個選擇，第一條路是選擇與蓋達或楚拜斯的方式，進行堅決的改革，降低國家債務、重組自然資源壟斷集團、消除停滯的企業。但是連經驗老道且影響力的楚拜斯在 1997 年都無法完成這項任務，而基里延柯到達成這項任務必須要有總統無條件的支持及背書，因此，菁英與民眾都認為此法不可行。第二種方案是繼續追隨齊諾梅爾金所鋪陳的經濟路線，繼續撲滅經濟危機的火源，維持各利益團體間的平衡，不去處理經濟停滯與經濟危機問題。第三種方式是實行新模式的改革方式，更強調社會福利，以得到俄羅斯人民的支持。但這需要建立極大的共識，為政府建立新的政治基礎，更需要龐大的財源來支應，因此也是不可行。

基里延科想要解決經濟危機，出售短期國家債券、進行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私有化與增加稅收，但都失敗了。雖然在 8 月金融危機前，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提供俄羅斯 226 億美元的貸款，葉爾欽允諾不會拖欠債務，但亞洲金融風暴和投資人信心不足下，俄羅斯政府破產了。而基里延科政府只生存六月個，在金融危機下結束短暫的執政。而葉爾欽的權力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也被削弱了，葉爾欽在度提名齊諾梅爾金為總理，這次國會兩次加以否決，而否決的原因是俄羅斯國家經濟之所以衰退且產生危機，齊諾梅爾金難咎其辭，因為車諾梅爾金從 1992 年 12 月執政至 1998 年 3 月；而當葉爾欽更進一步宣佈齊諾梅爾金是他的接班人時，國會更不可能通過齊諾梅爾金的任命案了。之後，葉爾欽顯示出願意與國會磋商總理人選與內閣任命時，國會在看出葉爾欽態度軟化的情況下，國會就強迫葉爾欽妥協。9 月 11 日，葉爾欽宣佈普里馬可夫是可接受的另一項方案，隨即獲得國會的大力背書支持。

¹²⁴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Feb. 1998, p.42091 .

九、普里馬科夫不斷累積政治實力，得到國會與地方領導人的支持，權力大幅晉升

普里馬科夫花了三個星期才決定內閣佈局，解除了這場政治僵局。某些政治人物拒絕進入內閣，某些則在後任命後自動辭職，普里馬科夫試圖組成一個極大或自己支持度的內閣，如任命共黨的馬斯流可夫為負責經濟的第一副總理、貨幣學派的札多諾夫為財政部長、自由民主黨的卡拉辛尼可夫（Sergei Kalashnikov）為勞工部長，有人稱普里馬科夫內閣具中左色彩。雖然普里馬科夫宣佈重新建立對經濟的控制，被預測為從回蘇聯統制經濟的威脅。普里馬科夫的第一項措施是為瀕臨破產的銀行安排債務交換。讓銀行可以向中央銀行從其存款準備金中貸款，用無價值的國家債券償還，這對銀行家來說無異是一項禮物。同時普里馬科夫承諾發放工資與退休金。事實上，普里馬科夫並未大幅調整經濟，解決金融危機和社會動盪是首要任務。10月7日獨立工會聯盟發動全國性的大罷工，但未能動員百萬人，對政府形成威脅。某些地區發生軍事抗議，佔領鐵路。而地方領導人要求財政和物資資源，俄羅斯可能分裂的恐懼再度而起。政府已經陷入一個無法解決的困境：如果政府不印製盧布解決工資拖欠問題，社會暴動可能爆發；如果政府印製盧布解決問題卻會引發新一波的通貨膨脹與經濟不穩定。普里馬科夫採取適中的辦法：溫和地增加貨幣供給。國際貨幣基金會十分不滿普里馬科夫任命葛拉申戈為央行總裁。美國總統柯林頓粗率地決定拜訪俄羅斯，只為了給予搖擺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政權支持。

在普里馬科夫 8 個月的總理任內，俄羅斯的政局趨於相對穩定，經濟情勢也微露好轉的跡象，普里馬科夫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普里馬科夫指出政府應在許多方面對經濟進行干預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否定過去照搬西方模式的錯誤做法，而面對西方國家的懷疑與指責其政府要重回到蘇聯計劃經濟的論調，普里馬科夫說明，加強國家干預不等於重新採取行政命令的辦法。在發展對外經濟聯繫方面，強調要著重發展與保護民族工業。強調國家可以向國外借款，但還是要以透

過發展本國工業的方式來累積資金。1999 年俄羅斯預算的兩大特點便是積極支持發展本國產業與滿足社會與民眾的需要。雖然迫切需要國外的貸款援助，但不能以犧牲國家主權來作交易，俄羅斯不能聽任外國的指揮。而西方因此對俄羅斯的經濟情勢與經濟改革前景持消極觀望的態度，拒絕向俄羅斯提供貸款，引起俄羅斯的不滿，因而俄羅斯國內也發起只有自救是最佳途徑的呼聲。普里馬柯夫的做法與看法深得民心。

在穩定政局方面，1999 年 1 月 22 日普里馬柯夫致函杜馬議長謝列茲列夫，建議三大權力機構發表聲明，自願暫時放棄行使部分憲法權力，以利於在總統選舉前的關鍵一年保證國內政治的穩定。而其方案具體的做法是：總統不解散杜馬、不行使解散政府的權力；杜馬不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並停止討論任何彈劾總統動議；政府不向杜馬提出是否信任政府問題進行表決的動議，另外，還包括保障葉爾欽退休後的各項待遇，以及不受刑事調查保證的條款。對此建議各方勢力的反應不一。葉爾欽的立場是：對自己憲法權力，過去不從放棄，現在也不打算放棄。葉爾欽指示總理與總統辦公廳主任兼安全會議秘書擬定總統、議會和政府保證俄羅斯政局穩定的聯合聲明草案，召開安全會議討論。安全會議在 2 月 5 日討論通過了上述政治聲明草案。

普里馬柯夫在總統、政府與國會的緊張關係間，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普里馬柯夫甚至提出穩定政局的解決方案，要求杜馬與葉爾欽贊同。但是國會認為此時情勢有利於自己，因此共產黨對葉爾欽提出彈劾案持續進行，葉爾欽被彈劾的五項罪狀是：葉爾欽 1991 年瓦解蘇聯，1993 年用武力解散當時的議會，卻弱俄羅斯國家軍隊的力量，搞垮俄羅斯的經濟，1994 年對俄聯邦的車臣共和國發動流血戰爭。對這樣一個政治和解的建議，各方反應不一。有分析家認為，該建議對葉爾欽在 1999 年解散內閣、議會的可能性很小，他的支持者越來越少，權勢越來越小，這個建議能使他順利地渡過風險直到任期結束。有觀察家評論道，這個

建議顯示，普里馬科夫要把國家權力抓在自己的手中扮演和議會直接往來的憲法權力，反映總統和總理之間的裂痕。普里馬科夫是受總統權力制約最小的總理，同時也是最快顯示出獨立傾向的總理，普里馬科夫政府對國會負責的色彩較濃厚。學者認為俄羅斯在金融風暴之後，對政局產生重大衝擊，在普里馬科夫出任總理後出現轉折性變化，權力重心由總統移向政府，政府與國會由對抗走向合作，在普里馬科夫的作用下政局由持續動盪趨於相對穩定。¹²⁵但葉爾欽對於這樣的穩定並不滿意，自己成了跛腳總統，大權旁落，便開除普里馬科夫以挽回頹勢，破壞了政局原有的穩定與平衡。

普里馬科夫的下台除了葉爾欽本身權力的考量外，別列佐夫斯基的影響因素亦不容忽視。別列佐夫斯基因為普里馬科夫對其進行經濟犯罪等事件的調查，因此希望儘快除去普里馬科夫的總理職務。別列佐夫斯基一直反對普里馬科夫總理及其政府，並利用他所控制的俄羅斯公共電視臺、《獨立報》等新聞媒介抨擊普里馬科夫及其政府。別列佐夫斯基指責普里馬科夫政府正在奪取權力，並說葉爾欽和普里馬科夫在俄羅斯應該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分歧深刻。3月4日，別列佐夫斯基控制的《獨立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題為《誰來接替普里馬科夫》的文章說，俄羅斯內務部長斯捷帕申、外長伊萬諾夫和國家杜馬主席謝列茲尼奧夫等人可能接替普里馬科夫總理。這篇文章在國家杜馬引起強烈反應，支持普里馬科夫政府的大多數議員再次要求解除別列佐夫斯基的職務。3月4日當晚，葉爾欽以獨立國協國家委員會主席建議解除獨聯體執行秘書別列佐夫斯基的職務，因為他經常超越執行秘書的權力範圍，卻不完成獨聯體國家委員會主席交給的任務。因此，別列佐夫斯基被解職可以說是普里馬科夫政府和國家杜馬的一個重大勝利。雖然如此，別列佐夫斯基還是成功在5月促使葉爾欽開革普里馬科夫。

十、葉爾欽開除普理馬科夫

¹²⁵ 董曉陽，「俄羅斯情勢回顧與展望 1998-1999」，《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一期，頁4-24。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于 5 月 12 日宣佈，開革極有希望問鼎下屆總統寶座的普裏馬科夫的職務，任命以鷹派著稱的第一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史泰巴辛代總理並提名他為總理候選人。在 8 個月以前，當 69 歲的普裏馬科夫臨危受命時，葉爾欽還熱烈稱讚他是俄國當代不可多得的領導人。葉爾欽又再度表演了一次陣前換將的拿手好戲。至於開除普里馬科夫的理由，葉爾欽表示普裏馬科夫未能提出一套處理經濟問題的完整方案，推動自由經濟計劃未盡人意，實際情況則不儘使然。綜合而言，至少有以下幾點內因：一、普里馬科夫功高震主。葉爾欽無法容忍其他政治人物聲勢高過自己的狹窄心胸世人皆知，普里馬科夫擔任總理以來雖無明顯政績，但也沒有犯什錯誤，至少他已將危機四伏的俄羅斯帶進一個較穩定的政治局面。他一度被民意稱為最孚望的政治家以及俄國政局的穩定器，普里馬科夫的聲望日益升高，俄羅斯輿論與民意調查排行榜中，普里馬可夫已經大幅領先葉爾欽，成為俄羅斯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葉爾欽自然眼裡容不下普里馬柯夫。二、普里馬柯夫失去利用價值。當初起用普里馬科夫，主要是了擺脫憲政危機，既然危機已經過去，既然普里馬科夫不能為葉爾欽目前的困境解套，那只好請他走人；三、普里馬科夫未能與在國會中頗有勢力的共產黨完全脫離關係，而共產黨則是力主彈劾葉爾欽的政黨之一。葉爾欽表示解除政府的原因是：普里馬可夫政府為政 8 月只注意到政治穩定而沒有使經濟得到改善。但是，分析家認為實際的原因恰恰並非是經濟問題，在普里馬可夫的努力下，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局勢逐漸趨於穩定，在普里馬可夫擔任總理職務的這段期間葉爾欽不斷地面臨來自共黨勢力的挑戰，對其權力寶座的威脅。例如，利用葉爾欽生病住院的時機，幾次要求葉爾欽辭去總統職務，迫使葉爾欽解除別列佐夫斯基獨立國協秘書，聯邦會議阻撓葉爾欽解除總檢察長史庫拉托夫的職務，葉爾欽的政治權威頻頻遭受挑戰，嚴重威脅葉爾欽的政治地位。

十一、葉爾欽任命自己的親信史泰巴辛為總理，暫時解除疑慮

而今葉爾欽故伎重施，又宣佈解除了普裏馬科夫的總理職務，並解散政府。取代普里馬科夫的史泰巴辛是葉爾欽公認的親信，曾協助他安然度過多次政治風暴，亦曾大力支持出兵車臣共和國，1 個月以前才被提拔為第一副總理。47 歲史泰巴辛的並非經濟學家，而是職業軍人，現役中將。據傳，史泰巴辛深諳克里姆林宮詭譎多變的政治風向，善於駕馭權力。不過，沒有人相信葉爾欽陣前換將是為了改革，普遍的看法是出於自保，因當時他正面臨國會五項彈劾罪名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軍人出身、曾指揮俄國軍隊鎮壓車臣內亂的史泰巴辛，¹²⁶顯然還肩負著保駕護航的任務。史泰巴辛是葉爾欽的長期忠實追隨者，1993 年最高蘇維埃的安全委員會主席，推動車臣戰事與介入布丹諾斯克人質事件，因為人質事件下台。

史泰巴辛的總理位子座的並不穩固，葉爾欽底下的人馬不希望史泰巴辛出任，並且希望能夠扳倒史泰巴辛，改由阿克修年科或齊諾梅爾金擔任總理，其中，別列佐夫斯基在背後的運作影響力極大。史泰巴辛雖然擔任總理，但卻無完全的任命權，他的某些人事任命都被葉爾欽否決了。整個史泰巴辛內閣都是葉爾欽的人馬為主。其中任命前鐵路部長阿修年科（Nikolai Alsenenko）為第一副總理完全是葉爾欽的意思，阿克修年科的職務擴展到管理經濟事務，進一步逼退了之前的札多諾夫。另外，任命西伯利亞石油（Sibneft）總裁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接任阿克修年科鐵道部長職位，都足以顯示出葉爾欽家族和寡頭

¹²⁶ 1952 年 3 月 2 日，斯特帕欣出生于阿瑟港的一個海軍軍官家庭。1973 年畢業于原蘇聯內務部高級政治學院，然後在內務部轄下的部隊服役，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軍人角色，70 年代中期，斯特帕欣進入俄國人文軍事科學院（原列寧軍事政治科學院）深造，獲歷史學副博士和法學博士學位。1981 年畢業後，回到母校即內務部高級政治學任教。其後，他曾多次到當時的熱點地區執行任務，如巴庫、納卡地區、蘇呼米等，屢有建樹。1991 年，斯特帕欣的政治生涯出現轉機，被任命為聖彼得堡和列寧格勒州安全局局長；次年，升任俄國安全部副部長；1993 年至 1995 年，相繼擔任俄聯邦反間諜局第一副局長、局長、聯邦安全局局長；1996 年任俄國家車臣危機調解委員會秘書。1997 年，斯特帕欣被延攬入閣任司法部長，翌年 4 月，轉任內務部長。一年之後，被任命為政府第一副總理兼內務部長。從斯特帕欣的履歷看，他始終沒有離開過軍隊與情報系統，但仕途順暢，屢獲提升，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葉爾欽其實是在依靠情治單位維持政權的政治特色。

的影響力。¹²⁷

史泰巴辛的權力並不穩固，也沒有展現能力防止普里馬柯夫與盧須柯夫聯盟勢力、共黨與國會勢力的不斷擴大；在處理北高加索的動亂上，也顯得不夠果決。史泰巴辛未能達成葉爾欽的期望，葉爾欽審度情勢，國會選舉即將到來，必須進行有利的佈局，而史泰巴辛無法掌握局面，只好選擇一名更為適當的人選來擔任總理職務。

十二、葉爾欽任命普亨為自己的接班人，並為自己辭職後的生涯作安排

由於情況特殊，因此，葉爾欽經過普里馬科夫的教訓，在這次並不願拉政治盟友來擔任總理，這反而是個比較冒險的手段，面臨政權轉移關鍵時刻，葉爾欽任命普亨為總理。有趣的是，由於葉爾欽給予普亨強大的支持，因此，普亨一下子變從不重要的彼得堡幫的一份子，躍升為葉爾欽底下最重要的派系領袖，並得迅速建立自己的派系。普亨在第一次國會投票表決就通過任命案，葉爾欽在任命普亨時表示，普亨將成為其繼任者，普亨和史泰巴辛一樣都是強力部會出身，無管理經濟的經驗。普亨的內閣人事佈局與史泰巴辛一樣，根本無任何變動，表示將會延續過去的政策。但普亨與史泰巴辛不同的是，普亨能更面對國會的壓力。普亨以恢復秩序、打擊恐怖主義為號召。普亨地運用媒體與車臣戰事，在國會選舉中，讓其中幾各大黨派支持政府的立場，並破除反對政府的共黨及普里馬科夫和盧須柯夫所組成的全俄羅斯政黨的攻勢。

1999 年 12 月，第二次車臣戰事是選戰的主軸，各黨派對戰事的態度影響選舉結果，1999 年 10 月才組成的團結聯盟獲得第二多數的選票，緊追在俄共之後。以年輕改革者為主的右翼力量聯盟，選舉獲得的席位位居第四，超過被看好的日里諾夫斯基聯盟和蘋果集團。以普里馬科夫為首的祖國—全俄羅斯聯盟和以亞伏

¹²⁷ Kommersant Den'g I,21 (2 June 1999), 7-9.

林斯基為首的雅布羅集團對車臣問題採取謹慎的態度，與俄羅斯的國內高漲的愛國主義不相容。

普亭上任時，表示不參與任何政黨和運動，但不久就宣佈支持團結聯盟。在普亭政府為首的支持下，團結聯盟實際上成為政權黨，就如同 1993 年的俄羅斯抉擇黨與 1995 年的我們的家邦俄羅斯，都以總理或葉爾欽的人馬為首組成的政權黨。在贏得國會選舉後，為避免車臣戰事拖延對普亭聲勢造成負面影響，葉爾欽祭出最後策略，突然辭職且宣佈於 3 月 26 日提早進行總統選舉。而普亭就以代總統兼任總理的龐大行政資源，最後 2000 年 3 月成功地當選俄羅斯的總統。

葉爾欽派系政治瓦解的後期，正是普亭建立自己派系的初期。普亭的原始人馬主要來自安全單位與聖彼得堡共事的幕僚，並且逐漸接收葉爾欽底下的派系，無可避免地，普亭也必須拉攏中間派人士，尤其是在總統選舉期間，必須盡可能地與所有政治勢力結盟。而在選舉過後，普亭藉由選舉確立了自己總統職位的合法性後，實際掌握大權，普亭對在選舉中與其對立的財閥開始進行清算，逐漸剷除反對勢力，正式確立了派系至高領袖的位置。而普亭從建立派系到穩作派系平衡者的角色，不到一年，其中原因，主要是俄羅斯已經是超級總統制，不需要像葉爾欽當初必須藉由通過新憲法強化自己的權力，不斷地與國會對抗。普亭主政下的俄羅斯呈現著十分穩定的局面。如果以制度的角度來看，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並沒有改變，而其中總統與國會的結構關係對較和諧，國會中過半數支持普亭，因此，總統不需要與國會對抗，許多政策都能順利推行，再者，普亭的聲望一直維持在蠻高的支持度水準之上，普亭的用人策略足以安撫各派系，普亭所面臨的經濟情況穩定，不需要依賴財閥或某些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普亭在執政後滿一年，才逐漸拔除葉爾欽的人馬，在 2001 年 3 月進行執政後的首度大幅人事改組。

第四節 派系政治對俄羅斯政經影響

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對俄羅斯政經發展產生最具負面的影響是俄羅斯的政治不穩與經濟政策的擺盪。政治的不穩定表現在人事的頻繁更動，如內閣改組、撤換總理，而且在多次的派系變動與人事異動下，俄羅斯國家的行政機器並未精簡，反而愈趨龐大，權責分工與人事愈趨混亂，其結果是俄羅斯政府變得更加沒有效率。在經濟政策方面則呈現著穩定化政策在緊縮與擴張間擺盪，私有化政策則停停走走，且成為派系間搶奪國家財產的戰場。經濟政策成為派系妥協的產物，政策遭到扭曲，未能達到改革目標，改革的進程斷斷續續，真正的復甦之路遙遙無期。

前三節依照時間順序從 1992 年至 2000 年，以派系的途徑來分析俄羅斯政壇的發展，著重葉爾欽在派系政治運作過程中的平衡者角色，派系的權力對比與相互競爭等合縱連橫的策略，以及整個俄羅斯國內政經情勢、國際政治情勢對俄羅斯派系政治的影響。大致說來，葉爾欽在其兩任總統任內，總共經歷了六位總理，蓋達、齊諾梅爾金、基里延科、普里馬科夫、史泰巴辛、普亭。其中是任期最短的總理史泰巴辛在位不到四個月。蓋達、基里延科、史泰巴辛、普亭是葉爾欽的人馬，屬於改革派人士，但後兩位在某些政策上屬於強硬派，四位總理的權力基礎來自葉爾欽；而齊諾梅爾金、普里馬科夫則是蘇聯時期的舊技術官僚，有自己的權力基礎，不須依賴葉爾欽，這兩位總理都是葉爾欽面臨政治危機與國會的強大壓力下勉強接受的戰略性聯盟者。而這兩位具有經營自己獨立勢力的能力，又得到國會的支援，因此，葉爾欽在感覺到總理聲勢超越其總統時，便必須加以剷除。而如果將齊諾爾梅金與普里馬柯夫相比較，普里馬柯夫的政治威信、支持度、應變能力實際比齊諾梅爾金高出許多。普里馬柯夫甚至已經具有代理總統的實力。普里馬柯夫的組閣能力大過齊諾梅爾金許多，俄羅斯政府首次有左派人士入閣，例如共黨黨員原蘇聯副總理馬斯流可夫。

派系的運作是葉爾欽鞏固自身權力的手段。葉爾欽的施政能力與政治聲望在執政期間經常面臨危機，葉爾欽藉由撤換人馬來解決自己的政治危機是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這種自利的個人主義作風破壞了俄羅斯的民主制度運作與制度規範。據統計，葉爾欽在位 8 年多撤換過 6 位總理、9 位檢察長、9 位國家安全局長、6 位內務部長和 3 位外長。葉爾欽在這幾年內頻頻換將，在世界政治史上並不多見。然而政府的更替、高官的頻換似乎並沒有化解議會與總統的權力之爭，也沒有解決俄羅斯的政經問題，只是保住了葉爾欽的權力寶座。而人事的變動方面，主要是總理、內閣改組與總統辦公廳的大搬風。

葉爾欽運用派系、人事任命來穩固自己的統治權力。因此，我們可以從上三節的分析中，歸納出葉爾欽在面臨哪些政治與經濟壓力情況下，運用人事任命權來操縱其人馬在政府內部的佈局，以符合當時環境所需，並讓派系間的勢力與互動達到平衡。在三次國會選舉、經濟危機等事件中，葉爾欽都調整派系在政府中的人事佈局，許多情況顯示，葉爾欽面臨共黨反對勢力為主國會的壓力，雖然會更換改革派人馬，任命中間派以緩和壓力。¹²⁸但事實上，葉爾欽表面上雖安排中間派人士任職，但同時又會安插改革派人士加以制衡，以保持派系勢力的平衡，並防止政策過度偏離原先的方向。然而，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就在這派系鬥爭與葉爾欽的派系政治中，形成人事頻繁變動、不穩定以及經濟政策來回擺盪的混亂

¹²⁸ 總理是由總統任命，國會通過。在齊諾梅爾金與普里馬科夫兩位總理在位期間，由於這兩位是葉爾欽的政治盟友，而非人馬，因此葉爾欽藉由安排改革派的副總理，來淡化其決策影響力。在齊諾梅爾金時期，前期有費多洛夫、蓋達，後期則有楚拜斯與涅姆佐夫來牽制齊諾梅爾金。在普里馬科夫在位期間，葉爾欽安排札多諾夫、費多洛夫來加以制衡。俄羅斯總理之下，有第一副總理和副總理。總理雖然可任命第一副總理、副總理與部長，但是必須經過總統的同意；而實際俄羅斯在副總理與部長的任命上，總理的決定權不高。強力部會的任命更是完全由總統決定。葉爾欽每次撤換新總理，再由新總理組成內閣時，內閣組成的時間平均必須花費一個月才能夠大勢底定。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總理的所有人選必須諮詢總統，而整個來回折衝的過程都在在顯示出葉爾欽總統握有最後的決定權。

局面。利用下表，歸納出葉爾欽在政治與經濟事件中進行派系人事運作與政策變動的情況。

表四：派系互動的人事變動與政策變動

時間	事件	人事變動	政策轉變
1992.4	第六屆人大	改革派布爾布里斯、沙赫萊與蓋達的職務遭解除，中間派舒梅科、齊諾爾梅金與希札進入政府。同時，蓋達被任命為代總理來加以平衡。	穩定化政策減弱
1992.12	第七屆人大	同時任命亞洛夫緩和反對勢力，又任命費多洛夫保持改革派的勢力。齊諾爾梅金取代蓋達為總理。	穩定化政策又進一步減弱
1993.4	全民公投	強化費多洛夫的職務，任命拉夫洛夫、沙斯科維奇平衡齊諾爾梅金的勢力。	費多洛夫重新執行緊縮的穩定化政策
1993.12	國會選舉	費多洛夫及蓋達離開政府，強化楚拜斯、沙赫來、修金的職務制衡齊諾爾梅金的勢力。斯科柯夫與科札柯夫、巴蘇柯夫挑戰齊諾爾梅金總理的職位。	齊諾爾梅金實行較寬鬆的貨幣與財政政策
1994.10	盧布暴跌	葛拉申科與杜比寧下台。楚拜斯職務提昇。	楚拜斯配合國際貨幣基金會措施主導穩定化政策
1995.6	布丹諾夫斯克人質危機	強硬派葉林、葉果洛夫及史泰巴辛下台，齊諾爾梅金調解成功，聲望提高。	車臣問題轉而傾向政治談判方式解決
1995.12	國會選舉	科濟列夫辭職，普里馬科夫接任外交部長。	外交政策是由大西洋派轉向歐亞主義派
1996.6	總統選舉	強硬派科札柯夫、巴蘇柯夫與斯科柯夫下台。列別得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楚拜斯接總統辦公廳主任，齊諾爾梅金再度獲提名總理。三人三角鼎立，後楚拜斯聯合齊諾爾梅金鬥下列別得。	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及波坦寧進入政府，私有化拍賣成為派系爭奪重心。穩定化政策的重要性降低。
1997.3	葉爾欽半年來健康情況不佳，藉由任命改革派破除跛	任命楚拜斯、涅姆佐夫負責經濟改革。	重新啟動新一波改革，涅姆佐夫甚至提出要對抗財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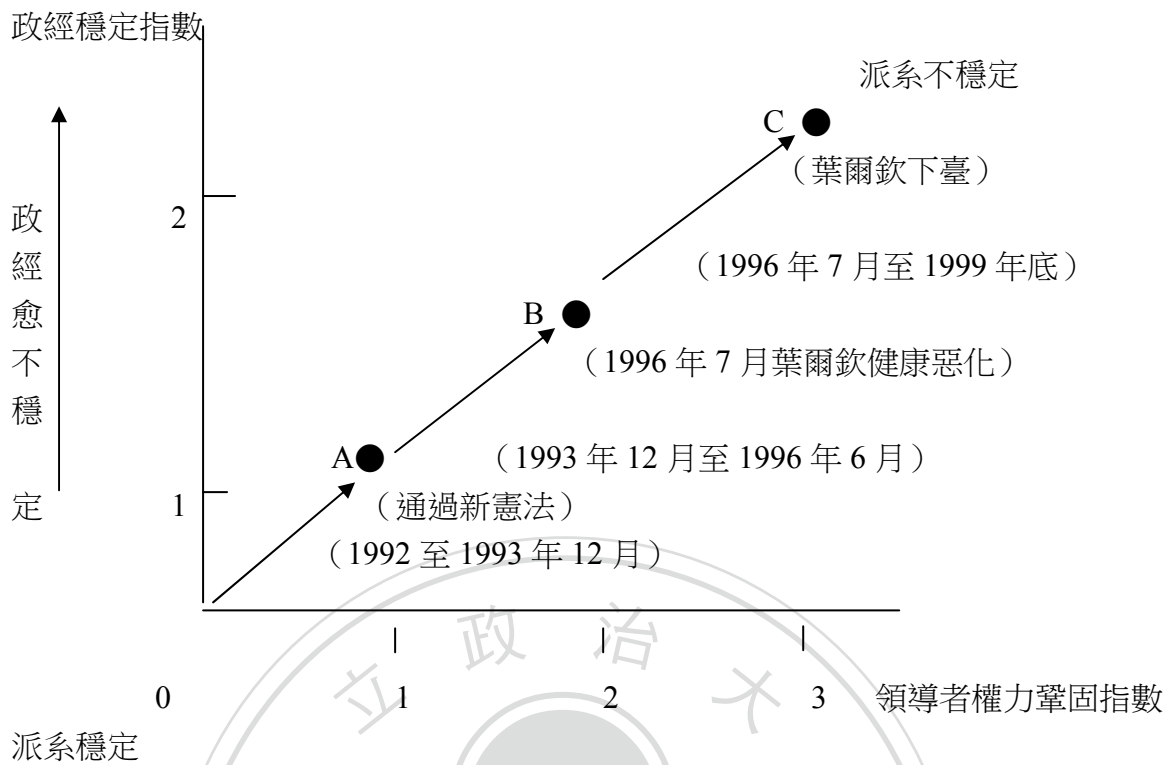
	腳總統之說		
1997.8	諾理斯克鎳業拍賣案、電信投資公司拍賣案與醜聞貪污案	齊諾爾梅金運用醜聞案打擊改革派，楚拜斯、涅姆佐夫被解除職務。	私有化部長科赫因電信投資公司拍賣案下台。波坦寧與楚拜斯聯手購買諾理斯克鎳業，齊諾爾梅金聯合貝瑞佐夫斯基要求停止諾理斯克鎳業拍賣案。
1998.3	齊諾爾梅金功高震主	葉爾欽拔除齊諾爾梅金，任命基里延科接總理	
1998.8	金融風暴	基里延科因金融危機下台，葉爾欽任命普里馬科夫為總理以解決問題	經濟政策轉趨寬鬆。財閥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
1999.5	普里馬科夫聲望過高威脅葉爾欽	開革普里馬科夫，任命自己的人馬史泰巴辛為總理	
1999.8	國會選舉，確立總統接班人	任命普亭為總理	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

派系政治除了對俄羅斯政經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外，必須額外補充的是派系侍從主義所造成的貪污結構化問題。根據歐洲開發銀行與風險控制集團在 1998 年的調查，俄羅斯的貪污情況名列世界第三名，美國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在 1997 年的報告中指出俄羅斯的貪污案件多發生在政府部門內部，如總檢察長室、中央銀行、國稅局、國家海關委員會與對外關係經濟部等。

檢視葉爾欽時期俄羅斯派系結構的演進過程，我們發現 1993 年 12 月與 1996 年 7 月是極重要的轉折點。1993 年 12 月的新憲法確立了葉爾欽成為派系最高領袖的地位，而 1996 年 7 月葉爾欽健康惡化，使得葉爾欽的權力遭受到派系的挑戰，尤其是較具獨立性的中間派人馬。葉爾欽健康惡化所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面，對各派系來說，正是個爭取權力的良機。葉爾欽在 1996 年 6 月競選成功後，即於當年秋季住院動心臟手術。但康復出院後，葉爾欽健康狀況仍不見好轉，先後因心臟病、肺炎、支氣管炎和感冒等病症近十幾次出入醫院、療養院。俄羅斯媒體經常報導，葉爾欽在中央臨床醫院、遠郊療養地或近郊別墅、克里姆林宮總統

府這三點之間徘徊。此外，葉爾欽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言語、行動和思維開始遲鈍，在出訪外國參加禮儀活動時幾次險些跌倒。他的健康狀況近年來已成為反對派的話柄，被用來作為彈劾總統的理由，並多次由此引發政權危機。俄羅斯許多政治家曾建議他及早退出政壇。身體不佳，顯然是最後葉爾欽選擇辭職的原因之一。不然，只要葉爾欽願意，便可以要求憲法法庭對憲法運作重新解釋，讓葉爾欽依據新憲法再度競選總統。

除了派系最高領袖權力穩固與否的指標外，政經情勢是影響派系互動的第二項指標。整體而言，俄羅斯政經一直不穩定，1993 年發生砲轟國會流血事件，1993、1995、1999 年有國會選舉，1996 年有總統選舉，1994 年與 1999 年兩次入侵車臣，1994 年與 1998 年有金融危機，1995 年底到 1999 年進行現金私有化與大型國有企業拍賣，尤其是 1997 與 1998 兩年的諾利斯克鎳業（Norilsk Nickel）、電信投資公司（Svyazinvest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與俄羅斯石油（Rosneft）的案子，更是引起政府部門、財閥和媒體的激烈鬥爭。葉爾欽兩度出面召集財閥，要求財閥和平相處，否則就要以取消特權來威脅財閥。大致的趨勢顯示，俄羅斯民眾與政治精英將初期的政經危機視為轉型的陣痛，無可避免，接受度較大；而在中後期後，民眾與反對派的精英就有權利指責經濟衰退與經濟危機是政府的施政錯誤。葉爾欽在 1998 年金融風暴後，在短短兩年內年四易總理、國會進行政府不信任案、發動彈劾總統，可以說是政經危機交雜的階段。根據這兩大指標，從整體趨勢來分析，就可以得出圖九的派系演進圖。從 A 點發展到 B 點與 C 點，一直往派系不穩定的趨勢發展。一直到葉爾欽下臺前與普丁接收葉爾欽的派系，葉爾欽的派系可以說是正式瓦解，而普丁的派系政治也就隨之展開。



領導者權力鞏固愈不穩固

圖九：俄羅斯派系演進圖

第五章 結論

俄羅斯在 1992 年獨立後，展開民主化與市場化的道路。在葉爾欽主政的 8 年期間，俄羅斯經常處於政治僵局與經濟危機當中，全世界與俄羅斯國內咸認為俄羅斯的民主之路走得十分艱辛。在研究新興民主國家的領域中，學者試圖探索影響國家政經轉型成功的因素。研究俄羅斯的學者亦試圖以整個宏觀的角度，採取不同的研究途徑，探討影響俄羅斯獨立後進行政治與經濟各項改革成果的因素。有學者認為制度是關鍵因素，有的學者卻強調俄羅斯政治文化、公民社會基礎不足，甚至葉爾欽個人因素的破壞作用。而純粹運用制度來分析，會有解釋力不足之處；而強調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因素或菁英的角色，也同樣遭遇到如何將文化因素加以實證的困難。

而本文則嘗試以派系為分析架構，在此架構中融合制度因素與非制度因素，來說明俄羅斯政經運作的實際面貌，以求得最大的解釋力。俄羅斯在葉爾欽時期的初期轉型過程中，舊制度遭到破壞，正式制度逐漸建立；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階段，舊制度雖瓦解了，舊制度的聯繫或結構仍然存在，新制度的運作機制尚未成為俄羅斯普遍所接受的約束或規範機制。俄羅斯派系正是存在正式制度之中的非正式組織，延續著過去舊體制的關係與聯繫，反映出俄羅斯政經的轉型特質。

派系政治一直是各國國內政治評論家最喜歡使用的分析觀點，連美國在外交政策的決策分析上都有兩個派系集團的路線之爭。派系是人類社會中正常的產物，在任何的制度與組織中，都存在這種以私人關係為中心的派系存在。派系政治在每個國家國內政治所產生的重要性不同，必須以個別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例如，某些國家的政治制度比較完善、政治精英的派系政治文化不強，派系政治就不是政治生活的重心，如美國外交政策兩個路線的分析，實際上比較是屬於官僚決策的政府內部部門相競爭模式，並不符合真正的派系模式。另外，派系政治

的分析途徑似乎是一種較為微觀的行為主義分析方式，而使用派系的途徑來分析一國的政經發展，如果沒有理論架構、沒有歸納出派系政治的運作規則，則這樣的分析無異只是流於講述政治人物間的個人恩怨。因此，如何能根據理論基礎，建構出派系互動結構，系統性地分析俄羅斯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是本文的主要目標。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以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為分析中心，認為派系是延續了過去的政治菁英文化傳統，不但在新的俄羅斯民主制度下繼續存活下來，還進一步成為主導整個俄羅斯發展的重要行動者。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項發現是派系政治是分析葉爾欽時期政治的一個具有解釋力的模式。第二項發現是建構一個分析葉爾欽派系互動規則與架構，在此架構中建立一個評估派系政治穩定程度的指標，運用這個指標來分析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發展與演進。第三項發現是派系政治的穩定程度與俄羅斯的政經發展具有密切的關係存在，亦即俄羅斯的派系互動愈不穩定，俄羅斯的政治也隨之愈不穩定、人事互動愈頻繁，政策產出更加不確定，尤其是經濟政策隨著派系勢力的上上下下而來回擺盪變動。

就第一項研究發現來看，俄羅斯派系政治的產生來有自制度與非制度的因素。在轉型期的俄羅斯，派系這種非正式制度的運作方式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政治互動方式，而本文派系政治的架構不僅強調制度因素對派系政治所形成的限制，也提出制度因素對派系政治運作的強化力量。俄羅斯的超級總統制讓葉爾欽得以運用憲法所賦予的合法權力，提供政治職位與經濟特權來建立自己的派系人馬，成為派系的至高領袖。俄羅斯領導人的權力運作方式與重視私人關係的文化傳統，使得派系政治成為俄羅斯菁英普遍所接受的政治互動模式。派系政治的運作是依附在正式制度之上的非正式制度，派系政治無法取代正式制度，俄羅斯的三

權分立仍然存在、繼續運作。俄羅斯的政治制度超級總統制是個不平衡三權分立制度，總統對政府的人士與決策具有最後的裁決力量，國會的制衡力量微弱，憲法法庭與總鑒察長的監督力量不足。這樣的正式權力架構表現在非正式的派系結構中，也具有同樣相對應的結構關係，亦即，在派系政治中，具有最高權力的總統葉爾欽是派系至高領袖，葉爾欽運用權力來建立自己的派系政治王國，政府部門不過是葉爾欽底下各派系的權力基地，國會在無法對抗葉爾欽的情況下，許多議員在關鍵時刻都選擇作為葉爾欽的政治聯盟。俄羅斯的民眾認為國會不過是隻紙老虎，平時只是藉由批評政府來維持自己的存在價值，對政府或總統的制衡力量不夠，在政治的主導力上也不足。

在收集俄羅斯派系政治文獻的過程中，發現研究俄羅斯派系文獻主要集中在一般的報章評論性文章，這類的文章對於派系的互動具有詳細的描述，但是卻不具理論基礎；而較具理論且系統性的分析只有學者威列頓與王定士，威列頓主要分析葉爾欽派系的分類與形成，而對於派系的互動則沒有進一步的分析，王定士則著重派系在政策上的辯論。本文的派系分類是根據威列頓學者的分法，在互動方面則參酌過去學者對其他國家派系的理論分析。威列頓根據派系形成的來源與因素，將葉爾欽底下的派系分為三類，一是長期的追隨者，二是短期的庇護，三是短暫的政治盟友者。這三類派系具有大致的政策取向，但不具絕對的政策立場。對派系而言，政策是爭取權力、壯大勢力、作為權力鬥爭的工具。現代的派系政治已經都脫離意識型態的色彩，完全以權力為出發點。派系的互動過程具有強烈的平衡性，派系的至高領袖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地位受到威脅，會製造派系的對立，當某一派系勢力過於龐大時，會提高另一派系的勢力來平衡此一派系過大的力量。派系間存在合作與結盟的關係，不過合作與結盟的關係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派系依據當時的政經環境與派系的利害衝突關係，決定結盟的夥伴與對抗的敵人。

俄羅斯派系為了生存，必須不斷地累積實力，確保派系政治勢力的方式就是在政府中佔據重要的職位，並且取得政策主導權。因此，在派系政治的運作下，政府中的職位成為各派系人馬爭奪的戰場，經濟政策是派系搶奪瓜分國家資源的工具。各方派系都希望從葉爾欽獲得更多的政治職位，因此，各派系均必須對葉爾欽表示效忠，必要時成為葉爾欽政策的代罪羔羊。因此，派系對俄羅斯的影響就表現在政治不穩定上，但卻讓葉爾欽能夠維持 8 年多的總統職位。在市場化與私有化後，經濟實力是政治實力的後盾，經濟力量在選舉、財政預算、拉攏利益團體和民心方面，都是一項重要且可以自由運用的政治資源。俄羅斯的經濟政策就在派系的運作下，成為派系鬥爭、瓜分利益的犧牲品，無法建立一個開放且自由競爭的市場。

影響俄羅斯派系運作主要有兩大指標，一是派系至高領袖的權力穩固程度，二是俄羅的政經環境。派系的至高領袖權力愈穩固，就愈能掌握派系的互動；而俄羅斯的政經情勢如果愈穩定，派系利用政經情勢作為相互鬥爭的機會就愈小。綜合觀察起來，我們發現，派系愈不穩定，俄羅斯政壇的人事變化就會愈頻繁，政策也會相對產生變動，其中，俄羅斯的短期景氣變動和派系的互動具有強烈的循環關係。

第二節 檢討與建議

綜觀本文對葉爾欽時期派系政治的分析，最大的缺點在於作者無法透過親自的訪問，確知俄羅斯所有政治人物的派系關係。本文對於俄羅斯派系互動的分析，是根據過去派系的互動觀察而來，或是基於利益衝突的角度，對派系的運作所做的猜測或揣測。派系政治運作的基本規則在各國的派系政治中大同小異。各國派系的運作實際上應該有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派系至高領袖的個人特質、領導風格與權力運作方式、各派系的領導人和派系的成員的結構關係、當時的政治

經濟環境，都與派系的運作具有相當大的關係，隨這時間的轉換、派系至高領袖的更迭、正式制度的轉變等，會有不同的派系互動模式產生。本文試圖針對俄羅斯的實際狀況，提出葉爾欽任命短期庇護者為總理和任命短期政治盟友這兩類模式，並且認為葉爾欽在民主化與市場化的政經情勢下，必須循環運用這兩類模式，以維持自己的總統權位。此外，根據影響派系運作的內外因素，提出兩大影響派系穩定的指標，並運用這兩項指標說明羅斯派系的演進過程。這兩種研究途徑可以解釋葉爾欽時期的派系政治，但卻不一定適合用來觀察俄羅斯後續的派系政治發展。

以第一種模式為例，第一種兩類模式的循環似乎在沒有在普亭的派系運作中發生，目前普亭所任命的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總理只有一個。而第二種研究途徑是關於俄羅斯派系穩定程度的指標性分析，就能夠繼續用來解釋何以俄羅斯在普亭主政時期是處於較為穩定的局勢。俄羅斯與一般民主國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總統不加入任何政黨，扮演一個高於各黨派勢力的角色。葉爾欽不加入當初將他推向權力顛峰的俄羅斯民主運動，也不加入蓋達、齊諾梅爾金組成的民主抉擇黨、我們的家園俄羅斯這類的政權黨；同樣地，統一黨(Unity)支持普亭，但是普亭卻不加入統一黨。因此，普亭仍舊偏好派系政治。在普亭執政之下，派系政治運作的情況與葉爾欽時期的派系運作有何不同？就目前最初淺的觀察與比較看來，我們可以發現，普亭的權力基礎較穩固，普亭底下的派系目前均不具威脅普亭總統職位的力量，再加上普亭的統一黨派系在國會中是第一大黨，普亭不同於葉爾欽，獲得國會的高度支持，不需要被迫擴大派系人馬或拉攏政治盟友。由於普亭能獲國會過半數的支持，因此在人事任命案以及政策法案與預算審查上，能順利過關。此外，普亭主政下的俄羅斯政經情勢穩定。在人事任命與政策制定上，普亭不需要退讓，樣葉爾欽一樣，經常因外在政經情勢，必須任命自己與國會雙方均能接受的妥協性人士；在政策方面，普亭有蕭伊古(Shoigu Sergei)領導的統一黨派系、右派改革聯盟的支持，國會經常是順利通過普亭與

政府的法案，不需要被迫調整政策。

根據派系至高領袖權力穩固與否和政經穩定情勢兩項指標來評估，普亭的派系至高領袖權力是十分穩固的，對派系互動具有主導力量，甚至高於葉爾欽對其派系的主導力量。從派系政治途徑來分析，可以解釋普亭派系政治穩定的原因，同時也能夠解釋，自普亭掌政以來，俄羅斯政經局相對穩定的原因。然而，如果俄羅斯未來的民主政治運作能上軌道，制度能夠有效的運作而不致經常處於癱瘓且導致政經僵局的話，則派系政治對俄羅斯政治的解釋力似乎會相對變弱，變得較不適用。

政治科學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原因，並且提出解決之道。本文最後必須要從派系政治的角度對俄羅斯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本文認為俄羅斯因為派系政治運作，導致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混亂。因此要解決俄羅斯目前的問題，就應該消除派系政治。由於派系政治是一個無法刻意改變、型塑的非正式制度，無法像正式制度一樣，透過修憲來完成。如欲降低派系政治在俄羅斯的作用，則必須從促成派系政治形成的兩大因素著手。第一個是制度因素，俄羅斯必須設計一個適合俄羅斯的制度、有效運作的制度，才能縮減派系政治運作空間。但是，制度是俄羅斯的政治精英所建立的，制度的修改涉及修憲，在修憲的過程中，又難免要引發一場權力大戰。從制度面著手降低派系政治的作用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第二項因素是屬於政治文化方面。然而，政治文化本身就是長期且不易改變，只能任期自然發展，因此，要改變俄羅斯的政治文化是件不可能的事，只能靜待其自然轉變。除了這兩項因素可以消除派系政治外，派系內部本身的變動，如派系至高領袖下台、派系內部鬥爭過於激烈自行瓦解，派系政治就有可能消失。不過，派系的至高領袖下台後，亦可能會產生新的派系至高領袖，因此，派系仍會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派系瓦解的機率極小，因為派系鬥爭雖激烈，但派系菁英存在共識，希望在維持派系的運作下進行權力爭奪，派系精英深知如果派系結構瓦解，則所有派系之內的人員都會失去派系運作的利益，這群俄羅斯上層菁英在派系政治中是

既得利益者，必要時會犧牲利益來維持派系的存在。

就以上的情況分析，我們得之，目前是無法在短期內消除俄羅斯派系政治。而在派系政治繼續存在的情況下，為了求得俄羅斯政經的穩定發展，則我們提出所謂的解決之道是保持俄羅斯派系的穩定互動，亦即維持派系至高領袖的權力穩固。而這樣的建議並不可行，無異是將俄羅斯的發展寄託在一個人身上。這和俄羅斯社會目前抱持強人政治，將一切的希望託付在國家領袖身上，同樣都是十分不可取的建議且不具前瞻性的做法。目前，俄羅斯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相互合作，把持這整個俄羅斯的發展方向。未來，俄羅斯是否會走向改革，則必須靠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的自我覺醒，拋開自我的利益，為國家的政體利益著想，不再以派系作為主要的運作方式，而是依循正式的制度公開運作。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俄羅斯的未來是令人擔憂的，俄羅斯似乎無任何進行激進改革的機會。目前，俄羅斯國內均希望總統普亭能有一番作為，將俄羅斯帶向正軌。1996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由於俄國財閥的鼎力相助，葉爾欽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險勝，從此這些財閥的觸角深入俄國政權核心，知名財閥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權傾一時。但是普亭就職總統一年後，這些財閥卻成為法院通緝的要犯。以前問任何一個普通俄羅斯人，是誰在統治俄羅斯？我們會得到幾乎相同的答案：別列佐夫斯基與古辛斯基等財閥在統治著俄羅斯！而現在如果再提出同樣問題，俄羅斯人會告訴你，是他們的總統普亭在統治俄羅斯。而這樣的思維透露出，俄羅斯還是離不開強人政治的文化傳統，許多俄羅斯人還是習慣於獨裁專制統治，俄羅斯人認為秩序重於法治與民主。俄羅斯國內人民十分痛恨葉爾欽，一致認為葉爾欽將俄羅斯的一切搞垮了。或許葉爾欽的確是千古罪人，但另一方面，葉爾欽的所作所為反應了俄羅斯當時社會的想法。例如，既然民眾不滿葉爾欽，何以在1996年總統選舉時選舉時仍然選出葉爾欽，或者民眾也可要求國會經由正式的憲法程序彈劾葉爾欽，或自行發動革命來推翻這個無能的政府。因此，俄羅斯的一切要有所改善，必須依賴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基礎，亦即公民社會的壯大，才可能有希望。在正式制度方面，俄羅斯必須找到一個能

夠真正有效運作的制度，而不再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並行。如果俄羅斯的民主制度與市場機制良善，則非正式制度的派系政治及地下經濟的生存空間變小，無法對正式制度發生破壞作用，則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就可以正常地發展運作。



參考文獻

一、英文部分

- Ahl, Richard. 1999. "Society and Transition in Post-Soviet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2 : 175-193.
- Almond, Gabriel A. Powell, G. Bingham. and Mundt, Robert J. 1993. *Comparative Poli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 Arnaud de Borchgrave, 1997. *Russian Organized Crime*,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ttp://www.csis.org/hill/ts100197.html>.
- Barber-Barry, Carol and Hody, Cynthia A. 1995. *The Politics of Cha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londel, Jean. 1984. "Dual Leadership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 Step Towards Executive and Regime Stability?" in Dennis Kavanagh and Gillian Peele, eds..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S. E. Finer*.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 Breslauer, George W. 1982. *K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Breslauer, George W. 1999 " Boris Yeltsin as Patriarch," *Post-Soviet Affairs* 15(2) : 186-200.
- Breslauer, George W. 2001. "Personalism Versus Proceduralism,"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George W. Breslauer ed.. *Russia in the New Century Stability or Disorder?* Westview.
- Brown, Archie. 1997.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paper delivered at the X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oul.
- Clark, William A. 1998. "Presidential Prefects in the Russian Provinces: Yeltsin's Regional Cadres Policy," in Graeme Gill ed.. *Elite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Clifford, Gaddy and Ickes, Barry W. 1998. "Russia's Virtual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77(5).
- Colloudon, V. 1997. "The Criminalization of Russia's Political Elite,"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 Dallin, Alexander. 1994.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in Lapidus, Gail W. ed.. *The New Russ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Dinello, Natalia. 1998. "Bankers' War in Russia Trophies and Wounds," CSIS: Post-Soviet Prospects 6(1). <http://www.csis.org/ruseura/psp/pspvil.html>.
- Dittermer, Lowell , Haruhoro Fukui and Lee, Peter N. S. 2000. *Informal Politics in*

-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ttmer, Lowell and Wu, Yu-shan. 1995.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47(4) : 467-494.
- Easter, Gerald M. 1996, "Personal Network and Post Revolutionary State Building Soviet Russia Reexamined," *World Politics* 48(3) : 551-578.
- Fortescue, Stephen. 1997. *Policy-Making for Russian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Fossato, Floriana. and Kachkaeva, Anna. 1997. "Russian Media Empires," <http://www.rferl.org/nca/special/RUMEDIA/index.html>.
- Hazan, Baruch A. 1987.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Infighting in the Kremlin*. London: Westview Press.
- Hosking, Geoffrey A. Aves, Jonathan and Duncan, Peter J. S. 1992. *The Road to Post-Communism. Independent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Soviet Union 1985-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http://www.nupi.no/ForskEng/forsk-set-en.htm>
- Huskey, Eugene. 1994. "Yeltsin as State Builder,"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21(1) : 61-72.
- Huskey, Eugene 1996.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in Russia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residency and Government," *Review of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22(4) : 366-367.
- Jensen, Donald N. 1998. "How Russia Is Ruled," <http://www.rferl.org/nca/special/ruwhorules/index.html>
- Johnson, J. 1997. "Carving up the Bear: Banks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Russia," *CSIS: Post-Soviet Prospects*.
- Klebnikov, Paul. 2000. *Godfather of the Kremlin Boris Berezovsky and the Looting of Russia*. NY: Harcourt Int..
- Lande, Carl H. 1997. "Introduction: The Dyadic Basis of Clientelism," in Steffen W. Schmidt, James C. Scott, Carl H. Lande and Laura Guasti eds..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z, Juan J. and Stepan, Alfred.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u, Vladimir. 1994. "The Ascent of the Inflationist," *Journal of Democracy* 12(2) : 32-35.
- Nathan, J. Andrew. 1973.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53.
- Pye, Lucian W. 1981.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legeschlager.

- Razuvaev, V. V. 1996. "Power in Russia – The Bureaucratic Dimensio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s*.
- Reminton, Thomas F. 1998. *Politics in Russia*. New York: Longman.
- Rigby, T. H. and Harasymiw, Bohdan. 1983.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USSR and Yugoslav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Rigby, T. H. 1990.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Sajo, Andras. "Corruption, Cliente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in Eastern Europe," <http://www.law.nyu.edu/eecr/vol17num2/special/special.html>
- Shevtosova, Lilia. 1999. *Yeltsin's Russia Myth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Treisman, Daniel. 2000. "Blaming Russia First," *Foreign Affairs* 79(6) : 146-155.
- Tsou, Tang. 1986. "Prolegomenon to The Study of Informal Groups in CCP Politic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y Perspecti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olkov, Vadim, 1999. "Violent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European-Asia Studies* 51(5) : 741-754.
- Willerton, John P. 1992. *Patronag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erton, John P. 1997. "Presidential Power," in Stephen, Alex Pravda and Zvi Gitelman ed..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4*.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illerton, John P. 1998, "Post-Soviet Clientelist Norms at the Russian Federal Level," in Graeme Gill ed.. *Elite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Willerton, John P. and Shulus, Aleksei A. 1995. "Constructing a New Political Process: The Hegemonic Presidency and the Legislature," *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28(4) : 787-825.
- Yablinsky, Grigory. 1998. "Russia's Phony Capitalism," *Foreign Affairs* 77(3) : 67-79.
- Yeltsin, Boris. 1990. *Against the Grain*. New York: Summit Books.
- Yeltsin, Boris. 1994.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Yeltsin, Boris. 2000. *Midnight Diari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二、中文部分

- 孔寒冰、關貴海，2000，《葉爾欽執政年代》，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
- 王定士，1999，「車臣戰爭研究：車臣戰爭決策中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第二期，頁 233-256。
- 王定士，2001，「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外政策路線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羅斯學報》，創刊號，頁 61-97。

- 王定士，2001，「俄羅斯金融寡頭在民主化與經濟改革的角色」，《俄羅斯學報》，創刊號，頁 11-60。
-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出版社。
-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台北：中正。
- 吳玉山，1996，「中國大陸派系鬥爭與經濟循環互動之研究」，台北市：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NSC84-2414-H002-037。
- 吳玉山，2000，《俄羅斯轉型 1992-1999》，台北：五南。
- 吳玉山，2000，「合作還是對立？半總統制府會分立下的憲政運作」，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的新走向研討會。
- 吳玉山，2001，「制度、非正式制度與結構對政治穩定的影響」，中國政治學會九十年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
- 吳東野，1996，「『半總統制』政府體系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8 期，頁 37-49。
- 李英明，1999，《中國大陸學》，台北：楊智。
- 畢英賢，1994，《俄羅斯》，台北：政大國關中心。
- 許瑜玟，1998，「俄羅斯府會政爭之研析：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政大俄羅斯研究所論文。
- 陳明通，1995，《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
- 彭懷恩，1996，《比較政治》，台北：風雲論壇。
- 馮紹雷，1997，《制度變遷與對外關係-1992 年以來的俄羅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董曉陽，1999，「俄羅斯情勢回顧與展望 1998-1999」，《東歐中亞研究》1999 年第一期，頁 4-24。
- 趙春山，1990，《蘇聯領導權力的移轉—從列寧到戈巴契夫》，台北：桂冠。
- 鄭異凡，2000，「葉爾欽現象析」，《東歐中亞研究》，2000 年第一期，頁 5-12。
- 賴榮偉，1998，「中共政治研究之派系模式探討」，《東亞季刊》，第 29 卷，第 4 期，頁 112。
- 羅嗣炬、王鵬，2000，「從俄羅斯威權政治看葉爾欽辭職」，《世界知識》，頁 7-8。